

148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杨春华 张道庆译

#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新华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 杰



- 《**权力学**》 上、下集 本社内部发行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新华书店发行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 《**斯大林死之谜**》 本社内部发行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 《**卡德尔回忆录**》 新华书店发行
- 《**罪行与妥协**》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  
〔英〕威廉·肖克罗斯著
- 《**斯大林——历史人物**》 本社内部发行  
〔英〕伊恩·格雷著
- 《**分崩离析的帝国**》 本社内部发行  
〔法〕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著

统一书号：3203·

定 价：0.71 元

#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杨春华 张道庆 译 周爱琦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杨春华 张道庆译 张 开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京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70,000字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203·005 定价：0.71元

##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作者阿·阿夫托尔哈诺夫1979年的新作，是一部全面介绍勃列日涅夫统治内幕和特点的著作，被称为当前西方“第一本认真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品。

书中以大量事实剖析了勃列日涅夫十多年来的内外政策和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认为苏联对内已成为“军事警察农奴制国家”，对外成为最危险的新型帝国主义国家。

作者分析了勃列日涅夫打击异己、培植个人帮派以及勃列日涅夫私人势力的情况，揭露了“特权阶层”和苏联当前国内阶级的状况，说明了勃列日涅夫当前在争取独裁统治方面所遇到的重重困难，阐述了克里姆林宫在争夺勃列日涅夫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和各派势力的政治背景，预测了苏联国内发生政变和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以及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本书也分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外扩张发展新阶段和新战略的实质与特点。

书中个别地方略有删节。由于作者本身所处的立场，有些观点存在问题，请读者分析鉴别。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

## 播种出版社对于作者的介绍

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生于高加索。切禅族人。曾担任联共（布）中央负责干部名册的工作人员。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研究俄国历史。

1937年他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1942年，经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释放。1943年移居西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俄国历史教授。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苏联国内写了六本书，主要是谈切禅和高加索的历史。本书是他在国外写的第十本书。

《勃列日涅夫的力量与弱点》（政治评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作者以他特有的分析能力剖析了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15年统治时期的内外政策。当这个时期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和苏共政治局其他委员年事高迈这一正常的生理原因而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版这本书是十分重要的。作者还详细分析了勃列日涅夫的“文学”作品——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小地》、《复兴》和《垦荒地》）。这些作品对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是颇有价值的。

这是第一本认真分析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维埃政权的书。

## 代 前 言

一个大阶级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首先应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人，他一旦掌握国家大权，必然要推行他自己的意志和纲领。但是，哪怕是最超群出众的高级官僚，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仍不免是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苏维埃国家的前三任领导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独特的政治家。目前，苏联超级大国的第四任领导，已经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超级官僚，他就是勃列日涅夫。他步其前任的后尘，继承他们的衣钵；又是把党的机关、政治警察和军队三位一体的现政体的意志付诸实施的执行者。这是他个人权位迄今无恙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作为政府首脑和党的领袖的权力变幻莫测、软弱无能的表现。

列宁早就预见的革命者的制度蜕变为官僚主义者制度的过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完成了。苏维埃国家变成了苏联专制官僚政治的庞大机器。由于官僚们的思维方式缺乏真正政治家的创造想象力，所以，勃列日涅夫的统治要么避免提出和解决对内政策上的尖锐问题，要么加紧其全球扩张的对外政策来掩饰这些问题。在这方面，积习很深的苏联官僚们的创造想象力却并不匮乏。克格勃的智囊团念着“缓和”经，在西方高枕无忧的情况下，让契卡连人带思想都合法地渗透到了自由世界的各个组织和机关，人们对苏联意识形态的侵略不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苏联对东欧各国人民的奴役长期固定化了，契卡分子资助和武装的“解放战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热带密林中的“苏联兄弟”的“革命改变”有了合法的权利。在这种“缓和”的幌子下，西方的贷款、

技术和工艺源源不断地流入苏联，使克里姆林宫不仅能够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维持庞大的军队，而且能推迟它由于饕餮的军事机器而不断面临的经济破产。

我无意于撰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政治传记。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乏味、更徒劳无益了。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生涯可谈。因此就连那些苏联传记作家在写到他的《生平事迹》时，一共只用了3页到4页的篇幅来写勃列日涅夫本人，而其余篇幅是用来描写党的机关。至于那些西方政论家，到目前为止已写过几本关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的书，却还根本没有动手去写勃列日涅夫。当代人如此这般地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于一个大国的头头来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不敬。不过，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本身却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因此，本书力求分析这一任统治历史形成的特点、它同几位前任的异同之点以及他在内政外交方面进行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我的《政治评论》能引起读者一些认真的思考，我将感到欣慰。



---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 目 录

## 代前言

<b>第一章 对内政策</b> .....	( 1 )
一、勃列日涅夫的统治.....	( 1 )
二、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涯剖析.....	( 41 )
三、苏斯洛夫是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 员.....	( 48 )
四、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 65 )
(一) 新风格.....	( 65 )
(二) 经济方针：新斯大林主义.....	( 69 )
(三) 党与社会.....	( 77 )
(四) 新宪法.....	( 83 )
(五) 莫斯科式的缓和.....	( 87 )
五、勃列日涅夫的宪法.....	( 95 )
(一) 一党专政法律化.....	( 96 )
(二) 从联邦制到一体化.....	( 99 )
(三) 共产主义国家体系的基础.....	( 102 )
(四) 列宁论联邦制.....	( 104 )
(五) 苏联式的公民权利与自由.....	( 107 )
(六) 违反宪法精神的“成熟社会主义”.....	( 109 )

六、克里姆林宫的教条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113）

**第二章 对外政策**……………（126）

一、克里姆林宫扩张政策的新阶段……………（126）

二、苏联帝国主义的发展……………（150）

三、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与西方的顽症……………（167）

**第三章 评勃列日涅夫的三篇回忆录**……………（175）

一、《小地》……………（175）

二、《复兴》……………（189）

三、《垦荒地》……………（199）

**结束语：革命会威胁国家吗？**……………（213）

# 第一章 对内政策

## 一、勃列日涅夫的统治

假如西方记者一再传出的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患了绝症的预言实现的话，那么他在最近五年里起码已经死过五次了。但是，对这种事情十分敏感的克里姆林宫，并未对西方“预言家们”就自己领袖的健康散布“流言蜚语”而加以指责。恰恰相反，关于总书记身体不佳的谣言是契卡人员自己向西方透露的，而勃列日涅夫在访问西方（赫尔辛基、巴黎和波恩）时的举止也使西方政治家们确信，他们所接触的这个国家首脑大概活不长了。迄今，历来的外交手腕不过是玩弄“外交病”而已。但是，克里姆林宫却表明，搞一点“外交死人”的把戏也是有利可图的。这当然是预先就有所打算的：“赶快同克里姆林宫快死的“鸽派”签订条约吧，不然明天就将是鹰派”的世界了！赫尔辛基会议就是在这出戏的高峰期间产生的，这次会议给了莫斯科想要的一切，而西方却一无所获。尤其是，克里姆林宫把赫尔辛基会议变成了诱捕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陷阱。他们有些人仅仅是由于要求履行赫尔辛基会议关于人权的决议，不是押进监狱，就是驱逐出境。

国内的“预言家”也把勃列日涅夫看错了。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连那些有一般思考能力的公民都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政权长不了，是个“过渡性”的东西，这倒并非由于他的健康状

况，而是由于他的“平庸”与“无才”。但是，大家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的缺点的东西——“平庸”，却恰恰成了他的优点。正是由于这种“平庸”之道才能领导集体的专政。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被委以重任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然而，人们看错了。勃列日涅夫却已经统治了十五个年头。他的政治生命如此久长，当然自有其原因。他认真研究了斯大林使用权术的成就和赫鲁晓夫作为“唯意志论者”而遭到失败的教训。1964年10月，一些阴谋家把赫鲁晓夫推下了台，他的主要罪名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如果把党的这个哲学术语译成党的政治语言，那么赫鲁晓夫的罪状是破坏了“列宁关于集体领导的准则”，独断专行，不是对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而是凭他的感情冲动行事。因此，他在对内政策上的许多决定是漏洞百出的，自相矛盾的，而且危及到斯大林所创建的政权制度的存亡。（揭发斯大林，在工业管理上搞“地方分权”，改组党的结构，在各级党组织直至政治局实行领导成员定期轮换的原则等等。）毫无疑问，在对外政策上，赫鲁晓夫也受到了批评。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的许多决定被认为是轻举妄动，甚至是冒险主义，因为它缺乏深思熟虑和物质上的准备（柏林问题上的最后通牒、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冒险行动、中断“四大国”的巴黎会晤等等）。中苏关系紧张的责任也可能归咎于赫鲁晓夫；这一点可以用赫鲁晓夫倒台后立即开始同中国对话（苏中两国政府首脑会晤）来证明。应当承认，从国内制度的根本利益和对外全球扩张政策的战略战术任务来看，阴谋家反对赫鲁晓夫是完全正确的。克里姆林宫在赫鲁晓夫垮台后作出的主要结论见之于宣传提纲：今后党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都应立足于严格的科学态度上，立足于分析情况的科学方法上。尊重科学，这是时代的潮流。这个提纲的合理内核是，最上层作出的

任何一项决定，都必须在政治上、精神上，更主要的是在物质上为其顺利实现具备了先决条件之后方可通过。回顾历史的做法也是可取的：由列宁创建、并由斯大林加以完善的苏联政权体系，是以国治人，以党治国，以党的机关治党。因此，这个制度过去和现在都经受住了各种外来的政治考验，但是，如果人们对它的历史罪行的合法性和它那一度稳定的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话，它就濒于崩溃的边缘了。赫鲁晓夫连续不断地进行试验（从揭发斯大林直到无休止的“组合”和“改组”）使整个制度面临着瓦解的威胁。在赫鲁晓夫时代，国内产生了新的气氛，苏联人开始从国家政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国家本身也开始从党的无所不在的鹰爪下解放出来。当然，这并非出于赫鲁晓夫的心愿，而是他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客观结果。这是不能容许的。归根结底，是国家和普通人得了好处，党和党的官吏吃了亏。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的门徒出于高度发达的自卫本能，预见到自己的新导师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是起来搞掉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接任的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统治的经验中得出了最清醒的结论。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根本政策）对他来说也是灾难性的。赫鲁晓夫让年轻的新干部代替保守的老干部，这个政策本来是正确的，但是他做得不慎重，草率从事，而且虎头蛇尾。

早在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时，赫鲁晓夫就犯下了他那个制度下最致命的错误：他让第一次反对自己的阴谋参加者留作自由人，从而注定了他垮台的结局。假如他当时消灭了1957年6月阴谋的参加者，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1964年10月的阴谋。十月阴谋的参加者们确切地知道，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成仁，至多是告老退休而已。

他犯下的另一个致命的错误是，他破坏了斯大林行之有效的制度（即通过秘密“内务办公室”的“特工局”来监督和 control 党、警察和军队），却没有建立任何足以取代的部门。赫鲁晓夫以为，按照党章，他完全可以通过苏共中央书记处来控制党和国家。他以为，他统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会替他说话，因为当1957年恢复政治局（主席团）的时候，是书记处救了他赫鲁晓夫。但是到了1964年10月，恢复书记处的时候，他却倒了台。斯大林靠着他的“内务办公室”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须知，贝利亚及其同谋者反对斯大林的阴谋是在他们借斯大林之手破坏了“内务办公室”之后才得逞的，这一点我已在《斯大林死亡之谜》一书里作了证明。

上面提及的“干部政策”是赫鲁晓夫的第三个致命错误，而且可以说是他的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著名口号“干部决定一切”并不是一句好听的格言。追根求源，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言论里找到这种思想：共产党人为了巩固已经夺取的政权，应当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全部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配备自己的新干部。众所周知，列宁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就是这么做的。当斯大林全面消灭列宁的党、建立自己的得心应手的党时，实质上也是这样做的。赫鲁晓夫诋毁了斯大林的名誉，网罗亲信，保留了斯大林的事业，即用几十年时间严格训练出来的一个耍两面派的党。不错，赫鲁晓夫清洗了这个党，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他激怒了这个党，没有防止它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他挑动了这个党，却没有防范可能发生的动乱。同时，他非常冒失地几乎同时与党内所有的实力派发生了冲突：他冒犯了契卡分子——让成千上万的契卡分子退休领养老金，他得罪了党的专职干部，想出了一个“经常不断更新的原则”，并作为准

则，用党章法定下来；他同将军们过不去，裁减军队，让他们一部分人退役，一部分人则当了国营农场场长；他还同中央的官僚集团发生冲突，“分散”权力，把他们遣送边远地带。

斯大林在定期轮番清党方面是采取另一种办法。他搞了三次大清洗：1929年、1933年、1937—1938年。结果，从1933年的3,555,338个党员减少到1938年的1,920,002个党员。因此，有1,635,336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自动就缚。（见《党的生活》1977年第21期第21页）（我想借此机会纠正一下我过去一个不确切的数字。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材料，过去用的数字是在叶若夫时期被清除的共产党员为120万人，这个数字是通过党的各种渠道得到的。现在查明，当时被镇压的共产党员为40万人以上。）

斯大林搞清党的次序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大清洗”的次序是：从1936年夏到1937年夏，首先清理群众（在城乡进行大规模逮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三人小组”提出指控）；从1937年夏到1938年秋，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清理党和军队；从1938年底到1939年春，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上到下清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个时期，尽管清理党、警、军以及国家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全面展开的，但是没有发生危机。有远见的斯大林事先培养了大批象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流的后备干部，由他们顶了空缺。斯大林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上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50多万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和党的领导职务。”（见《列宁主义问题》第597页）换言之，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以崭新的党为后盾的崭新的政权机关。他以此保证了他的政策的胜利和他个人独裁的安全。跟随斯大林学习了20多年的赫鲁晓夫却根本



不懂得斯大林政权的这一诀窍。而隔任的勃列日涅夫却出色地掌握了它。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需要清党，过去的斯大林的党也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党。所要恢复的仅仅是被赫鲁晓夫破坏了的对斯大林统治机器的信念。因此，不仅应当停止批评“对斯大林的迷信”，而且应当停止批评他的错误。要公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就得公开取消两次党代表大会（第20大和第22大）的决议，然而当时参与其事的，除了赫鲁晓夫之外，还有现在政治局里的全体成员，这样做不仅在国内，而且会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新的混乱（同时也表明新领导的无原则性）。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让以朱可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军官出面恢复斯大林作为一名卓越的统帅的名誉；让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历史文件中恢复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和列宁的学生的名誉。

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5月德苏战争结束20周年时所作的报告，便是“新斯大林个人迷信”浪潮的第一个正式信号。从20大以来的八年中（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以及苏联的元帅和将军们的口里），党和人民所听到的，是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犯了极大的错误，是战争初期由于斯大林的麻痹，或者由于他在战役问题上的一意孤行而造成了一个一个军团的溃败与毁灭，现在，人们非常震惊地听到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在约·维·斯大林的领导下赢得了战争！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官僚机构都动起来了。党中央是非常清醒的首脑机关。它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是偶发性的无的放矢。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上作出荒唐的事。一时间，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思想家的文章和元帅们的回忆录，都纷纷出笼为这个被赫鲁晓夫“搞臭了的”斯大林辩护，这是中央在反对“个人迷信”的运动中得出了

痛苦的结论，因为把斯大林与苏维埃制度对立起来，就等于宣判了这个制度的死刑。（据说，那些年代里民间传着一句攻击苏联那些没有良心的官僚主义者的话：你们不是斯大林时代的人！这句话曾经被认为是第20次代表大会的赞词，而今天，勃列日涅夫却会因这句赞词而把自己的公民送进疯人院。）

恢复斯大林的名誉绝不是为了恢复历史真面目或者恢复对斯大林的公正评价，它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给斯大林恢复名誉是为了给他的统治制度恢复名誉。这才是勃列日涅夫过去和现在所推行的重新斯大林化的本意所在。当然，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已永远寿终正寝了，但是，它的某些组成部分将会永远存在。这些成分中的许多东西已被勃列日涅夫制度加以利用。

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他的关于管理“共产主义”国家的学说，而它对列宁主义的实际贡献，就是成立“内务办公室”的思想。“内务办公室”这个名称本身，没有必要加以阐述。西方对它的叫法也很不一样，就连斯大林也没有把自己的办公室叫做“内务办公室”（中央文件里只是简单地称之为“约·维·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和“特工局”）。

党和国家的各种高级合法机关（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监督机关）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继续发挥其职能作用。控制这些机关并掌握大权的是一些著名的党魁。他们签署并公布各种决议，但斯大林本人（在1941年5月以前，他没有正式担任政府职务）却很少出面。然而，他们通过和签署的决议却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不仅中央委员，而且连政治局委员也只是通过同斯大林偶然的谈话，或同他的助手的谈话，或从报纸上才知道许多以他们的名义签发的极端重要的决议。由党和国家官方机关签署的党的决议和国家法律，都是以阿·波斯克列贝雪夫将军为首的斯大

林“内务办公室”草拟的，这一点我已在另一本书（指《一党专制的由来》——作者注）里作了详尽的介绍。波斯克列贝雪夫本人既非中央书记，又非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但是，象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这样的政治局委员也都怕他三分。

波斯克列贝雪夫领导的这个办公室的“特工局”是斯大林的独创发明。“特工局”是斯大林个人政治警察的领导中心，它不受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局（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管辖，反过来还要监督它们。为了防止潜在的阴谋活动，“特工局”领导斯大林的整个安全保卫网，也领导监督党、警、军上层人物的整个间谍网，以便预防潜在的阴谋。（斯大林喜欢用“特工”两个字来掩盖自己的契卡机构，如军队中的“特工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特工会议”等等。）赫鲁晓夫在恢复“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准则”时，取消了“内务办公室”，也取消了“特工局”。从而恢复了政治局在确定大政方针方面以及中央书记处在领导日常工作方面大权独揽的职能。赫鲁晓夫自己作出的各项决议都通过这些机构来贯彻，而他的私人办公室则变成了中央第一书记的十分普通的办事机构。恢复“列宁主义准则”的结果是，在莫斯科的赫鲁晓夫私人办公室和正在索契休假的赫鲁晓夫本人直到最后才得知，阴谋家已经在莫斯科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已失去了第一书记的宝座。

我们接着就会看到，勃列日涅夫是如何吸取了他前任的这种教训。新的第一书记起先表现得谦恭温顺。他不是官腔官调地喊着“同志们”，而是首先亲昵而甜蜜地称呼“亲爱的同志们”；他不象斯大林那样以不容反驳的口吻或者象赫鲁晓夫那样以命令的架势来说话，而是装扮成对党顺从听话的样子。他就是以这种姿态在他的第1次代表大会（1966年）上讲话的。下面是他在

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新风格的典型例句：“我们必须商量一下，是否应该……”云云。（见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材料，1966年，第53页）一个有自信心的党的领袖是不会这样讲话的。勃列日涅夫在他上台一年半以后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上，为重新斯大林化作了实际准备，先是恢复斯大林政权的外部特点。勃列日涅夫引用几个共产党员的虚构信件和借口所谓“列宁主义传统”，建议将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而一个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发言人根据上面的提示又建议把中央第一书记的职称改为中央总书记。人民和党从来没有把政治局同列宁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一向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列宁在政治局积极工作只不过3年多时间（1919—1922年），斯大林却工作了整整33年（1919—1952年）。斯大林一直当了30年的中央总书记，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名，但是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成了总书记。要理解和估价这次易名的深刻的象征意义，必须探讨党的干部的内心奥妙：在他们看来，政治局是诸神的最高主宰，而总书记则是最高主宰之神！至于第一书记，党内有成千上万个，主席团就更多了，从村和市的苏维埃直到各地的最高苏维埃，共有几万个。政治局却只有一个，总书记也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从来没有以总书记的名义签过字，也不让别人这样称呼他。总书记的头衔只是放在括弧里，也不用大写字母标出，只有一次直接放在斯大林的名字后面，那是在中央组织工作全会的记录中列举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的时候。）

在第23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派达到了目的：在党章中第一次规定，总书记应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这意味着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罢免他。勃列日涅夫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别人象他自己对待赫鲁晓夫那样来对待他，那时他通过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罢

免了赫鲁晓夫，事后才让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急急忙忙排除了赫鲁晓夫在22次代表大会时悬在每个党的干部头上的达摩克洛夫剑，这指的是新党章中规定的各级领导机关直至中央主席团在每次选举中必须更换25%至50%的条款。这就恢复了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原则：党的干部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终身职务，各级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所谓选举，也不过是摆摆“党内民主”的样子而已。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勃列日涅夫有朝一日会当上党的大权独揽的新领袖。他迄今所做的一切，改变名称和消除赫鲁晓夫遗留的组织混乱等等，似乎都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当时赫鲁晓夫看中的“皇太子”——科兹洛夫病了，于是任命勃列日涅夫为党中央第二书记，把他当作自己的知交和忠实门徒。勃列日涅夫尽力讨好赫鲁晓夫，使他产生错觉。大概，当密谋者让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的时候也同样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这个与之打交道的人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而将是他们新的“集体领导”的集体意志的驯服工具。勃列日涅夫也尽力加强他们的这种信念，在他掌权初期，党报党刊所关心的，是不要再破坏党和国家的“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今天重提“集体领导”就是有害的了。）

但是，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大林分子是心口不一的，他说的一套，想的却是另一套。要了解他当时的想法，并不需要透过他的灵魂。他记住了斯大林的信条：只有你提拔的人，才会对你矢志到底，感恩戴德，并在你遭到不测风云的时候，与你患难与共。但是，同勃列日涅夫一起搞阴谋的人却并不感谢他，相反倒是勃列日涅夫要感谢他们大家。尤其是，在1964年10月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就是推翻赫鲁晓夫的那次会），他们通过专门

决议来限制他的权限，决议规定今后中央第一书记不得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这么做的）。这里还得补充一个重要情况：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有的人论政治资本来说并不亚于勃列日涅夫，其中多数人论经验、资历和功劳都超过他。这一点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逐步把这批人中的大多数从党的高级机关排除掉，并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才能爬上党的领袖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慎之又慎、坚韧不拔并有条不紊地利用斯大林的种种权术手腕。不妨举几个例子：为了贬压自己的主要对手谢列平，勃列日涅夫首先把他派往西德（德国法庭曾经做出判决：作为昔日克格勃的首脑，杀害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班德拉和雷贝特教授的组织者，只要他在德国出现，将立即予以逮捕，但是德国人却有意藐视他的出现。）随后又派往伦敦，因为勃列日涅夫已预先得知乌克兰人将在那里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刽子手，许多国会议员也将公开抗议克格勃前头目进入英国。

勃列日涅夫导演的这出对付谢列平的丑剧演得十分成功。谢列平回到家里后才得知，即使他不去国外，他也当不上同国际上保持着广泛联系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了，因而也不可能当政治局委员了。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十分明显的圈套。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总书记的竞争对手波利扬斯基被拉下马，任命他担任苏联农业部长，以便于集中精力“发展农业”。但是，连最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也知道，既然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未能把苏联农业搞上去，那么波利扬斯基也是无能为力的。波利扬斯基不久便垮了台。他被开除出政治局，派往遥远的日本过着外交流放生活。

第三个例子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铁腕人物谢列斯特，他被指控为同情……遭到他残酷镇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一切职务。

第四个例子是在阴谋反对赫鲁晓夫时态度暧昧的米高扬。以“年迈体弱”为理由撤掉了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并赶出了政治局，尽管在当时，1965年，他的年龄比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佩尔谢还年轻十岁，比现任主席勃列日涅夫年轻三岁。

第五个例子是沃罗诺夫。他从政治局里消失得如此突然，以至谁也不知道给他罗织了什么罪名和他干什么去了，官方所谓的“退休”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要知道，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年龄界限。

第六个例子更加典型。阴谋是精心策划的，废除(宪法)的手续简直是开玩笑。勃列日涅夫司令部搞了个新宪法，它同斯大林的宪法一样，是个没有用的一文不值的東西。直到新宪法批准之后我们才得知，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个人需要它。原来，聪明的御用理论家竟然在新宪法里加上了一条连列宁和斯大林都不敢涉及的条款(见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司令部便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条结论：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当然的苏联国家元首。因此，只好给波德戈尔内安排一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的职位。波德戈尔内非常生气，拒绝就职。于是，勃列日涅夫派干脆把他赶出政治局了事。对此，报上未作任何说明，既没有说应他的要求、也没有说是健康原因或是退休领养老金。中央全会有关这一决定的公报措词严谨，只用了两个字：“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是破坏了中央10月全会(1964年)的(并未废除的)决议。把国家首脑职务

集于自己一身。

第七和第八个例子涉及到所谓“马德里宫的秘密”，不过，马德里的机要员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工作者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还有两个人——格列奇科和库拉科夫——从政治局里消失了，他们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宠臣。前者是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死后担任国防部长而作为军队代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党的官吏当时曾想让自己人乌斯季诺夫担任这一职务，但是总参谋部和老师们却任命了格列奇科元帅（勃列日涅夫在《小地》里对格列奇科的贬意说明了总书记对他并无好感）。库拉科夫是苏斯洛夫集团的人，曾被认为是总书记的竞争对手。因为这两个人同斯大林在世时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一样死得那么“突然”，因此怀疑论者便议论纷纷，莫非斯大林的“心肌梗死”，传给了这两个死者。伦敦研究刊物《苏联问题分析家》就库拉科夫之死发表了专文。这家刊物于1978年7月13日恰好写到库拉科夫具有成为中央总书记的好条件，莫斯科就在7月17日宣布他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死亡。当然，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是，作者感到奇怪的是，库拉科夫患有多种疾病，为什么直到他死后才为国内所知。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病人还承担着那么繁重的任务，他既是负责农业问题的中央书记，又代表政治局参加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医疗委员会对库拉科夫死亡作出的令人生疑的详细报告，该刊作者指出，“由于苏联舆论界知道，斯大林应对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的谢尔盖·基洛夫之死负责，所以需要七名挑选出来的医疗专家来详细说明可能成为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库拉科夫之死是属于自然死亡。然而恰恰是这些引人注意的证词在苏联的普通居民中引起深刻的怀疑。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都没有去参加7月19日举行的葬礼



时，这种猜疑就更甚了。”（见1978年7月27日在伦敦出版的《苏联问题分析家》第15期）这篇文章的结尾是：“克里姆林宫的里里外外都提出一个问题，下一次该轮到谁下台？”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天不建立各文明国家所通用的任免制度，即公开选举的制度，这些问题是永远要提出来的。不过，过不多久，我们便知道“下一个是谁”了，这次该轮到基·特·马祖罗夫，他是“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要求”而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他是年老的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经常参加各种大型会晤。就在他被解职的前一天还参加了为华沙条约会议代表饯行的国宴。但是，他有三个缺点：太年轻自负，没有因为提升而对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而是自以为能干。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幸存者尚有5人，突然死亡的2人，解职的7人。

勃列日涅夫对苏共22大选举的中央书记处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当初进入书记处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科兹洛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库西宁、波诺马廖夫、斯皮里多诺夫、苏斯洛夫和谢列平。除了伊利切夫和多病的科兹洛夫外，他们都参加了反赫鲁晓夫的阴谋。但是，其中有4人被革职（伊利切夫、斯皮里多诺夫、谢列平和杰米契夫），两人死亡（库西宁和科兹洛夫），两人幸存（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后来，书记处补进了8名新委员，其中4人是勃列日涅夫的嫡系（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和多尔基赫），另外4名是苏斯洛夫的人（库拉科夫、卡图谢夫、索洛缅采夫和卡皮托诺夫）。这种“力量平衡”由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担任政府职务而晋升（成了政治局委员），卡图谢夫、杰米契夫和索洛缅采夫虽任职而没有提升（因担任政府职务而自动离开了中央书记处）遭到了破坏。勃列

日涅夫及其“内务办公室”就利用这种形势大刀阔斧地改组了书记处。现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已经在书记处居多数。书记处内除了勃列日涅夫夫人之外，有5名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基里连科、契尔年科、多尔基赫、齐米亚宁和里亚鲍夫）；苏斯洛夫和另外两名苏斯洛夫分子（波诺马廖夫和卡皮托诺夫）。在11月中央全会上（1978年）选进中央书记处顶替已故的库拉科夫的是米·谢·戈尔巴乔夫，他可能是苏斯洛夫的候补人，随后，勃列日涅夫“私人办公室”主任康·乌·契尔年科也选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两个亲信：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亚·吉洪诺夫和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党内上层进行“悄悄清洗”的结果。克里姆林宫对待下台的国务活动家采取的报复态度，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是违反国法的。在西方，下了台的政治家可到别的国家去执行某种特别使命，就各种复杂问题咨询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国家委员会，并尊称他们为“政界元老”，然而苏联的积极活动家却是另一种命运。当记者们向葛罗米柯问及某些前政治局委员的命运时，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政治局就象神秘的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从这里出现，有的人在这里突然消失！”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把自己的政敌或总书记的竞争对手清除出政治局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领导机关的权力调配：从政治局到书记处，然后从书记处到总书记的秘书处，无一例外。这个过程至今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效：勃列日涅夫已被确认是党的唯一领导，他不仅驾驭中央书记处，而且也驾驭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斯大林是在“大清洗”之后才达到权力的集中，赫鲁晓夫却不能达到这种顶峰，所以反对他的阴谋才得以

成功。不过，这里要说明，斯大林式的权力集中并不等于勃列日涅夫也能象斯大林那样运用这一权力来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因为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是建立在党、警察、军队三足鼎立的基础上的。官方宣传机器给人们灌输一种印象：似乎这三种势力的内部是协调一致的。其实，他们不仅在部门之间，而且在总路线上都存在着明争暗斗，以便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施加压力。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在于，他能在他们之间巧妙地周旋，设法从内部控制他们（任命一批又一批可靠的人），或通过自己的司令部来加强中央的监督。

现在，我们紧接着要谈到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勃列日涅夫的“内务办公室”起什么作用？勃列日涅夫在他统治的余年里是否打算放弃“三角政权”中的“经纪人”角色，而成为一个独裁统治者？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办公室”或者“内务办公室”早已“站稳了脚跟”。它在党内文件上是按斯大林的方式被称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秘书处”还是象以前那样叫做“中央总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的实质。即“办公室”在党和国家上层结构中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及进入这个“办公室”的是什么人。当然，官方报刊上一些干巴巴的简历很难说明这些人的工作性质和心理状况。在这里，最重要的人物要算是在中央委员会里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康·乌·契尔年科了，他可称是勃列日涅夫的波斯克列贝雪夫。他是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主任，生于1911年（比勃列日涅夫小5岁），但是与勃列日涅夫同年入党（1931年）。这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吏。四十年代初期，他先后担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和奔萨州党委书记。1945年在中央党的组织者高等学校毕业，从1948年起，他在摩尔达维亚中央委员会工作，并从1950年起

与勃列日涅夫共事。1953年，他得到了他自己管辖下的基什尼奥夫师范学院的毕业文凭。1956年，勃列日涅夫把他从摩尔达维亚中央委员会调到苏共中央，在自己手下工作。从那以后，他的功名前途便与勃列日涅夫牢牢地拴在一起了。1960年，勃列日涅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也把他带在身边。1965年，勃列日涅夫让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取代了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马林。次年，在党代会上又把他提为中央候补委员。

平时，总务部仅仅是中央的一个办事处。所有的文件（包括一般文件和机要文件）都由此收发。未经这个部打印的中央文件都是非正式文件。这个部也收发各种内外机要文件。当斯大林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变成“内务办公室”，并在此基础上把原来的“机要局”（它以前属于总务部）变成“特工局”的时候，总务部实际上成了中央一个普通的办事处。斯大林死后，取消了“特工局”，大概又在总务部里恢复了原先的“机要局”。现在这个总务部在契尔年科的领导下，变成了勃列日涅夫“内务办公室”的一部分。至于现在这个“办公室”的作用，可以通过比较作出判断：斯大林“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雪夫只不过是一名中央委员，而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主任却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委员。这个“办公室”的全部成员（正式名义是总书记助理）除了一人外全部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者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们的名字经常见报。

可以说，在总书记的“助理”中，除了总书记的总助手契尔年科外，名列第二位的是康·维·鲁萨科夫。他1909年生，1943年34岁时才入党，是一位工程师，在斯大林时代担任过苏联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他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身边工作，当过大使。从1960年起在中央工作。1972—1977年，他

的头衔为总书记助理，从1977年起晋升为苏共中央书记。

总书记的第三位助理是格·埃·楚卡诺夫，1919年生，1941年入党。工程师，同勃列日涅夫一样，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但比勃列日涅夫晚几年。从1937年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工厂里工作，并在那里认识了勃列日涅夫。从1958年起，他在苏共中央工作。1960年同勃列日涅夫一起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3年，又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回到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总书记的第四位助理是阿·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1918年生，1948年入党。1940—1961年，先在塔斯社工作，后来又苏联外交部工作。1961—1963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担任勃列日涅夫的首席专员。1963年，同勃列日涅夫一起转到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在勃列日涅夫助理中除契尔年科之外的第2名“人文学家”；194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

总书记的第五名助理是阿·伊·勃拉托夫。1914年生，1940年入党。1940年，当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时，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铁路交通工程学院毕业。1945年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从1948年起，他在苏共中央工作。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总书记的第六名助理是维·安·戈利科夫。1939年入党，是苏共第24大和第25大代表。

这便是勃列日涅夫“办公室”领导成员的简历。由此可见，这个“办公室”的资格与政治局相当。“办公室”成员的平均年龄几乎达到65岁，而办公室主任契尔年科已经68岁，都是垂暮之年，好景不长了。但是，他们都是权术场上的老手，是勃列日

涅夫篡权的可靠支柱。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有组织有步骤地把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办公室”。为了使这种转移不至于象斯大林时期那样，被人看作是篡夺中央各主管机关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把自己“办公室”的成员塞进党的高级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其中的两人已经当上中央书记。这就造成一种既成局面：中央有关部做出的有待政治局批准的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能越过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而要预先求得它的同意。这也直接涉及到统管党的干部政策的中央书记处（任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中央的干部政策由苏斯洛夫分子卡皮托诺夫掌管。他是中央组织部（从前叫做干部部）部长。组织部负责直接挑选州委一级的干部。其他干部也得经它同意才能任命。当然，对于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来说，对组织部进行直接监督乃是至关重要的事，何况“办公室”主任契尔年科不仅被认为是“干部政策”的有经验的实践家，而且是共产党的“干部科学”（“党的建设”）的公认的理论家（契尔年科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研究著作）。为了使契尔年科的地位高于没有进入政治局的其他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竟然越过在各方面都比契尔年科强的卡皮托诺夫，而把契尔年科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卡皮托诺夫从斯大林时代起就是中央委员，1952—1954年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州委会第一书记，从1965年起当上苏共中央委员）卡皮托诺夫作为一个严守纪律的党的干部，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勃列日涅夫的决定，听命于契尔年科。

遵照斯大林通过清洗来更换干部这一经过检验的理论，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不仅在中央全会上，而且在党的各级组织里都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党的要害部门，包括州委会和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是经过“内务办公室”筛选的新人。甚至那个批准推翻赫

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也遭到了大清洗。在22大选出的175名中央委员里，有82人失宠废黜（退休或下放），12人死亡。共计占中央委员的50%。这些人都会被“自己人”所顶替了。因此，当你了解这些新的“领导人”的履历时，往往发现这些人都是同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老百姓称之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和莫斯科一起工作的人，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因此，勃列日涅夫提拔的多数都是些老家伙，当然，这些老家伙的子女除外。（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你会遇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出身高贵”，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任命为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就是其中一例。）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勃列日涅夫“悄悄清洗”的过程和结果，就不难发现，他除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外，别无其他动机。那些一个接一个地被他赶出党的高级机关的党的活动家，并没有象斯大林时期或赫鲁晓夫时期那样持“反动立场”，也没有搞过“反党集团”。没有人提出过与勃列日涅夫相异的对内对外政策。另外，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没有象现在所证明的那样打算采取某种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把那些潜在的“怠工者”清洗出去。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也不大可能去建立个人独裁。他既没有“铁腕人物”的意志，也没有青春的活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守住摊子，在党、警察、军队“三角政权”中保持“力量平衡”。为此，除了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敌人从权力顶峰清理掉之外，别无他法。

从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和赫鲁晓夫不流血的独断专行的历史中，我们得知，善于让党、警察、军队服从他个人专政的总书记，首先就是从这些人开刀。他搞了不止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地和有系统地进行着。斯大林是杀掉他们的头，赫鲁晓夫是简单地

把他们赶下宝座。这两种做法，使党、警、军的上层人物都感到惶惶然。为无辜的脑袋时刻感到心惊胆战。第20次党代会就是党内的奴隶们由于害怕而起来造了斯大林的反。反斯大林的发起人赫鲁晓夫却逐渐忘记：奴隶们起来造反绝不是为了让一个奴隶主代替另一个奴隶主，而是为了从个人独裁专制转为集体专政，以保证这种专政的物质基础：党、警、军三者的安全。勃列日涅夫制度之稳定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勃列日涅夫在这三种势力反对赫鲁晓夫独断独行的过程中得到了高升。这三种势力中的每一种势力都把勃列日涅夫看作自己人，无论是和平时期的党的干部还是战时军队里的政工人员（介于党和警察之间的边缘人物），勃列日涅夫都同他们相处得不错。他在回忆里非常自豪地强调，在他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他直接领导了契卡机关（见《新世界》1978年第5期发表的勃列日涅夫的《复兴》）。把相互矛盾的，有时甚至互相对抗的部门——党、警、军三者的利益捏合在一起，是一门相当高超的艺术。勃列日涅夫相当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艺术。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在于，在一些场合下，他善于迎合他们，投其所好，在另一些场合，他又能在他们之间随机应变。他的弱点在于，不是这些力量取决于他，而是他依赖于这些力量，因为他并非他们的首领，而是他们的公仆。他可以让自己挂满各种勋章和戴上各种官衔，但是，他未必敢同“三角政权”中的任何一“角”发生冲突，否则就得完蛋。这种稳定性是在大力宣传（通过报刊、电视、电影和绘画）新的“对勃列日涅夫的迷信”的情况下取得的。这种做法并非创新。勃列日涅夫的助手给自己的上司搞“个人迷信”，同勃列日涅夫之流当初吹捧其前任的做法如出一辙。什么“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啦、“杰出的革命家”啦、“精深的理论家”啦等等美名由



斯大林传给了赫鲁晓夫，又由赫鲁晓夫传给了勃列日涅夫。苏联每一个有分析批判能力的公民都知道，说勃列日涅夫是革命家，那是虚有其表，说他是理论家，那是扯淡，说他是演说家，却只会念念别人写的稿子，然而作为权术家，却是十分高超的。对于他的这一真正过人之处，苏联报刊却是一字不提。

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是历史上空前的党警机器——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的杰出能手。否则就不可能爬上一党专政的顶点，即使爬上去了，也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一党专政不仅是一种警察制度，而且是一种思想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领袖同时也是传道者，他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个人可以确定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可以抛弃一些过时的原理，而做出新的“创造性贡献”。他还可以对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从思想上加以论证。因此，最近七、八年来，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为了给总书记塑造一副大理论家的所谓“形象”可真忙得不亦乐乎。在康·乌·契尔年科总的领导下组成了党的写作班子，负责编写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和报告。其中，有写国际问题的班子（由总书记助理亚·米·亚历山德罗夫负责），写内政问题的班子（由总书记助理格·埃·楚卡诺夫负责），写“党的建设”的班子（由总书记“办公室”工作人员维特罗夫负责）。有些连勃列日涅夫本人还没有来得及读的长篇大论，就以他的名义一本本地涌进了党的书市。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的六卷集（由他的助理亚·米·亚历山德罗夫负责编辑）和勃列日涅夫的专题汇编一版再版。这些书籍翻译成苏联各种民族语言。莫斯科把其中的许多书译成了西方语言和第三世界各国的语言，东欧国家为了表示“团结一致”也主动加以翻译。总书记的助理们一面把勃列日涅夫吹捧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列宁事业的继承者”，同时，还追

求另外一个党内的目的：贬低苏斯洛夫作为党内主要理论家的声誉（见后面《克里姆林宫的教条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一章）。

虽然我一开始曾强调我对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的猜测持怀疑态度，然而由于他的73岁高龄（与斯大林当时的年龄一样）不能不承认他的统治已接近尾声。因此有必要对他的内外政策活动进行一番简单的总结。一个政治家，当他打算为国家这条大船掌舵时，一般来说，他对于这条船的航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他宣称自己将继续执行前任的既定方针的话，那么他肯定是打算把这种方针推行得更远更好。斯大林曾想成为“今天的列宁”，“赶上和超过美国”；他的确超过了列宁，但是没有赶上美国。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想要在1980年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见苏共纲领），但是他的非斯大林化没有搞成，在接近1980年的时候，他的“共产主义”也无影无踪。那么勃列日涅夫的打算又是什么呢？他在自己的六卷集中作了回答：让苏联的航船沿着《列宁主义的方针》前进！凡是分析过这部六卷集并仔细研究过勃列日涅夫统治实践的人都知道，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列宁主义方针”的含义是：（1）在国内政策上，在各种类型的武器生产上“赶上和超过美国”；（2）在对外政策上，随着武装计划的成功，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回到当初列宁的全球战略和革命迅猛发展的轨道上（其口号是：“我们出武器和指导员，你们出钱和士兵”）。

谁能否认，苏联正在胜利地实现这一计划呢？就许多种类的导弹和热核战略武器的生产情况看，苏联已经赶上了美国（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承认了战略均势的形成），其他类型的热核武器和导弹武器，苏联正在超过美国，这将载入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一切统统称之为“限制战略武器”！）。

至于常规武器的生产情况，苏联已经超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总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破天荒地成为海军大国。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海洋里没有苏联海军在出没；苏联在水上炫耀实力；在水下则侦察别国的实力。在武器生产（军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最有效的部门）方面，这种大发展是通过压缩国内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来实现的。因此，苏联的军事预算早就“赶上和超过”了美国。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材料，1976年全世界生产武器的费用为3,989亿美元。

在大国之间，这个数字的分配情况如下（以10亿美元为单位）：

1, 苏联	127
2, 美国	91
3, 中国	34.4
4, 西德	18
5, 法国	14

（《南德意志报》1978年7月25日材料）

武器出口量：

1, 美国	5.2
2, 苏联	3.7
3, 法国	0.84
4, 西德	0.656

（材料来源同上）

革命前，俄国在粮食出口方面仅次于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占第二位；现在，它却在武器出口上次于美国而跃居第二位了，而且很有可能取美国而代之（同时，在粮食进口方面苏联已跃居世界第一）。

然而，美国资本家的武器出口与苏联共产党人的武器出口之间有着本质区别。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收入，共产党人关心的却是政治；苏联拿出了几十个亿来保障越南共产党人的胜利，赢得的却是一个靠它喂养并靠它帮助来恢复经济的不大可靠的盟国。莫斯科花了30亿美元的巨款，在埃塞俄比亚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至于它要花多少美元才能把前葡萄牙殖民地变成马克思主义国家，还没有人确切地统计过。克里姆林宫仅仅给非洲国家提供武器装备方面就花去了70亿美元（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最高司令亚·黑格上将的讲话——引自《南德意志报》1978年2月12日材料）。当然，有的时候，武器拿去了，随后就“翻脸”（如印度尼西亚、埃及、苏丹、索马里），但总还是得分多于失分。勃列日涅夫无需派出一兵一卒，只消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就可以用苏联的武器和装备在别国进行共产主义的政变。如果哪个国家需要通过国内战争来达到这种目的，勃列日涅夫便把古巴人组编的“外籍军团”派过去。为了供养古巴，莫斯科每年需要拿出600万美元。

按军费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计算，苏联的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国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由9.4%减到5.4%，苏联却与此相反，它的军费从11%增加到13%（某些专家认为是15%以上）。（见伦敦《会见》杂志1978年9月刊登的拉别扎的文章）

近10年来（截止1976年），武装力量的数量也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兵员由660万减到440万，而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却从520万增加到600万（见同期的《南德意志报》）。这样一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维埃警察国家第一次变成了苏维埃军队警察国家。因此，来自莫斯科

的战争危险和军事革命冒险要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现实得多。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美国人不久前建立了一个“东西方协调委员会”，想给美国舆论灌输一点麻醉剂。其中一个主要成员、不久前还被苏联刊物称作“冷战贩子”的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写道：“勃列日涅夫是个和平人士！”当人们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以及苏联的空军、海军在世界各地活动为例来批评他的这一论点时，凯南回答说：他指的是“勃列日涅夫显然不愿意看到俄国同西方强国进行大规模战争”，而不是指“苏维埃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越轨行为”（见同期的《会见》杂志第36页）。不幸的是，这种“越轨”行为正好对准了列宁谈到世界革命时的所谓“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

既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都不相信苏联有着争霸世界的计划，更何况是凯南呢，凯南直截了当地承认，“宁可赤化，也不能当死人”（理查德·波普斯教授回答他说，“我想成为一个自由的活人”）。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明镜》周刊同基辛格的一段对话：

《明镜》周刊问：“您认为俄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基辛格答：“苏联作为俄国历史的继承者，对自己的安全十分敏感。因此发展成对武器的爱好……也许可以说，共产主义制度只有在武器储存这个唯一的方面胜过其他国家。确实有一种顽强不屈的倾向要使国家变得更好。”（见1978年7月31日出版的第31期《明镜》周刊）

一个国务活动家，对苏联扩军备战的原因编造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理论，当然就不会相信人们说的苏联生产武器是为了有效支

持其全球扩张政策的话罗。所以有一些人把基辛格博士看作是当代的克劳塞维兹，另一些人则把他看作是当代的梅特涅，因为基辛格说：“不管那里发生什么，我不相信存在着世界霸权的具体计划”，但是他又相当谨慎地补充说：“我所说的没有具体计划，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也不会利用革命世界的局势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掌权。”（见上述周刊第88页）

西方竟然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在磨刀霍霍地准备给它一击——这也是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优势之所在。

但是，制造武器的目的，不仅是杀人或做买卖，也是为了进行威胁。武器越厉害，它造成的威胁也越有分量，也就越能使对方俯首听命。斯大林没有动一刀一枪就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比萨拉比亚，这是进行威胁的结果。希特勒也没有开一枪一炮就拿下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也是在必要时进行强大威胁来达到的。勃列日涅夫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动用没有受到抵抗因而也没有进行射击的坦克。他用同样的坦克来使东欧国家俯首贴耳，如果哪一个国家敢于对抗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那就不客气地要以开火的坦克相威胁了（即所谓“有限主权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今天，实际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不接受勃列日涅夫的威胁。反过来，由于屈服于美国的威胁，苏联退出了伊朗的阿塞拜疆部分，解除了对柏林的封锁，从古巴撤除了导弹。世界和平是建立在威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纸空文的条约上。

西方有幸的是，现在坐镇克里姆林宫的既非列宁，也非黄金时代的斯大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学生已经丧失了列宁的革命理想和他的胆略，也缺少斯大林的铁腕和他捉弄西方那些最狡猾的政治家的天才，然而他们学会了两种本领：革命颠覆的手段和

政治讹诈的学问。这两种本领几乎渗透克里姆林宫现行的整个国际政策。只要熟练地掌握了这两种本领，“不学无术”的勃列日涅夫就能比国际舞台上的对手胜出一筹。由于苏联武库日益明显的优势使他得以推行战争边缘政策，乃至核战争边缘政策（苏联的军事理论认为可以在核战争中取胜），他正在对整个国际政策的发展施加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估计在今后几十年内，美国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同共产主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勃列日涅夫及其军人警察集团便可以放手解决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来建立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勃列日涅夫统治之所以稳定不变，其重要条件是他善于在不很协调的党、警、军“三角”势力中纵横捭阖，使他们暂时捏合在一起。为了防止他们同上级领导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出现危机，勃列日涅夫的办法是不断派自己的干部去更新警察和军队的机关，这些干部显然不算年轻，但却是最信得过的。在军队里这个任务比较简单，因为主要干部（如总参谋部）都是由平均年龄接近于勃列日涅夫的65至70岁的老头子组成的。将官们都快要退休，元帅们参加了“苏联国防部总监组”（为光荣退休的老师们建立的研究所）。勃列日涅夫通过这种比较稳妥的方式把腾出来的高级指挥员职务交给自己选中的高级技术专家和比较稳当的（现役的）“苏联英雄”。这就产生了苏联军事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情况：撇开了卫国战争中几十名功勋卓著的统帅而任命党的机关干部和工程师乌斯季诺夫为苏联国防部部长，任命军事工程师奥加尔科夫为总参谋长，随后又把他俩晋升为元帅（工程兵中第一批成为苏联元帅的代表人物）。当然，现代化军队是机械和计算机的军队，但是指挥军队的终究不是机械专家，而是

指挥军队的专家——指挥员。高级指挥人员“技术化”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党的机关干部被朱可夫元帅的野心吓得要死，不愿再让那些具有独立军事政治见解的指挥官来统帅军队。因此，继任格列奇科元帅的不是另一个元帅，而是党的机关干部；担任总参谋长（在库拉科夫元帅解职之后）的是比库拉科夫大好几岁的工程兵官员。高级指挥人员“技术化”的做法在各兵种里推行起来就容易多了。

当然，政治警察作为制度的核心，过去和现在都是勃列日涅夫注意的中心。勃列日涅夫本人象其他部门的党的机关干部一样，一辈子都害怕警察。他心里明白，他在党里的官运亨通不是靠他自己在会上作几次有关政治路线的报告，而是依靠那些暗中监视他的当地契卡分子向中央所作的政治汇报。他还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登记卡片”从来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却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个人档案”。勃列日涅夫过去害怕这个机关，现在仍然害怕这个机关。但是，列宁有一条明确的、不容置疑的经验被斯大林学来了，后来又被勃列日涅夫从斯大林那里学来了，这条经验是：“没有这个机关，便不可能有劳动人民（即共产党员——本书作者注）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27卷第140页）列宁只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到，苏联政治警察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它毕竟只是苏维埃国家的一个部门（如同司法部、卫生部等那样）而已。因此，在建立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全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草案里，列宁建议国家政治保安局采用分权的办法，斯大林却与此相反，他要求各加盟共和国政治保安局直接隶属于莫斯科的国家保安总局。斯大林的主要想法是：苏维埃国家只能作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警察国家才能存在，否则



它就站不住脚。众所周知，这是斯大林一贯奉行的思想。一般认为，斯大林只是简单地把政治警察置于党和国家之上，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斯大林远远不止于此：他就是这种警察的魔鬼般的化身。他把党、国家、社会、风俗、思想感情以及思维等一切的一切都契卡化了……在第20次党代会上，这个无所不在的神（指警察机关）也随同斯大林从灵台上拉了下来。接着是进行一种无济于事的试验：把警察机关变成一个正常的部门。赫鲁晓夫决定在苏联部长会议中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对政治警察进行“集体领导”。从前，在斯大林时期，叶若夫、贝利亚和党的各级机构的契卡头子都参加各级党的机关（区委、市委、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局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班子，但是现在，他们被撵出去了。在22大（1961年）上，没有一个契卡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内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米恰斯内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契卡分子的权力下落到了最低点。但是，赫鲁晓夫忘了，他自己的权力是以整个制度的主导力量——契卡机关的权威和牢固作为基础的。契卡分子很快就使他清醒过来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活动中，他们起了领导作用。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这一教训。其结论已是人所周知的了：（1）把契卡分子的领导人塞进各级党委直至中央政治局，从而恢复被赫鲁晓夫搞臭了的契卡机关的名誉；（2）把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塞进克格勃，从而恢复党与政治警察之间的协调关系；（3）总书记对克格勃中央机构进行个人监督；（4）在这一基础上提高克格勃的作用和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纲领，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他是继叶若夫和贝利亚之后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第三名契卡分子。仅这一点就说明，契卡分子的权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何等的高度。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78年7月5日颁布的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改名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中从法律上确定了契卡分子的新权力。这表明，在赫鲁晓夫时期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克格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却变成了独立于政府机关的一个全国性机关。其领导人在法律上应是苏联部长会议成员（按原来的章程就不一定这样做）。根据1978年7月5日颁布的《苏联部长会议法》，其他一系列国家委员会也都取消了“属于”这个附加语，并且扩大了它们的权力。柯西金在评论这个新的法律时说：“最近几年，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的权力扩大了。”（见1978年7月6日的《真理报》）不需要多么发达的政治头脑就能想象得到，扩大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的权力（它实际并没有扩大）同扩大安全委员会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克格勃在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中的权力和职能都扩大了。各种秘密政治部门（侦察部门和秘密警察网）与行动部门的权力也扩大了。颁布了一系列秘密法令和指令，使克格勃所雇佣的暴徒可以公然合法地对公民进行监视，可以公开将受害者殴打乃至残害致死，这种做法连斯大林时期都是不曾见过的，然而这批暴徒在警察局的材料里只是称作“一批不知名的流氓”。如果某一个“流氓”被目击者当场捕获并扭送当局的话，他无疑会被立即释放。成千上百份地下出版物都叙述了安德罗波夫领导的部门在其权力扩大之后所干的大量这类勾当。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党徒，是勃列日涅夫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勃列日涅夫提拔他，同时也抬高了自己。但是，勃列日涅夫也不能不知道，他即使有叶若夫和贝利亚的经验，也很难预计到危险的因素。何况克格勃还拥有合法的权力，来暗暗地组织推翻总书记的活动。所以，勃列日涅夫是本着“与其信之，不如监督之”这一久经考验的原则来对待安德罗波夫。为了进行监

督，勃列日涅夫把两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和一个“摩尔达维亚帮”安插在安德罗波夫的周围。勃列日涅夫让其中一个人担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这就是谢·库·茨维贡（1917年生），他曾在摩尔达维亚勃列日涅夫身旁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格·卡·齐涅夫（1907年生）成了克格勃第二副主席，他在冶金学院毕业，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时，他在州委书记勃列日涅夫手下做党务工作；第三位是尼·安·谢洛科夫（1910年生），他也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并在勃列日涅夫手下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勃列日涅夫任命他当苏联内务部部长，掌管全国警察部队。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对安德罗波夫防了一手，使自己政权的安全有了相当大的保证。

勃列日涅夫也给柯西金做了一次惊人的大手术，简直可以说是政治阉割术。前已提到，10月中央全会（1964年）把赫鲁晓夫的政权由勃列日涅夫（党）和柯西金（政府）瓜分了，以免将来这两种大权落于一人之手。我们还看到，勃列日涅夫是怎样绕过这个决议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弄到自己手里的。有远见的勃列日涅夫把立法权抓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手中之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又把根据旧的斯大林宪法归政府享有的许多执行权攫为己有。然而，最高苏维埃毕竟只有立法权，要贯彻下去还得靠执行机关。因此，勃列日涅夫作为立法机关首脑把刚从柯西金手里夺来的权力又自动地还给了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新宪法第132条规定，在苏联部长会议设立主席团，作为“常设机构”，但是没有说明它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相互关系。仅在第136条里做了附带说明，新成立机构的权限将由新的《苏联部长会议法》规定。1978年7月5

日通过的这一法律说明，今后在苏联领导政府的不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这个法律的第17条在谈及集体领导的问题时说：“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的常设机构，以解决各种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和其他国务管理问题。”关于“集体的主席”，在下面两条做了说明，第28条说，主席团决议要由其成员的多数表决通过；第29条又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要“保障在苏联部长会议的工作中实行集体原则”。根据这一条，政府首脑的最大特权就是主持会议、协调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并“在紧急情况下对国家管理的个别问题作出决定”。（见1978年7月6日的《真理报》）最后一条补充最好不过地说明，政府的正式首脑现在已是有名无实。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这个集体才是部长会议主席，而其中已起码安插了四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代表（尼·亚·吉洪诺夫、伊·瓦·阿尔希波夫、伊·特·诺维科夫和维·埃·迪姆希茨）。我们还记得，阿·尼·柯西金从1939年起就是中央委员、苏联部长，从1940年起任政府副总理，从1941年起当斯大林的副手，从1948年起任政治局委员，而当时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还只有他的家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才知道。柯西金大权旁落已是十分明显。

继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将是谁？布尔什维克的年轻一代将奉行什么政策？一党专政的历史本身已经作了回答。继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将是另一个勃列日涅夫，年轻一代的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也将是他们的父辈、祖辈和曾祖辈所奉行的政策。只有那些心地善良、非常不了解党的权力机器内部性能规律的人才会在这方面抱有幻想。许多观察家把这个制度的演变前景寄托在勃列日涅夫政权向“自由化”过渡上。他们忘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其他各种

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它已经从历史上炼出了一种对抗各种演变的绝对免疫力。共产主义制度的力量并不在党和政府的最上层，而是以政权基层组织为坚实基础的极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就是苏联的一党专政不同于个人独裁和寡头政治的主要表现。一般的寡头制度的弱点在于，它不具备这种等级结构和群众基础，而仅仅是依靠几个杰出的人。一般的寡头政治制度，大都随着执政头目的死亡或者上层的争权夺利而引起这个制度的更迭，不久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更迭或者内讧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苏联当权人物的更迭之所以不会引起共产主义制度的更替，是由于这种制度并非依赖某一个人（哪怕是象斯大林那样的实权人物），也不象古代寡头政治那样依赖一批杰出的人物，而是依赖于不断行使职能的结构体系和它的群众基础。在这一方面，布尔什维克更换其统治者的速度和行动之敏捷只有君主专制制度才能相比。这样说毫不意味着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苏维埃国家机器是某种永动机，这种结论是美国一家著名杂志强加给我的，虽然该杂志在评论部分十分欣赏我在美国出版的《共产党的机器》（“Communist Party apparatus”）那本书。（见1966年7月15日《泰晤士报》）

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机器是可能出毛病的。它可能被破坏（自下而上的革命），也可能被篡权（自上而下的政变），但是它不可能自由化和民主化，因为这等于它的寿终正寝。当然，斯大林式的陈旧的党的机器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它会生锈，运转不灵，需要清理和大修，但是正当赫鲁晓夫企图这样做的时候，这部机器却把他清理掉了，从而打消了别人打算进行维修的念头。

斯大林的机器之所以能正常地运转，有如下几个因素：作为

统治方法，进行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让数百万人参加强制劳动；为了使国家不受外部世界的腐蚀，实行“铁幕”政策。现在这些纯粹的斯大林式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台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同时，这台机器运转的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经济政策之后，消费者变得挑剔了，他们的要求提高了，不满公开化了。由于“铁幕”露了缝，苏联社会的消息灵通了，人们不再相信党所捏造的关于西方劳动人民的生活、西方的民主设施、公民权利和精神自由等等的宣传。所有这一切都对这部机器施加着压力，使苏联一些有头脑的人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台老朽的苏维埃国家机器该换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寻求解决方案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应当用法制国家来代替苏维埃警察国家。

实行议会民主的法制国家，是当今社会福利民族达到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然而对于挨饿受压和愚昧无知的人来说，民主只是一句空话，一钱不值，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人答应给他喂饱肚子，就可以轻易地将民主奉送。今天，只有西方那些没有出息的唐吉珂德还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森林里宣传民主。在那里，只要能够喂饱芸芸众生，或者哪怕只是作出应诺，统治者就可以长期统治下去，这是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在那里打着各式民族主义招牌取得成功的原因。另一方面，苏联是现代工具国家，又是按照弱肉强食的规律进行管理的国家中唯一的、人为地抑制国内开展科技革命的国家。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党的官吏们想把这一过程完全置于自己监督之下的做法，这两者是矛盾的，现在这种矛盾已经造成技术、工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在上面提到的改变现行制度的各种可能性方面又多了一种前景：苏联统治阶级中比较明智、较有远见和较少教条

的一部分人，为了克服本国在科技革命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的现象，为了摆脱农产品和日用品生产不足而引起的长期危机，将会主动提出更换这一濒于破产的制度。不久前，西欧最后两个极权主义制度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权变化，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明智派采取主动和努力的结果。

葡萄牙的和平“军事革命”以及西班牙的和平“国内革命”这两种方式都直接表明，如果军官和政治领导层中的明智派和真正爱国人士表现出意愿和决心的话，把政权由统治集团手里过渡到人民手里是比较容易和安全可靠的。

当然，苏联并不是葡萄牙，也不是西班牙。苏联的特殊条件可能产生第三种方式——“苏联方式”。但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都必需有一个根本条件，否则永远不会有任何革命。这个条件是：人民为了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要有组织地对政府施加压力。应当认识到，这里首先指的是苏联的无产阶级。文明国家（包括旧俄国在内）的工人运动，大规模地反抗社会的不公道、反抗私人雇主或国家企业主暴政的一种最有效和最民主的方式——就是工人的罢工权。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最害怕的莫过于参加自由工会的苏联无产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农民开始利用自己的这一天然权利。只有不断地利用这一权利才能获得西方工人达到的高度生活水平。正因为这样，克里姆林宫迅速镇压了革命后以顿巴斯矿工弗拉基米尔·克利巴诺夫为首的第一个自由工会运动的组织者。没有普遍自下而上地、有组织地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就不可能分化统治阶级，这是使整个制度产生危机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压力，政府本身也永远不会消除这个制度中的社会痼疾。只有在人民积极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苏联政府才会对人民作出让步。只有当

苏联工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水平之所以比自己的西方同行差一半甚至更多，其原因不仅是制度上的缺陷，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象西方工人那样利用自己的权利来建立独立于党和国家的工会、签订和废除劳动合同，并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宣布经济罢工，只有认识了这一点，苏联政府才会作出让步。当局胡诌什么“我们的国家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工人不能以罢工来反对自己的国家。”这一谎言曾经被当作一种心理壁垒。现在，勃列日涅夫的宪法已经承认，苏维埃国家即共产党。在这里，资本和政权已经合为一体，马克思《资本论》里讲到的吸血鬼已变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残酷现实（呜呼，这也是按马克思的药方配制的）。

在苏联人民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还要拿出巨额资金来进行军备竞赛以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呢？勃列日涅夫又从哪里弄来难以计数的资金来使卫星满天飞呢？勃列日涅夫拿来资助和武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苏联兄弟”的聚宝盆在哪里呢？

答案是非常干脆的：因为在苏维埃国家里，全部资本和全体人民都属于这个国家。它可以确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可以确定把生产的东西分给谁和支付多少钱。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在“发达社会主义”中却是完全正常的。例如，它可以把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规定得比西方失业者还低得多，以此来维持国家的经费开支。

在此，我们从《工人地下出版物》的大量见证材料中援引一份最新材料，这是敖德萨一位工人给美国工会负责人的来信摘要：

“尊敬的乔治·米尼先生，您好！我们的劳动兄弟——美国工人们，你们好！我是乌克兰工人、七个孩子的父亲、为工人的



权力而奋斗的战士——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谢雷。

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企业里工人的劳动情况。我是伊利切夫渔港的旋工。我们的工作维修捕鲸船和渔船。我的工资每月180—200卢布……劳动安全条件差，由于缺少防护措施常常发生事故。为了使我们少拿钱，多干活，常常改变我们的劳动定额。每年开会，签订新的集体合同，向会议提出的“合同”规定计划要增加百分之几，但是工资却原封不动……

工人们得到的生活服务很差。在多数情况下，工人们不吃早点就步行上班，空着肚子坚持到中午。食堂很远，车间里没有饮用水。午饭的质量差，价钱贵。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工人不愿意好好干活，有的人甚至在上班时喝酒……

物价上涨，食品和日用品不足。许多工人，特别是多子女工人一连几个月见不到肉、奶、油甚至红菜汤，更不用说水果、蔬菜和其他营养品了。人们穿得破旧不堪，因为要买一件东西不是花整月的工资，也起码得花半个月的工资（如大衣、西装、鞋等等）。许多人缺少住房。有的人等了十年还盼不到一套房子。人们只好将就着住在别人家里，或找个破屋陋室（地下室、顶间和草棚子）勉强栖身，拿你们国家的住房标准来看，这种房子还不如贫民窟。许多家庭受不了这种生活，只好离婚，各奔东西。人们开始喝酒，什么也别想……

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正义和人道精神上，另一些人写信，不是指望得到什么报偿，而是为了揭露各种缺点，甚至“指出”，把国家弄到如此贫困，歪风邪气上升，我们领导应对此负责。

（尽管他们对自己照顾得周到又周到，样样东西应有尽有，而对我们，只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信得不到回答，有些人还因此而遭到行政机关、警察局和克格勃的迫害。凡是批评过我们现

实的人都遇到这样的厄运。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给上级写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哪一个单位都没有给我答复。

我写到工资低，物价高，许多商品奇缺和盗窃行贿行为。我反映了医疗服务工作和教育水平差。反映了我们的工会早就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反映了某些人甚至整个民族受到迫害的情况。人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不止一次（六次）地被克格勃和警察局传讯。1977年11月3日，我接到克格勃的一份书面恐吓，据说要判我的罪，判处七年监押，五年流放……

不久以前，以弗拉基米尔·克列巴诺夫为首的一批工人决定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护工人权利的工会，但是，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并把几位领导人关进了监狱。这便是我们这里的真情。你的全家在挨饿，但是不能吭声；让你无代价地工作，你不能埋怨；让你超定额地工作，你得响应；否则，你就得蹲监狱。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创作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工人的处境更糟：他们没有工作、吃饭、休息、罢工和参加自己工会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奴隶制度吗？”（见1978年9月28日的《俄罗斯思想》）

是的，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奴隶制度，但在西方，那是在资本主义之前。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评述勃列日涅夫时代时，可能会指出下列特点：（1）在经济方面搞军国主义化，（2）在政治方面搞新斯大林化，（3）在政权机关里，自下而上都是营私舞弊、腐化堕落，（4）在社会生活里，上层富贵化和下层贫困化的两极分化正在扩大，（5）在知识界的精神生活里，出现了一种划时代的现象——思想自由化，国内称之为异端思想，在西方则叫做“持

不同政见”，（6）在民族方面，力争摆脱苏联殖民帝国统治的边区人民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勃列日涅夫不采纳苏联知识分子的如下忠告：为了防止以后的灾难，应彻底铲除斯大林主义（萨哈罗夫院士的《备忘录》和索尔仁尼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而是使斯大林主义借尸还魂。真是“天生的爬行动物飞不起来啊”！同时也可看出，这个匆匆来去的历史过客是多么的利欲熏心。当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朋友和保护人赫鲁晓夫给了背后一枪的时候，我曾把他比作谋害恺撒的刺客布鲁图，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苏联的布鲁图却与恺撒本人有某种共同之处。进行这样的比拟，我可能有亵渎历史圣贤之嫌。但是，恺撒作为统帅和治国之才，并没有失去一般俗人的沽名钓誉之心。所以，他让罗马元老院封他为终生帝王、独裁统治和最高总督之职，授予他各种荣誉，使他有资格佩戴桂冠和身着凯旋将军服，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于是元老院又宣布他是大力神尤必特名下的一尊神，并放在寺院里供起来。看来，勃列日涅夫正在模仿这位满身披挂的恺撒。战时，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朱可夫元帅有46枚勋章，勃列日涅夫在离开战场时只有几枚，而且没有列宁勋章，现在数一数，他的元帅服上足足有了60枚！他的官衔也不比恺撒少：他是中央总书记、最高总司令、苏联元帅、苏联英雄三次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克里姆林宫的寺院里，他的名字将作为“胜利”勋章的获得者而与斯大林和朱可夫一起与世长存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授予他最高勋章。在他生前就在他的故乡城市竖起了纪念碑。他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得到了苏联科学院授予的卡尔·马克思奖金。只有一个方面他还不如恺撒，就是没有把他封为神。

## 二、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涯剖析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历史论文中，是以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开头的：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1—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叔父（即拿破仑三世代替拿破仑一世——本书作者注）。……一切已死的前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121页）当你想到克里姆林宫舞台上演出的对勃列日涅夫制造新的个人迷信的一幕接一幕的政治剧时，就不由得想起了马克思的这段话。这些由精神贫困和没有创造力的演员所演出的节目，经常以“历史事件”的面目出现，为的是要把其中的最主要演员宣布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既然列宁是他们“最崇拜”的偶像，所以他的每一个继承者都首先宣布自己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这样做，赫鲁晓夫这样做，勃列日涅夫今天也这样做。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党徒们也象这些商人一样，他们的商品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党贩子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考虑政治市场的行情，而且考虑党内顾客的需要。今天的党需要的是新式领袖，就党而言，他应能捍卫党的利益；就军队而言，他应满足战争机器饕餮的胃口；就警察而言，他应该懂得制度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把苏维埃国家的党、军、警这三种真正的主导力量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人物就是现在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力量与

弱点都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新的“迷信”是否能使他凌驾于这三种力量之上的种种猜测都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方面，他既无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又无赫鲁晓夫肆无忌惮的“唯意志论”。勃列日涅夫是谨慎的“党的灵魂工程师”，是头脑清楚的运筹人物。与此同时，他从历史经验中出色地了解到，千万不要同上述三种力量中的任何一方造成对立，只有这样方可在克里姆林宫的奥林普山诸神中站得住脚。他不象斯大林那样是他们的统治者，而是他们的公仆。他的力量与弱点都表现在这里。但是，他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因为他就是这样一块材料。他与自己的前任们不同，他是政权顶峰上的市侩庸人。因此，他不能驾驭别人，而是由别人驾驭他，玩弄他的小市民趣味。然而，决不能让人民知道这一点。于是，党的机关给他制造了一个连“总书记”本人也未必认得出来的形象。但是人民却应该看到，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非常热爱人类的领袖。请看契卡式的党徒、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对他的吹捧吧：“今天，我不能不谈到一个现代人所景仰的、把亲爱的人民与亲爱的党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人。昨天，他在最高苏维埃讲坛上，用他那亲切的、充满人情味的声音、以犀利的、感人肺腑的语言向全世界胜利宣告……列宁式的纯朴和博大精深、布尔什维克的坚韧不拔、深刻的国际主义、高度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集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随时准备对人民和党承担最重大的责任、坚定的性格和充满着仁爱之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高贵品质”。（见1977年10月6日的《真理报》）为了把新的迷信直接同列宁这个源头挂起钩，不仅从革命历史和国家历史上勾销了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真正组织者的名字，而且勾销了目前这个已有三十年暴政的军事警察社会主

义奠基人的名字，勾销了这个党自己揭发出来的最后十年暴政罪行的历史。为了填补这个空白而制造了新的迷信——于是提出了新的公式：“勃列日涅夫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这条直线从十月革命和列宁一直通到了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宪法”。就其伟大的程度而言，勃列日涅夫丝毫不亚于列宁。1977年11月7日红场的情景就是明证：“两个伊里奇”的肖像并排而挂，而且打破惯例，两张肖像的式样和大小都一模一样，使老百姓一看就知，“出现了两个历史人物”。

尼古拉一世曾经说过，管理俄国的并非皇帝，而是一些官吏。勃列日涅夫就是已经爬到皇帝宝座前的党内官吏。然而，他尚未登上宝座，只是双手抓住了它。要懂得列宁，必须读马基雅弗利、尼采、布朗葵、马克思甚至涅恰耶夫和特卡卓夫的书，但是若要懂得党内官吏们的心理，只需读一下官方的指示和“官员等级表”就行了。勃列日涅夫之辈是按部就班，在官位和勋章的竞赛中踩着几百万同胞的尸体才爬到了苏维埃帝国的最高指挥部——克里姆林宫的。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峰的那个不太牢靠的阶梯。当然，他们是冒了风险的。“主人”（指斯大林——译者注）是一个脾气古怪、严格而又不大明辨是非的人。常常把忠诚当作狡诈，把颂扬当成别有用心，如果谁在捍卫“总路线”方面过于热心，便要被谴责为“冒进”。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权力的顶峰，只有那些自欺欺人地向斯大林表示他们就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的人才能达到。然而，钻到斯大林跟前总比在他跟前站住脚要容易一些。以貌取人的斯大林，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周围的人分

成几类，有的是可以利用的忠实奴仆，有的是被“党的首脑”认为应当消灭的眼中钉。因此，傲慢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一类人物被送上了契卡分子的断头台，而谄媚的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流却坐上了克里姆林宫的安乐椅。勃列日涅夫能够进入克里姆林宫多少有点侥幸。1927年他从土地管理和土地改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的农业专家。据苏联传记家说，这些年他先后在白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和乌拉尔的农业部门任职。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勃列日涅夫一直升到了乌拉尔州土地管理局第一副局长的时候，还没有入党。这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党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世袭的无产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却置身事外。共产党员们都在农村里搞“残酷的阶级斗争”，进行农业合作化和消灭“富农阶级”，而“世袭的无产者”、土地丈量员勃列日涅夫按其当时任土地管理局领导人的职务来说本来是可以入党的，但是他仍然袖手旁观，没有入党。然而，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明白了，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已经是非党专家当官的最高限度了。要想继续向上爬就得入党。

根据党章规定，14岁可以加入共青团，18岁转党。1923年，勃列日涅夫在17岁时加入了共青团，23岁自动退团（这是当时的团章规定），但是，他没有转入党内。直到1931年，当他25岁时，才拿到了党证。大概，他终于知道，党证是他当官的唯一条件。为了开创这样的前途，他作为一个农业专家，在集体化的高潮时期抛弃了没有前途的农村，转到他的老家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改了行。现在他决定在城里找出路了，于是，进了冶金学院，并且登记入党。

关于“世袭的无产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传奇故事，

都是后来当他成了总书记之后才编造出来的。在经过修改加工后的正式传记中说，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干过体力劳动；他的父亲伊里亚也不是工人，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入党时的身份是职员，这是有据可查的。勃列日涅夫1929年成为预备党员，根据当时的党章规定，党员的预备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工人，预备期6个月；第二种是农民，预备期一年；第三种是职员，预备期二年（1953年的《苏共决议》第一部分第124页）。当时，青年预备党员的社会地位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是一致的。而勃列日涅夫的预备期是整整两年，从1929年到1931年（见1976年出版的《列·伊·勃列日涅夫传》第7页）。这表明，不论是列昂尼德还是他的父亲伊里亚都不是工人，而是职员。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反映了总书记的虚伪性而已。在这方面还有一个细节。传记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革命前上过正统中学，而他的父亲是个在卡缅斯克干粗活的壮工，一个壮工（苏联叫做杂工）怎么能培养自己的孩子上正统中学呢，一般来说，当时只有富裕的家庭才上得起这种学校。若不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大搞宗教式的裁判，那么勃列日涅夫即使拿到了党证和学院毕业证书，也未必能在城里有所作为。当时，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的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下手，开始了大屠杀，政权机关里出现了许多空缺。这种空缺便由当时那些积极帮助斯大林和契卡分子揭发“人民敌人”的人补充了。所谓“列宁事业继承人”的勃列日涅夫一代就是踩着这批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尸体而掌权的。1939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他当上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的一名普通书记。在1952年第19次党代会之后，根据他在前线时的老首长麦赫利斯的推荐和赫鲁晓夫的建议，斯大林让他当了苏共中央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斯



大林死后，他被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除名。然而，顽强、机灵、坚定和富有耐性的勃列日涅夫同其“主人”一样是个钻营的能手。他“失宠”了三年，又开始担任军队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又担任哈萨克斯坦中央书记。第20次党代会之后，赫鲁晓夫第三次重用他：把他调到了莫斯科，让他重新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并进入中央主席团。在这一岗位上，我们看到了他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两种新品质：老谋深算和背信弃义。1964年10月13日，他主持了反对自己的保护人赫鲁晓夫的阴谋活动，并且取代了他的位置。从道义伦理学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但是从政治赌博的内在规律来说，勃列日涅夫显示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的品质：“夺权的意志”和不怕受到良心谴责的铁石心肠。他虽然已经登上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类名人曾经坐过的宝座，还犹感美中不足。他力求超越其前任而成为苏维埃时代的大政治家，但是他做得十分笨拙。他由于缺乏政治想象力，只有抄袭那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和陈旧口号。他想在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以掩盖其统治内容之贫乏。他在公共场合出现时，总是不自然地卖弄自己，摆出一副伟人的架势，但由于他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不同，是个蹩脚的演员，因而他不仅没有那种威严，反而显得滑稽可笑。在机关办公室里为他撰写的那些在政治上毫无创新的乏味枯燥的报告，将作为他的平庸无能的纪念品而载入史册。他把从前争权夺位时所遭受到的种种屈辱，一古脑儿加诸于下面那些想夺权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年轻人身上，因为他提拔的全是老年人。从前他得不到的各种奖赏，现在却绰绰有余地拿到手了，各种只能由国家发布的最高官衔，他都毫无愧色地接受下来。以前，他只是作为上校衔的政委渡过了整个战争，现在，他越过了中间的各种职衔，成了苏联元帅；从前，他在战争中只获得了少数几枚

与他的职务相称的勋章，现在，在他的元帅服上已经挂得满满的，没有插针之地了。他在战争结束30年之后，才由于在这次战争中所树立的功勋而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立的是什么功，他还由于完成了经济计划而宣布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然而他完成的仅仅是压低了指标。从法律上来说，他现在的权力比斯大林还大。他是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第一把手，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是大权在握的国防会议主席；不久前还宣布，他将兼任统帅苏联全部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他不久还将得到大元帅的称号，尽管现在还不是。他简直是踌躇满志，对自己的青云直上而飘飘然了。但是，这里的实际状况是否符合法律条文？换言之，“集体领导”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勃列日涅夫是否已成为党和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从苏联报刊上看，你会认为，这个党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独裁统治者。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第一，独裁人物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自己形成的；第二，任何一个独裁者，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旧制度的破坏者和新制度的创立者，他将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进行统治。勃列日涅夫却什么也不是，一般来说，不经过上层的“革命”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他得到的官衔勋章越多，威望越高，他就越是要依赖于那些恩赐者。然而，恩赐者是谁？当然，赫鲁晓夫下台后所形成的那种有效的“集体领导”已不复存在了。党内接连不断的倾轧，已把那些最积极地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活动的人，一个一个赶出了政治局（谢列平、米高扬、谢列斯特、沃罗诺夫、波利扬斯基、波德戈尔内、马祖罗夫——其人数已达赫鲁晓夫之后的政治局的半数）。政治局成员逐渐刷新和扩大到15人。但是，这种政治局已经起不到以前那种政治局的立法作用。据我们观察到的各种迹象表明，在政治局里已经

形成了一种“执政内阁”式的领导核心，他们是：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柯西金、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部门）、基里连科（主管组织部门）、乌斯季诺夫（主管军队部门）和安德罗波夫（主管警察部门）。

这种“执政内阁”便是勃列日涅夫与之互相依存的“主导力量”。

由此可见，目前的苏维埃专政虽然是一种崭新的专政形式，但仍是一种“执政内阁”专政，而不是个人专政。然而，集体专政是一种不稳定的体制，它是不合逻辑的。特别是对于领导并依靠这个专政的人来说，它是危险的。因此，聪明的苏联统治者往往在使自己成为独裁统治者之前首先要消灭掉自己的“执政内阁”，例如，斯大林在30年代消灭了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在50年代消灭了中央主席团。

勃列日涅夫是否会这样做呢？不论是勃列日涅夫的年龄，还是他的实用机会主义思想都不允许这样做。但是，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国家和党都从心理上准备承认勃列日涅夫为独裁者，或者说，承认他为唯一的领袖。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应当改组“执政内阁”，并将其中的恶神苏斯洛夫赶出中央书记处。有迹象表明，勃列日涅夫的门徒们正在怂恿他这样做，以便在苏斯洛夫下台后能保证政权平安地转移到自己手里。

### 三、苏斯洛夫是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员

苏斯洛夫一般是虚怀若谷的，但是有一次却表现得很不谦虚：他说，只要我在克里姆林宫里咳嗽一声，整个西方世界就会受到震动，就会猜测我的健康情况如何。苏斯洛夫显然不了解西方

世界对他的兴趣如何。确切地说，西方对他的兴趣少得可怜，因此不大有人知道他在克里姆林宫上层的实际作用。他的作用不仅出人头地，而且相当特殊。可以说，如果今天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遇到意外情况而下台，甚至他们俩人同时下台，政治局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其他一些因循守旧分子来接替他们，但是如果苏斯洛夫出了事，这就得在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中引起危机。

在苏联庞大的意识形态队伍里，再没有与苏斯洛夫相匹敌的人了。这并非指苏斯洛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渊博学识或者理论天才。这两者他都不够出色。克里姆林宫的上层也不需要这些。有了这两种本领，反倒糟了，它会引起权力里手（党的干部）的不安和疑虑。举个典型事例来说，布哈林和谢皮洛夫之死，除了其他原因外，就是由于他们具有高于党徒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党徒们需要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而是对今天所实行的总路线的实用主义解释家。这些解释家的任务是：对党的权力机器的实践找出思想根据。因此，根本不要求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却必须要掌握权力和统治的技术。他们需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指导。苏斯洛夫的才华便在这里充分展露出来了。

他比勃列日涅夫只大四岁（不久前年满68岁），但是入党的时间却比勃列日涅夫早十年（1921年）。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战胜国内战争中的敌人，残酷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们所举行的喀琅施塔得起义（1921年），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从这以后，加入共产党就是取得权力和步步高升的必由之路。因此，党发展得很快，以致列宁在有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发出了收缩令。他写道：“我们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

钻营依附，而这些人只是只配枪毙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8页）（当时只有60万党员。今天已有1,400万党员，其中有一半是各级官员和趋炎附势之徒，且不知列宁会对此说些什么？——作者注）

列宁写这本书是在1920年，而苏斯洛夫入党是在1921年。如果他入党的目的就是列宁想要枪毙的那种人所追求的“步步高升”，那么他比周围任何人都更一帆风顺。苏斯洛夫入党的时候，斯大林还不是总书记。苏斯洛夫同党内其他人一样，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除了列宁之外还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会上指出，列宁在世的时候，大概只有1%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听说过斯大林的名字。（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6.1%的代表是1921年以前入党，24.9%的代表是1921年到1930年期间入党。——作者注）

从苏斯洛夫的生平传记中可以得知，他属于这1%之内。而且，他恰恰是属于那些不仅把斯大林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而且猜到斯大林将是列宁的唯一继承人的那一派共产党员。因此，他站在斯大林的一边，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3—1924年），随后参加了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1925年），最后参加了反对布哈林的斗争（1929年）。这给他打开了从底层迅速升到党的上层的大门。

他的学历也是个有利条件。1928年，苏斯洛夫从全国有名的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毕业，成绩优异，接着又进入党中央的高级政治学校——红色教授学院。这意味着，苏斯洛夫是一个在中央委员会挂了号的高级意识形态干部的后备人员。在这个学校里讲课的有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之类党的著名教授，有维辛斯基、鲁宾和捷波林等前孟什维克分子，还有前崩

得分子罗森贝格等人。

这时，苏斯洛夫本人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任教。在该校学生中有一些重要人物，如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和斯大林未来的继承人赫鲁晓夫。这些学生对于苏斯洛夫的晋升也各自起了自己的作用。他在红色教授学院就学时，适逢斯大林与他在政治局里的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展开斗争。红色教授学院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布哈林的世袭领地，这是由于它在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中帮了斯大林的忙而给予布哈林的报答。但是，当现在斗争轮到布哈林本人时，中央担心，这个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会不会站到其领主及老师的一边。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并不能归功于中央机关，而是归功于一批年少气盛、敢说敢闯的红色教授，即苏斯洛夫、尤金、米丁、波斯别洛夫、潘克拉托娃、康斯坦丁诺夫和麦赫利斯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央委员。

人们往往根据一个共产党员的地位来判断他对党所作的贡献。苏斯洛夫第一个领导职务是党和警察性的工作：他于1931年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在斯大林时期，这个委员会在党内就象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内所起的作用一样。党内的各种反对派或者持不同政见的可疑分子在未关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和西伯利亚集中营之前先得经过这个炼狱。一切忠于列宁事业的人在经过监察委员会时都被带上了种种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民族偏见分子”等。

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分子取得革命和国内战争胜利之后才入党的苏斯洛夫，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审判者。在苏斯洛夫的正式简历中，有两件大功劳：第一，积极参加了消灭中央的列宁派；

第二，同样积极地参加了地方上的清党活动。本来，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再强调这类“功绩”已不时髦，但是，由于苏斯洛夫在清党中的作用特别卓著，以至在后来公布他的简历中还说：

“米·安·苏斯洛夫积极参加了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1933年和1934年，曾先后负责乌拉尔州和切尔尼戈夫州清党委员会的工作”。（见195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1卷第320页）

不久（1934年），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但是，苏斯洛夫在这个委员会的职务和作用不变。

斯大林为了建立个人权力，决定把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结合起来，由他的一名助手来担任，于是，臭名远扬的叶若夫登上了舞台。苏斯洛夫在叶若夫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共产主义制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西方叫做“大清洗”，在苏联国内则称为“叶若夫行动”。

至于这场清洗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多少伤亡，这个问题甚至在饶舌的赫鲁晓夫时期也守口如瓶。但是，西方专家认为，“大清洗”使800万人进了集中营。

根据官方材料和专家们的统计，比较确切地获悉了“大清洗”在党内造成的损失。在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1934年）的1,95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在139名中央候补委员中，98人（占70%）被杀；在军队中，80%的高级指挥员被杀，边疆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则100%的枪毙了。大约122万名共产党员（约占党员人数的50%）被开除出党，这部分人也遭到了镇压。

在叶若夫行动结束时（从1938年11月初由贝利亚继续推行），叶若夫本人也被枪毙，但是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苏斯洛夫却被任





行批判。会议参加者只知道沃兹涅先斯基的书应该批判。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而且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本人曾经为这本书校订过，沃兹涅先斯基因此而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布尔什维克》杂志（现在的《共产党人》）因而曾吹捧它是斯大林忠实学生的杰作。因此，“讨论会”是一种抽象性的会议。它象往常一样期待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能作一个检查。然而，沃兹涅先斯基已经不可能出来讲话了，他已经在一年前被斯大林枪毙<sup>③</sup>。

这次“经济讨论会”的材料没有公开发表。有关这次讨论的两份文件在一年后问世，一是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写的小册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个是苏斯洛夫在同年12月写的批判沃兹涅先斯基和他的朋友费多谢耶夫的文章。苏斯洛夫写道，由费多谢耶夫任总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几年来没有揭发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观主义观点……但是却把沃兹涅先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军事经济》一书当作新发现，吹得天花乱坠。（见1952年12月24日的《真理报》）

苏斯洛夫向费多谢耶夫指出，由于他吹捧了沃兹涅先斯基，中央决定撤销其职务。苏斯洛夫写道，费多谢耶夫转过头来赞扬与沃兹涅先斯基针锋相对的“斯大林的经典作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却只字未谈他过去为沃兹涅先斯基辩护的错误。文章最后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作者颂扬斯大林“可能是一种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位费多谢耶夫后来由于苏斯洛夫开恩现在又成了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苏斯洛夫的文章，显然经过斯大林的校阅。而且，上述两篇文章之间有着有机联系：斯大林在揭发其经济政策的对手时提出了总方针，而苏斯洛夫则尖锐地提出要斯大林总路线的敌人保持警惕。

斯大林生前的最后一次党代会——第19大(1952年10月)——是苏斯洛夫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认定,苏斯洛夫不仅是他未来战略的天才执行者,而且是卓越的解释者。

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揭露了党内意识形态方面反对斯大林路线的人。这大概是这次大会上最精采的发言。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完全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幼稚的沃兹涅先斯基就是因此一命呜呼),而是要证明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垄断权,并要在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宣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清洗——永远是苏联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苏斯洛夫有意避免使用“清洗”这个词,但是他又证明清洗并非斯大林的发明(许多人暗地里也是偷偷这样想的)。

在这一方面,斯大林是领导着党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的。

苏斯洛夫说:“列宁—斯大林的党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人类的天才、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引导着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苏斯洛夫解释说,党的全部活动的“主要方向,今后仍是毫不留情地对付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它渗入到我们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中去……要反对那些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奴颜婢膝的人,反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流毒……反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非政治倾向。”(见1952年10月13日的《真理报》)

苏斯洛夫最后宣布:“作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取之不尽的宝库《斯大林全集》第13卷业已出版。很难指出有哪一个科学文化艺术部门和哪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感到我们伟大领袖和

导师的鼓励和指导，没有受到天才思想的影响。”（见同日的《真理报》）

斯大林在选择其亲密助手方面难得犯错误。他们对他们的评价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是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其政权。单在口头上说什么“斯大林的天才”而不用实际行动来加强其政权不仅是不够的，甚至还是很危险的。这种人要么被斯大林怀疑为想当官的“两面派”，要么被当作“无用的空谈家”而撤职。斯大林听了苏斯洛夫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后认为，苏斯洛夫不是这一类人。因而，斯大林很赏识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第一次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并选进了中央书记处。

可以认为，在这次的中央主席团里，只有两个人是斯大林第二次“大清洗计划中所需要的人，他们是负责政治警察工作的伊格纳捷夫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

不错，有理由认为，他们早在斯大林生前就背叛了他，把清洗计划交给了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但在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计划的执行：1953年1月13日，苏联各报报道克里姆林宫一批大夫被捕的消息。他们被控毒死了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控告他们准备谋杀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列夫钦科上将和什捷缅科中将。

苏联各报刊和广播电台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为揭发新的“人民敌人”而展开了一个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广泛运动。运动完全按照1937年的模式进行。从方式方法到语言格式都如出一辙。就连第一次逮捕也抄袭了30年代的做法。

这一次也一样。我们从赫鲁晓夫在20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获悉，斯大林在新的清洗中决定先拿政治局里的老委员们开刀，他依靠的是那些“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委员。其中，斯大林指

定伊格纳捷夫在秘密警察方面起主要作用，苏斯洛夫则从意识形态上为新的清洗制造根据。正当运动处于高潮之际，斯大林逝世了（1953年3月5日）。翌日，中央主席团中全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委员都被除名，包括伊格纳捷夫和苏斯洛夫在内。

但是，主席团对苏斯洛夫和伊格纳捷夫的叛变给予了肯定。例如，苏斯洛夫仍留在中央书记处，伊格纳捷夫也参加了书记处。（补充一句：当时从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中被除名的还有两个“缺乏经验”的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大约两年之后，苏斯洛夫重新当了中央主席团委员。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重新任命苏斯洛夫担任这一角色，这在苏斯洛夫的经历中也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这一角色的实质是，赫鲁晓夫要在政治上揭露斯大林，而苏斯洛夫则从理论上为此寻找根据。

现已得知，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倡议，以及在共产主义战术战略方面一些新的理论原则，并不是中央主席团整个“集体领导”提出的，而是其中的“三人小组”——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提出的。

在这一方面，提交第20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两个文件：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总结报告中有一章是关于修改列宁主义旧的战术战略问题；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不仅揭露了斯大林的恐怖行动，而且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语录，论述了个人迷信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从而，这两个报告不仅打破了迄今为止最严格的禁区，而且提出了与列宁主义的主要教条相违背的一些新思想。

向苏共代表大会这种教条主义会议提出这种“异端邪说”，

本来是一种冒险的举动。需要有豁出去的勇气。赫鲁晓夫这样做了，并没有引起什么震动，令人惊讶的倒是苏斯洛夫所起的作用。他的举动迄今仍是一个政治一心理之谜。

他的这种作用完全被埋没了。喜欢叫叫嚷嚷、东颠西跑、“无所不知”的赫鲁晓夫把苏斯洛夫盖住了，以至于人们仍象从前一样，称他为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其实，修改列宁主义并对揭露斯大林迷信进行论证的正是苏斯洛夫。在理论上一窍不通的唯意志论的政客赫鲁晓夫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理论部分，全是出于苏斯洛夫之手。当赫鲁晓夫轻举妄动地离开苏斯洛夫为他拟好的措词严谨的讲稿之后，他的悲剧就显露出来了。在斯大林问题上，这个讲稿虽然不大符合逻辑，含义却是明确的：斯大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1934年以前是一个斯大林，1934年以后是另一个斯大林，前者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一位正统的和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后者在理论上是有错误的，在实践中是“乖戾”的。但是这个斯大林并不是罪犯，而是有错误的列宁主义者。因此，斯大林可以安葬在列宁的身旁，伏尔加河上的城市依然叫斯大林格勒。

当赫鲁晓夫在22大（1961年）离开了讲稿，把斯大林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坏人时，苏斯洛夫给它降低了调子（当前，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赫鲁晓夫按着他的讲稿照本宣读时，苏斯洛夫不仅给予支持，而且着力宣传。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实验室把赫鲁晓夫许多混乱不堪的、有时甚至与现行制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改革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苏斯洛夫的作用在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虽然十分重要，但已经不能再起决定性作用，直到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才使他重新成为中央主席团的仲裁者。

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时，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心里明白，这将关系到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揭露斯大林整个“三人小组”的命运，于是坚决抵制这种决定。当初，他们曾与赫鲁晓夫一起召开了中央特别全会（1957年6月22—29日），苏斯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集团的分歧实质的报告。“中立”的仲裁人苏斯洛夫有意歪曲事实，毫不费力地证明赫鲁晓夫的正确和莫洛托夫派的错误。在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尚未入党时就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党的老一代功勋活动家（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用了整整七天时间向中央全会证明，赫鲁晓夫是一个思想混乱的“唯意志论者”和危险的“主观主义者”，应当把他撤掉（五年之后，1964年10月14日推翻赫鲁晓夫时，苏斯洛夫对赫鲁晓夫提出同样的指责），但是白费力气。

全会参加者深知，如果莫洛托夫集团胜利，就有可能导致重新评价20大的路线。这是他们谁也不希望的。全会宣布原中央主席团的多数人是“反列宁主义集团”，并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赶出中央委员会。组成了新的中央主席团，赫鲁晓夫派在其中占了绝大多数（为了掩盖改变的规模，决定让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暂时留在主席团和政府的岗位上）。在赫鲁晓夫派中，最忠诚的要算当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了。

赫鲁晓夫从自己的凯旋大捷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现在可以干斯大林曾经干过的事了。他决定大权独揽，包括党权、政权、甚至军权（他获得了和平时期不常有的称号：最高总司令）。不幸的是，他竟然野心勃勃地想闯进一个对他来说一窍不通的领域——他想打扮成一个党的理论家。但是，他既没有读

过马克思的书，也没有读过列宁的书，只好常常引用他童年时所学过的圣经来为他的新理论制造根据。

他还常常说漏嘴，喜欢离开苏斯洛夫机构为他写的讲稿离题千里地“大加发挥”，这些自我发挥通过广播和电视转播出去，翌日，苏斯洛夫不得不在《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讲话时把这些“无稽之谈”统统砍掉。

这大概是赫鲁晓夫想摆脱苏斯洛夫的书刊检查及其在中央的意识形态垄断而与之对抗的原因之一。不久，外交部一个小小的新闻司长伊利切夫突然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苏斯洛夫的职务未变，但是活动范围缩小了，只限于同外国共产党打打交道，在国内，则限于审查一下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教学大纲而已。

不过，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的新党纲，仍由苏斯洛夫负责制订。赫鲁晓夫毫不客气，没有让作者本人向第22次代表大会作报告。由苏斯洛夫领导起草的关于党纲的报告是赫鲁晓夫宣读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的手笔。为此，赫鲁晓夫没有成为理论家，他从心眼里讨厌苏斯洛夫。

由于赫鲁晓夫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再加上他“唯意志论”的轻举妄动，中央委员会里酝酿了推翻他的阴谋。这个阴谋是由苏斯洛夫带头搞起来的。他在1964年10月14日的中央全会上作了指责赫鲁晓夫的报告。如果说当时他没有担任第一书记，而是让给勃列日涅夫担任的话，这完全是他心甘情愿的。苏斯洛夫一直是一个在幕后活动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能够代表最高权力，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实施这种权力。苏斯洛夫能够实施它，但它却宁愿处在幕后，免得引人忌恨。这样做是成功的。

但是，10月倒赫政变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苏斯洛夫当了中央第二书记，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第一书记掌握着中央委员会，而第二书记却在一定的形势下掌握着第一书记本人。报刊对于中央第二书记的作用和职能估计得非常不足。在列宁时期，斯大林是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了第一号人物。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是第二号人物，后来也成了第一号人物（虽然为时不长）。马林科夫时期，赫鲁晓夫是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了第一号人物。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是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了第一号人物。勃列日涅夫时期，苏斯洛夫是第二号人物，但是这个二号人物却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作第二书记时的权力更大。由于苏斯洛夫的恩赐，而且只有当苏斯洛夫愿意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才成为第一书记（现在为总书记）。

因为，除了第一书记或总书记之外，中央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在法律上是由第二书记领导的。由于第一书记在大部分时间里忙于“大政方针”和一些出头露面的事，第二书记实际上成为政权的主人。如果第一书记离开了莫斯科，那么全部政权在实际上和法律上都自然而然地落到第二书记的头上。因此，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沿岸的高加索休假时，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终于把勃列日涅夫临时性的实际地位从法律上固定下来了。这也是苏斯洛夫的功劳。现在，这个戏再演一遍已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如果他不干去干掉勃列日涅夫，那只是因为勃列日涅夫不仅是他的傀儡，而且是他的第二个“我”。这个制度的一切重大失败都可以归咎于傀儡，而一切成就都可以归于自己。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苏联国内的事态，便可得到证实。苏共一切重大的内政外交，无一不是苏斯洛夫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润色。他相当达练，机智灵活，不再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对他来说，如同



赫鲁晓夫时期一样，“集体领导”并不是一句空话。他没有忽视它，而是以他的斯大林式的高级权术师的天赋来驾驭它。

在任何一个思想专制的党里面，定调子的总是第一理论家。对于苏共来说更是如此。它的主要的政治领导往往就是它的主要理论家。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显得头脑过分简单。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比他高明，但是勃列日涅夫有个优点：他有自知之明，因此，同赫鲁晓夫不一样，他没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欲望。

政治局和书记处里的其他成员的水平也不比勃列日涅夫高明多少。因此，苏斯洛夫占了垄断地位。斯大林却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那时，苏斯洛夫只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他与伊利切夫分管这一工作，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头号思想家和头号理论家了。苏斯洛夫是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审判者，他可以确定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决定它今后应如何发展。他可以象检查学校里的教科书那样检查柯西金的“改革”方案、葛罗米柯的照会、波德戈尔内的法令、格列奇科的命令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

作为意识形态权威，苏斯洛夫从1948年起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代表同外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他代表苏共参加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他代表苏共中央亲自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文件——1957年和1960年国际共产党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了同中国共产党举行的调解纠纷的谈判。中国人民要求重新评价20大和22大关于共产主义战术战略问题的主要决议，包括新党纲在内；他们还要求给斯大林恢复名誉。

1964年2月，赫鲁晓夫下台的8个月之前，苏斯洛夫向苏共

中央全会报告同北京谈判的结果。他为党的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辩护，批评北京的立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亲托洛茨基主义的。诚然，赫鲁晓夫同北京之争已远远超过了苏斯洛夫所提出的公式。苏斯洛夫和新的“集体领导”曾打算利用赫鲁晓夫下台后有利的心理状态来迎合北京的要求，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但是1964年11月同周恩来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中国人仍然坚持要全盘否定20大和22大的决议。莫斯科如果退到这一步，那无异于承认北京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内部的领导权。这对苏斯洛夫本人来说不啻是政治上的自杀。

不过，北京的立场对克里姆林宫不是没有影响的。在国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部分地恢复了名誉，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和警察镇压措施。在对外政策上，克里姆林宫决定用事实和行动来驳斥北京关于“修正主义”和背叛共产主义的断言。它的作法是，凡在北京进行柏拉图式的威胁和舌战的地方，莫斯科送去金钱和武器，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我们党对于那些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将给予全面的实际援助。”（见1966年3月30日的《真理报》）勃列日涅夫的这句话并非放空炮。仅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据点古巴和越南为例，莫斯科每年为古巴付出3.6亿美元，为越南付出10亿美元。莫斯科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支出的费用是多少，谁也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肯定要比北京多得多。

苏联的这种对外政策事实上是由苏斯洛夫操纵的。苏斯洛夫一面实行有弹性的对外政策，同时又忠于20大和22大的决议，只是对这两次代表大会关于“个人迷信”的决议作了部分修改。他清醒地认识到，批评斯大林不仅是批评过去的制度，也是批评现

在的制度。因为斯大林的死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更替。制度没有变，只是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停止了，因而普遍的恐惧心理也消失了。就在这种没有恐惧心理和继续批评斯大林大规模镇压的情况下，整整一代反对斯大林的知识青年在苏联成长起来。这些青年认为，如果斯大林从神的地位上降下来，那么在共产主义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神。为了说明这批青年的特点，官方报刊上出现了“虚无主义者”的术语，这个术语不能给人们提示了一段可怕的历史（19世纪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从精神上培植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恐怖主义者）。

“新虚无主义”运动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到如此具有威胁性的程度，以至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宁可牺牲自己的“反斯大林分子”的声誉。为了杀一儆百，他们审判了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随后又审讯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青年作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对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的作品，直到他们表示忏悔之后，才撤销了禁令。勒令特瓦尔多夫斯基停止其在《新时代》上搞自由主义的赌博。他服从了，这才获得了列宁勋章，但是后来，他又发生动摇，只好解职了事。肖洛霍夫奉命在党代表大会上表示拥护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的判决。肖洛霍夫“超额完成”了任务。他说，对他们判得太轻了，若在以前就得枪毙。肖洛霍夫在克里姆林宫的这次讲话受到了嘉奖，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随后又得到两枚勋章：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违者挨整，顺者受赏。精神生活中的这种新斯大林政策的制定者和鼓动者又是苏斯洛夫。

最后我想声明。也许我多少有些夸大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作用。但是，由于材料不足，我只是粗略地给“集体领导”中

的这位出类拔萃的成员勾划了一个轮廓。他作为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是没有对手的，而作为一个权术大师，则超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宫廷礼仪，他在政治局的11名委员中，是列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之后的第四位人物。当然，礼宾等级所看重的是法律上的头衔，如果存在一种实权等级的话，那么苏斯洛夫就得首屈一指了。

（写于1970年）

## 四、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 （一）新风格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人带着达官贵人的傲慢目光，迈着粗野军人的大步走上了讲台，开始照本宣读：“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训练有素的会场上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然后转为我们从斯大林时期就很熟悉的欢呼声，最后象掀起一阵巨浪：全场5,000名代表和包厢里的上千名来宾，顿时象接到命令一样离座而起，拼命高呼：“乌拉，乌拉，光荣，光荣……”这种欢呼声一个劲儿地持续下去，直到讲台上的报告人用威严的手势向主席台表示“行了，坐下！”为止。这个报告人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他在宣告了自己当选的消息后才宣读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名单，他从来不按字母次序，而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然而，在勃列日涅夫以前的苏共历史上，宣布选举结果的次序一直与此相反。现在也不应当是这种次序，因为根据党章（第38条）规定，总书记在党的执行机关的官级表中是放在最后：首先是中央全会，其次是政治局，第三位是书记处，第四位才是总书记，他属上述

三个机构领导。那么该如何解释总书记的行动呢？是原先那种谦虚感已经消退，还是想表明政治局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如今已是他统治党和国家的个人独裁呢？两者都不是。他是在演戏，在题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剧里演戏。不过，这出戏要一直演到这个党停止存在为止。这个剧本不是他写的，而是由党、警、军“三角统治”中的一些无名作者写的。导演是政治局，总书记仅是其中一名主要演员而已。当然，西方那些无所不知的克里姆林宫的星相家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勃列日涅夫现在已是一国之长。不管怎么说，剧本的作者和导演把25大变成吹捧勃列日涅夫的狂欢节，其目的就是要给外界造成一种总书记无所不能的印象。尽管党的意识形态巫师发出种种咒语，然而共产党要进行专政便不能没有对领袖的“迷信”。唯一的区别是：前几位领袖都获得了享受“迷信”的权利，有的是因为具有超人的才能（列宁），有的是出于骇人听闻的罪行（斯大林），有的是因为向全世界揭露了这种罪行的行动（赫鲁晓夫）。但是，一无所长的勃列日涅夫却只能人为地制造“迷信”，以便把总书记变成寡头政治手里一个可靠的工具，在对内政策方面他可以享有足够的权威，对外打交道也有资格代表本国的利益。因此，把现在的党的上层会议看成党的“代表大会”是纯属误会。党的最后一次名符其实的代表大会是第10次代表大会（1921年），那时还能够发一些与中央机关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如“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宣布，从今以后，党内将长期持续不断地处于“戒严状态”，党内禁止各种违反中央意志的不同思想（发表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等于给未来的总书记斯大林发了一件万无一失的法宝，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做法没有废除之前，实际上取消了它的一切作用（1939年的党章规定至少三年

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但是，斯大林时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19大是在18大之后过了14年才迫不得已举行的。斯大林死后，代表大会开始正常进行，但已经不是名符其实的代表大会（只能算是一种政治古董），而只是三种人物的大检阅，即经过严格训练的党阀和国家官僚主义者，加上一定数量的工农特权阶层作为配角而已。因此，这些会议完全不象列宁时期的党代会，也不象西方国家一些党（也包括共产党）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既不建立小组或者工作组，也不讨论争议问题和不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就由寡头政治的智囊人物解决了。操劳的中央委员会把所有这些工作都揽在自己身上，免得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再去多费脑子。此外，党的机关还设法找一些思路敏捷的快手为代表们起草发言稿。其内容无非是我们的中央多么英明，总书记多么高明，成就多么伟大，等等之类。每个报告人讲话结束时，都必不可少地注上：“经久不息的掌声”。报告人都知道一条不成文的规律：谁要离开了讲稿而有所发挥，就将被“列入另册”。列宁在世时，党代会的记录中对会场气氛有多种多样的说明，如“笑声”、“活跃”、“反对”、“赞成”、“激动”。那时，每个发言人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可以批评列宁本人，嘲讽党的机关干部官僚习气，甚至可以引用一些针砭时弊的反苏笑话。在勃列日涅夫的党代会的记录中就找不到这一类东西了：在这里，每一个报告人要么是复述《真理报》社论的自动机，要么是为总书记唱颂歌的公证人，要么干脆就是报告人的活“僵尸”在发言。

勃列日涅夫的代表大会同以前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列宁和他那一派政治家，发言时从来不写讲稿，顶多写一个提纲，即席讲话。第一次根据书面材料发言的是斯大林，但是他是用中央机关

的材料，自己动手写的。赫鲁晓夫喜欢即席讲话，因为他不会写文章。所以他的报告是由别人代写的，象现在一样，这种报告写得枯燥无味，没有文采（只有在20大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划时代报告例外），至于他即席发挥的部分，也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粗言俗语，引用的圣经故事多于马列经典。为勃列日涅夫写报告的是一帮熟练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们缺乏的是创造思想和文学才华，有的是说废话的才能和官腔官调的精工斧凿。“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作者们同涅克拉索夫的文风截然相反，不是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思想，而是用冗长的语言表达贫乏的思想，总书记念起来又是那样平淡单调，以至于人们怀疑，他自己是否懂得他在念什么。坐在大厅包厢里的外国观察家们感到惊讶的是，既然报告人的语调里没有阴阳顿挫，在重要之处又面无表情，那么会场上怎么能猜到在报告的什么地方需要插进去“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或“暴风雨般的掌声”呢。其实也并不奥妙：会场是跟着主席团前排那些内情人的动作而行动的。

总书记的长篇讲话并不说明他的词汇丰富。相反，他的词汇少得可怜。而且，其中的政治术语，其概念同大家通常的理解截然相反。这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克里姆林宫的外交辞令就是含糊不清的）。一些党内术语和对内政策方面的许多概念也是如此。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这绝不意味着应当扩大“民主”的范围，恰恰相反，是要缩小其范围，完善国家对公民的全盘官僚主义监督。“提高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这意味着，党应当和必须干涉共产党员和非党公民的个人生活（例如，家长是否以公德或宗教意识教育其子女）。再举一个例子：在总书记报告中国际部分第五节（即最后一节）的标题是：《苏共和世界革命进程》。这纯粹是

伊索寓言的手法。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不是“世界进程”，而是“世界革命”。由于列宁的这个术语早已名声狼籍，所以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想出一个新的代号，叫做“进程”。这就是党代会的风格和党的用语的伪善性，接下去我们来分析一下勃列日涅夫在25大报告中提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二）经济方针：新斯大林主义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体制在外表上给人以和谐一致的假象，但是在他所依赖的党、警、军三根支柱的派系利益之间，在整个掌权者的利益和人民的物质利益之间却充满了内部矛盾。简略地说，这种矛盾是：上层权力机构中的“三角政权”共同推翻了赫鲁晓夫之后，警察机构力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换言之，是要恢复过去在斯大林时期的原状，脱离党的监督），而在推翻赫鲁晓夫时起了主导作用的军队则要求日益增多的社会产品来填充军事机器越来越大的胃口。党的机关却既不肯放松对政治警察的控制，也不能没完没了地对军人让步，自掘坟墓。制度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另一种性质的，这是苏联社会结构本身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是以数百万名党和国家机关里的官僚分子所组成的新资产阶级与争取公平分配国民收入的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苏共行动依据的列宁曾写道，任何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高级官员的薪金都不得超过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见1917年写的《四月提纲》和1918年的《国家与革命》），然而在革命之后大约60年的今天，领导层中的官僚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已经扩大到不得不严加保密的程度。

但是，目前的苏联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他们已经不是革命前那种愚昧落后的劳动者。伟大的工业革命尽管付出了惨无人



道的代价，但是终于耕耘了古老的、遍地是农民的俄罗斯大地，它所引起的文化革命使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苏联变成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强烈渴望得到科学技术，渴求世界上的精神财富和人文科学成就，向往西方文明。来自知识界的日益增长的压力，是当局与人民之间的另一种矛盾。当局最担心的也是这后一种矛盾。当局认为，现行制度的分解酶来自知识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以萨哈罗夫院士和格里戈连科将军为首的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便是60年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当然，党参加了全民文化革命的自然过程，但是，不管它如何努力，都不能创造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和新的精神财富，也不能使苏联人民变成新的民族社会共同体。苏联国内共有一百多个民族，尽管党的思想家进行了一系列反民族的活体解剖，但是它们在60年内始终保持了本民族的绝对不可侵犯性。这样一来，列宁关于各民族融合的空想，以及共产主义大国同化论者的俄罗斯化政策，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第四种矛盾是苏联新式思想专制殖民制度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方面的表现是：乌克兰人、犹太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高加索的民族解放运动者所组织的民族运动。以上就是这种制度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的性质，否则，要缓和与克服这种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苏维埃制度中还有一种机能性矛盾，它可以通过改变总的政策方针和修改经济政策的重点来加以克服。我认为，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有如下几点：（1）斯大林式的国家计委和它那整套僵硬的官僚制度是打击人民经营积极性的摧残者（与宣传家的谎言相反，资本家也要搞计划，但是他们计划的核心是人的利益，而不是残暴肆虐的党的利益）；（2）斯大林为了政权，不顾人民利益而提出了一个反人民的理论：

“优先发展重工业”；（3）不愿放弃彻底破产了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农业减产的前因后果；（4）史无前例的、在议会民主和新闻自由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政权机关的全面营私舞弊：在上层表现为“新阶级”的合法特权，在下层则是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贪污行贿、官官相护。根据苏联的生活背景，我们来研究一下勃列日涅夫报告中所谈的对内政策部分，首先，报告充满着官方的乐观主义——我们的成绩多么伟大，人民何等可爱，党无比光荣，党的书记又是英明之极！与此同时，却没有公开提出国家所面临的极为尖锐的问题。但是，领导集团并非不知道这些问题，也并非不为之忧虑。勃列日涅夫自己指出：“是的，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我们比那些批评家们更了解我们存在的缺点，看到我们的困难。”（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这是一句陈词滥调，说过千百次而无济于事的老生常谈。一种制度的经济效率如何，社会是否公道，并不在于它自称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别的名称，而是要看居民的物质生活标准提高了多少，居民的公民权利和精神自由扩大了多少。从实质上来说，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是苏联社会主义对政治经济进行绝对控制近60年历史的总结。结果如何？从某些战略物资的产量以及军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来看，苏联已跃居世界第一；从民用工业品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工资还没有超过斯大林时期的“最高限度”。勃列日涅夫曾保证到1980年把工资水平提高16—18%，起码达到170卢布。但是，实际工资仍在原地踏步不前，因为据专家们统计，苏联变相的通货膨胀率至少是5%，集体农庄市场的产品比国营商店贵60%。

勃列日涅夫不顾事实地说，苏联的农业也在“发展”：

“……农业产量继续提高。同第八个五年计划相比，平均总产值增加了13%。谷物平均每年增加1,400万吨。肉类、奶类和其他畜产品的产量也有所增加。”（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然而，苏联广为流传的一句笑话是：“苏联种庄稼，美国收庄稼”。）报告保证使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增加24—27%（现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为55卢布）。

在已经过去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曾宣布优先发展轻工业。因此商品和食品的供应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在新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又恢复了斯大林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请看柯西金提供的材料：1976—1980年期间，甲类（重工业）产品的产值将增加38—42%；乙类（轻工业）产品的产值将增加30—32%，轻工业的增长率将比重工业低8—10%。为什么党不再继续推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针而回到斯大林的老路上去呢？因为在面包与导弹之间有着直接联系（难怪苏联有人说：“我们发射的是卫星和农业。”）。面包和导弹两者是不能兼顾的，如果你的目的不是防御，而是为了准备进攻性战争和援助“世界革命进程”的话。为了说明这种联系，我们引用一些西方专家关于苏联军费开支的最新材料。根据这些材料，苏联支付的军费要比美国多40%。1975年，苏联的军费开支为1,140亿美元，而美国是800亿美元。（见1976年3月2日《南德意志报》）苏联的军费恰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急剧增长：12年来，军费增加了35%，苏联军队的数量（赫鲁晓夫本来想裁减）增加得更多，目前已达到440万（内务部的内卫部队和克格勃的边防部队不算在内），比赫鲁晓夫时期增加了100万。在这期间，美国的军队减少了150万，现在为200万人。苏联的洲际导弹在这期间从224枚增加到1,600枚。勃列日涅夫时期还重建了苏联海军（大吨位军舰249艘）。（见

1976年2月23日《南德意志报》)

克里姆林宫不仅酝酿着全球霸权计划，而且酝酿着宇宙霸权计划。因此，苏联导弹满天飞。仅在1975年一年，苏联军队向宇宙发射了62颗军用卫星，而美国仅发射了9颗。（见1976年2月29日《星期日世界报》）总的来说，美国的国民总产值（总收入）比苏联多一倍，而军费开支只占6%，苏联的军费比美国多120亿，占国民总产值的12%。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告诉国会，1975年苏联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三倍，军用飞机多一倍，导弹多三倍，军用舰艇多二倍。（见1976年3月18日《星条旗报》）

然而，对于西方尽人皆知的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勃列日涅夫却只字不提。他始终没有透露过，苏联为了让共产党人在越南、老挝和安哥拉等地取胜共用了多少钱，它又花了多少钱来支持古巴和葡萄牙共产党的冒险行动，资助亚洲和非洲的局部战争，豢养别国的共产党及其同路人。这些慷慨解囊的亿万钞票，都是苏联人的血汗钱。请看勃列日涅夫政府任意妄为和不负责任的一个典型例证：正当美国国会禁止福特总统给予安哥拉亲西方的民族主义军队以物质援助时，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却从国外的广播中得知，由苏联出资的15,000名古巴士兵，在苏联坦克和导弹的配合下开进了安哥拉（这也是勃列日涅夫要干扰西方广播的原因之一）。

这便是面包与导弹的关系，是苏联公民生活水平低下与苏联战争机器胃口庞大的相互关系。但是，苏联经济普遍生产不足的经常性危机有着更深刻的内部原因，这便是经营管理制度上的痼疾。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人负责的经营”。举几个人所共知的事例：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劳动生产率（即生产效率）比苏联高出两、三倍。美国400万个农场主养活的人要比3,000万个集体农

庄养活的人还要多。因此，西方人的生活水平要比苏联高两、三倍。

（命运可真捉弄人：克里姆林宫自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达社会主义”，但是就其公民的生活标准而言，即使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东欧集团中也是倒数第二，仅优于罗马尼亚。）是的，西方存在着失业者，但是，西方失业者所得到的补助金要比苏联普通工人的工资高，他能养活全家人，他们是坐着私人汽车去领补助金的。看来，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铁的规律”这句名言的破产，然而直到目前，各级党校还在向苏联公民灌输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绝对贫穷化也发展了，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积聚的绝对普遍规律”的贫困化规律占了统治地位。他们硬说中产阶级在消失。形成了两极分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幻想。情况正好相反。只有赤裸裸的伪君子 and 不可救药的笨蛋才会否认如下的规律：哪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达，它的发展水平越高，劳动人民的生活内容也就越丰富多样，生活水平也就越高；反过来，所谓的“社会主义”越发达，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其公民的生活便越狭隘，生活水平也就越低。这里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已被列宁所发现。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步经验是行不通的，因为它的经营管理效率低。列宁认为这是由于苏联人缺乏个人的物质利益，因此他取消了“军事共产主义”，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当时，苏联经济的“黄金时代”来到了：商店里的商品和食品琳琅满目，农业上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产品过剩的危机。粮食之多，使党在第12次代表大会（1923年）上作出了寻找国外市场的决定。这种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当时是共产党专政，大工业的“指挥权”控制在国家手里，中小轻工业品以及各种餐具等被宣布为自由产品，可以私营。土地在形式上仍是国有，但是可以交给农民劳动使

用。农民是自己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只需向国家交纳事前确定的粮食税就行了。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剩余粮食。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国家将依赖农民而存在，因而必须颠倒过来，使农民依赖于国家。于是，他在20年代末取消了新经济政策，而实行延续至今的国家农奴制。同时，他也取消了自由工业。从此，苏联的经济再也没有摆脱过各种必需品和食品生产不足的危机，不论城市和乡村都是如此。

第二个原因便是党魁们的整个经营管理不善，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现象如此之普遍，因此第十个五年计划称之为“提高效率的五年计划”，不惜把总的发展速度压到前几个五年计划之下。如果整个管理体制的效率不高，那又怎么能把其中短短一段时期说成是“高效率”的呢？勃列日涅夫并不否认，糟糕的是整个体制的效率不高。他说，“为了顺利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只有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重点是提高效率，这是我们整个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得到利用，我们年年都要少拿好几十亿卢布的产值。这里指的是直接损失。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并非所有的部和主管部门都在积极发展专业化……”（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

这里主要指的是重工业（不包括超效率工作的军事工业）。那么轻工业（乙类工业）的状况又如何呢？勃列日涅夫说：“……中央委员会认为，乙类工业部门的状况不能使我们满意……你们还记得，24大曾经提到要坚决满足人们对日用品的需求……必须承认，这个任务没有全部完成。我们还没有学会在高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来迅速发展乙类工业和服务部门。”这里的

问题已经暴露无遗：（1）苏联的经济体制不是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而是依靠计委这个僵硬的官僚制度，因此这种体制必然是低效率的；（2）既要面包，又要导弹，两者兼而顾之是不可能的。（戈林生活在导弹出现以前的时代，所以他的口号是：“宁要大炮，不要黄油！”），克里姆林官所要求的是：“宁要导弹，不要面包！”）

勃列日涅夫打算怎样使苏联经济摆脱这种产量少、效率低、管理不善的总危机呢？他与他的同伙们，都惯于用官僚主义方式思考问题。因此，他不是从政治社会方面去找原因，而是在官僚主义的管理方面去寻求治疗苏联经济弊病的灵丹妙药。因此，他不是象列宁那样采用新经济政策，而是象匈牙利人那样采用“新经济体制”。不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都未曾向代表大会报告过新制定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勃列日涅夫说，研究并制定了“总的管理计划”，“我们能够也应当加速改组经营管理体制”。然而，要改变当前经营不善的体制只有一个办法：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经济政策，实行类似的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在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同时，实行轻工业非国营化，服务行业私人化，农业个体化，市场自由化。如果你戴着斯大林式的有色眼镜，也许认为这种计划是反苏的，一旦摘下这副眼镜，就会认出这是“列宁主义的宝库”。每个共产党员都很容易发现，这里指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当时，列宁和党都曾说过这个政策是一种“长期”的计划，是“整个历史时期”的计划。对克里姆林官来说，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勃列日涅夫现在提出的主张，也象我们亲眼目睹的赫鲁晓夫的无数次“改组”一样，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 (三) 党与社会

有人指责苏联共产党是一党治国。说得不完全准确。他们党内有许多“党”，就象俄罗斯的一种抱娃娃的玩偶，一个套一个。第一层是最“大党”，约有1,600万党员和候补党员；第二个党套在第一个党里面，是各级党委会的400万委员，再里面是大约40万名专职党的干部；最后是“上层精华”，从区委会到苏共中央的大约三万名党的书记。这些“党”各自根据职务大小来分享这个国家的权力，“党”的人数越少，权力就越大。1,600万名苏共党员是没有实权的。真正在苏联掌权的是三万名书记。因此，卡尔·拉捷克尖锐地指出：“在苏联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书记专政！”

这便是党内自上而下的一幅垂直官级图，一个共产党专政的金字塔：底层是普通党员，中层是“委员会集团”，上层是“书记集团”，塔尖上是政治局。但是，党内还有一个平面权力划分图。美国人称之为“社会层”，即把党分为“党内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和“党内无产阶级”。党内的这种社会划分，是德热拉斯在自己的经典著作《新阶级》里提出来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格·史密斯也叙述了当前这个“新阶级”的生活情况。史密斯所谈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新鲜，但是它却再一次有力地驳斥了勃列日涅夫在25大上讲的“党内没有不让人民知道的秘密”。否，党内有秘密：党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摆在人前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背着人民的豪华生活。例如，柯西金在代表大会上承认，党早就脱离了艰苦朴素的“列宁主义原则”。他说：共产党员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人为地限制一般人的正当需要”。（见1976年3月2日《真理报》）但是，只有“新



阶级”才真正地开了禁。史密斯也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他的一些观察：

每逢周末，在距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可以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擦得锃亮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排成两行，发动机突突地响，司机们眼睛盯着反射镜，不顾规定和警察的警告，满不在乎地把车子停在界外。他们只是一个劲盯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楼的入口处。这幢土黄色的大楼，窗户是不透明的。门口有一块牌子说明：1919年，列宁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另一块牌子上写着：“领证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这里领到“证件”，只有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在此出入的男男女女都拎着大提包，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皆为苏联上层人士。他们来到这座没有任何招牌只要持特殊证件就可进入的商店里（配售店里）选购东西。无数的秘密商店掌握在苏联上层社会的手里，掌握在被一名苏联记者出言不逊地称作“我们共产主义贵族”的老板们手里。上层分子可以在这些特殊商店里购买俄国的稀缺食品（鱼子、鳊鱼、鲑鱼和出口伏特加）、洋货以及不收官税的便宜货（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法国香水、德国晶体管、日本录音机）……特权制度是按级别严格规定的：官职越高，特权越大。首屈一指的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委员和部长们。他们都享受着“克里姆林宫的份额”。就是说，都能得到免费供应。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大厦里有特设的商店。在共青团大街的一座三层楼房里，有一家专为193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开设的配售店。在另一个地方为元帅与将军们设立了廉价商品配售店。其次，是为著名学者、宇航员、企事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设立的配售

店。另外还有为著名作家、演员、获得列宁勋章的芭蕾舞明星、报纸编辑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官员等人设立的配售店……在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三层楼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100号分店”也是专为上层人士设立的……在军人商店的地下室有一个只有军官才能买东西的秘密场所。裁缝店、理发部、洗衣店、化学洗染店、各种生活服务商店以及食品店遍布莫斯科，约有100处之多，都是秘密地为特殊人物服务的……苏联一位女记者的丈夫指出：“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已经建成了……”特权是一种政治待遇。特权统治制度正在为密洛凡·德热拉斯称之为“新阶级”的人敛财聚富……苏联社会里一部分有声望、有才学的人士也属于这一阶级，他们约100万人（是从3,000万知识分子中挑出来的）。苏联人把这个制度叫做“干部花名册”制度，它包括了从农村到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党的干部。在每个州府里也有专为上层人物开设的秘密商店网。“干部花名册”的作用，就是要使这些人抱成一团，象封闭社会那样，永远固定下来，繁衍生息。这种股份社会是不会把股息分给普通党员的。（见1976年第9期《明镜》周刊）不用说黎民百姓，就连普通党员群众也看不到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共产主义”是什么？乌克兰的一句俏皮话说得好：“共产主义”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小子，有人当老子”。勃列日涅夫却想使我们相信，“党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党的机关的秘密不仅不能告诉人民，而且也不能告诉自己的党。

苏共25大就是苏联上层人物的代表大会，是享有特权的“新阶级”的代表大会。请看代表大会资格委员会的材料，代表大会的4,998名代表按照其社会职业可分如下几种：

1、党的官僚1,807人（他们是从1,114名区党委到中央的党

的书记，693名在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党员干部中选出来的)；

2、技术政治专家1,703人(从部长到各工业部门的领导人)；

3、农业职员和专家887人(国营农场场长、集体农庄主席和畜牧场场长)；

4、元帅、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314人；

5、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界的代表272人。

“旁证”材料也表明，25大是经过挑选的党的上层分子代表大会，其中98%的代表都有几枚勋章和奖章。当然，代表大会上也有“工人”和“农民”，但是他们只是起个跑龙套的作用。有3,897名代表是战后入的党，从年龄上讲，70.5%的代表都在50岁以下；各民族的代表有60个；妇女代表占25.1%。(见1976年2月28日《真理报》)(这个相当年轻的代表大会选出了平均年龄约60岁的中央委员会和平均年龄为66岁的政治局。73.5%的代表属于勃列日涅夫这一届的人，他们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升上来的，首次参加党代会。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比前两届代表大会更加肉麻地吹捧勃列日涅夫便是可以理解的。勃列日涅夫在掌声中讲完了报告中关于党的部分之后，说：“那些不能以批判态度来评价自己的工作，脱离群众、阿谀奉承的人，不能成为党的领导人……。(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假如勃列日涅夫愿意以这个原则来律己的话，他应当立即下台；至于大会的发言，更应当大大缩短，因为发言的前半部都是吹捧总书记，后半部又缺乏批判性地评价党内和国内问题的起码态度。

对于苏联一些有思想的人所关心的尖锐的精神生活问题，勃列日涅夫一个也没有提及。然而，现实生活却早就提出来了。自

从喀琅施塔得起义之后，在现制度历史上第一次从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民主运动，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自由和人权”几个大字；另外还出现了争取自卫权的民族运动（克里米亚鞑靼人）；争取迁出苏联的权利的行动（犹太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争取脱离苏联的权利的行动（亚美尼亚）。与西方世界相反，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几乎所有的教派都在国内死灰复燃了。苏共和克格勃对宗教所采取的对策是众所周知的：那是无数的诉讼案、集中营和精神病监狱。总书记本人则采取了把头藏在沙子里的“鸵鸟政策”。

因此，在代表大会前夕，党政主要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奉命向人民，特别是向知识分子解释：这些问题在苏联根本就不存在。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的题为《苏联的法律和信仰自由》的答《消息报》记者问一文，以及《真理报》的题为《真假自由》的文章，就是为此而发表的。尽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总体来说具有侵略性，然而这两篇文章却表明，在国内强大的压力和外国报刊广泛揭露契卡镇压行为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转入防守地位。苏联领导集团步步为营，编造新的说词，修改旧的谎言，把罪恶嫁祸于好心的执行者。《消息报》写道，苏联问题专家“散布可耻的谎言，硬说苏联没有信仰自由”，该报说，实际上“我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保证信仰自由”，“我国关于宗教信仰的法律是世界上最人道、最民主的”，然而，下面有一段补充：“常言道，丑儿家家有。我国也有一些不得不追究法律责任的宗教极端分子或者亲宗教极端分子”。《消息报》所说的“极端分子”就是指殉教的圣徒亚库宁、杜德科、文斯、列盖尔逊以及其他许多由于信仰问题而关进监狱的苏联守法公民。

《真理报》也为此发表了文章。它说，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一种骗局，只有苏联才是精神自由和公民权利空前发达的国家。“在我国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势力，社会主义的敌人只好利用一小撮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来打击社会主义”。它说，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编造了“一系列假消息；什么苏联迫害信徒啦；苏联当局禁止苏联公民与外国人结婚啦；给前往以色列的人制造障碍啦；苏联没有信仰自由啦等等。社会主义最早解决了信仰自由问题……所谓苏联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特殊精神病院的说法纯系诽谤……至于离境问题，他们把1975年（同1973年相比）前往以色列的人数减少2/3这个事实当作‘压制’的证据。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要求出境的人减少了……有人虚伪地指责我国不执行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第三部分的条款。事实上苏联认真地恪守最后文件的所有条款……人权不仅已在苏联实现，而且得到国际上广泛的承认。联合国大会通过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就是例证。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批准了这个文件。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五个国家批准了它……”

常言道，纸张不怕文章长。《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纸张则更有其顽强的忍耐精神。

对于这些问题，总书记不敢正面涉及（虽然《真理报》在代表大会前夕已经提到），只是间接地提到它。他向代表大会郑重保证，克里姆林宫今后的方针是扩大和加强警察机关：“……我们今后也将不断注意改进警察、检察、法院和司法机关（当然还有克格勃）的工作。（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但是，勃列日涅夫清楚地知道，党本身也对克格勃日益增长的暴行提心吊胆，所以他急急忙忙进行安抚：党的机关将对克格勃的工作经常进行“领导和有力的监督”，使这种工作……“建立在严格遵守宪

法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上”。（见同日的《真理报》）他还谈到民族主义有所发展。他宣布向“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评价历史事件的非阶级态度、地方主义表现和为宗派主义张目的做法”开战。苏联作家又从勃列日涅夫那里得到了一批具有国际意义的“社会订货”。他号召苏联作家歌颂“民族解放斗争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总书记还提起日丹诺夫的一段遗言：“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有社会价值，主要是看它的思想倾向”，党的标准不是作家的才华和作品的艺术水平，而是象《真理报》社论那样的文章，或者象马尔科夫和恰科夫斯基式的无聊之作。我想起日丹诺夫不是偶然的。在代表大会闭幕的几天之后，《真理报》在评述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引用了日丹诺夫一段话：“如果不是我们，那么还有谁来领导反对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呢，如果不是我们，又有谁来给予这种思想以毁灭性打击呢……社会主义已成为各族人民的生活秩序……如果不是我们，又有谁会帮助我们的外国朋友和弟兄们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来启发他们为新社会而斗争呢。”（见1976年3月10日《真理报》）

不过，总书记还是决定安抚那些被日丹诺夫的幽灵搞得惴惴不安的作家和艺术家。他说，党纠正了并正在纠正那些用行政命令来对待创作问题的领导人。（这可能是指莫斯科市委书记雅戈德金由于1975年在莫斯科用推土机推掉自由派艺术家展览会的“艺术”而被撤职的事。）

#### （四）新宪法

总书记向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正在研究“苏联新宪法”草案，他还补充说，“这项工作正在认真地和从容不迫地进行”。

这是为了向全国说明领导集团多次承诺的要制订一部“民主”的“新宪法”草案长期未能完成的原因，这项工作已经“从容不迫”地进行了14年。（宪法委员会是1962年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成立的。）

人民非常了解党关于“民主”的许诺值几个钱。1917年举行的布尔什维克4月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一项动议，其中郑重承诺：苏维埃国家将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规部队、没有特权官吏”的新型国家。更有甚者，在《国家与革命》一书里，随后在1919年的党纲里，列宁和党都曾答应，将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恢复由于存在剥削阶级而一度受到限制的一切政治自由和权利，然后使国家逐步消亡。斯大林于1933年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这个主要原则时说，根据“辩证法的规律”，我们只有在极大限度地强化国家之后才能使国家消亡！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新“贡献”的实际做法，便是取消苏维埃政权，建立现代化的党的极权主义国家（“一党专政”），它的“统治哲学”是：“国家就是一切，个人是没有的”。

我们还记得另一项保证。1961年颁布的党纲向全世界郑重保证：到1971年将建成物质生活丰富的“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到1981年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现在对这种承诺只字不提了。）（聪明的中国人干脆说：“共产主义要经过500—1,000年才能建成”。）

党的这种承诺不胜枚举。老革命家、中央马恩列学院老院长里亚扎诺夫在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披露了党的这种第二天性：承诺是为了赢得时间，撒谎是为了掩盖目的。他说：“摆在你们面前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立宪会议上谈过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将代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请你们费心读一

读，然后扪心自问：你们撒了多少次谎？”（见196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联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75页）

今天，全国各族人民需要的并不是空洞的蛊惑人心的承诺，他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行动。最主要、最根本的是，他们不需要“新宪法”，而需要真宪法！事实上，苏联根本就没有什么宪法。这本小红书根本不能叫做宪法，它的鼻祖是斯大林，那时它的封面上写着“苏联宪法”几个大字。它的真正价值同封皮上的标价一样：3个戈比。我们可以浏览一下宪法的许多条文，然后再来看苏联违反宪法的行径：

（1）根据苏联宪法，“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通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体现的城乡劳动人民”，“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实际上，每个苏联公民都知道，一切权力属于党，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宪法上没有提到的那些机关；

（2）苏联宪法说，“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实际上，谁要是稍微露出这类言论，就被宣布为“民族主义者”而逮捕法办；

（3）苏联宪法保障公民有“信仰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实际上，却在迫害信仰和信徒；

（4）苏联宪法说，“……法律保障苏联公民：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自由；4、游行和示威自由。”实际上，对于那些稍微想利用一下这些合法权利的人，就关进了监狱和精神病监狱；

（5）苏联宪法说，“……保证人身的不可侵犯性。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实际上，克格勃既是侦察员，又是检察长和审判长；



(6) 苏联宪法说,“公民住房的不可侵犯性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实际上,暗中检查书信、任意盘问和偷听电话,这是克格勃各种非法特权中最合法的行为。这便是苏联的现行宪法和维护宪法的行动。

苏联的民主运动要求把苏联宪法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上。俄国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三次获得者、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安·德·萨哈罗夫院士早在1975年就建议对苏联宪法作如下修改,并把它“作为官方立场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1) 企业实行全面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
- (2) 各种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部分地实行非国营化。特别是服务行业和小商小贩,相当一部分实行非国营化;
- (3) 私人行业部分实行非集体化并给予国家资助;
- (4) 大赦因宗教信仰和民族倾向而判刑的一切政治犯;
- (5) 废除死刑;
- (6) 罢工自由;
- (7) 制定一系列法律来保障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自由,散发宣传品的自由,取消与这些原则相违背的刑法条文;
- (8) 从立法上保障对通过的重要决定进行公开的社会监督;
- (9) 有选择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自由;
- (10) 有出入国境的自由;
- (11) 禁止一切形式的党政特权。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是国家的根本原则;
- (12) 从法律上确立各加盟共和国分立的权利和讨论分立问题的权利;

(13) 实行多党制；

(14) 改革货币——实行卢布和外汇的自由兑换。限制对外贸易的垄断权。（见《新闻》出版社1975年在纽约出版的萨哈罗夫著的《论国家与世界》）

萨哈罗夫院士在评述这些要求时指出：“我认为这种修改是一种必要前提，它能保障逐渐改善国家的社会风气，改善多数劳动人民的物质地位，确立自由、幸福和友善的道德风尚，恢复已经丧失的人类宝库，消除我国作为一个由超级武器装备起来的封闭式的极权警察国家而给全世界造成的危险。”这种改革不仅是苏联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的渴望，也是广大工农的愿望。萨哈罗夫院士不仅向世界舆论，而且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制度民主化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对此不置可否。他只作了间接回答：

“……在我们的社会里，凡是有利于共产主义建设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对我们来说，凡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共产主义建设的东西也都是民主的。”（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但是，历史是有耐性的，善恶功过，自有评说……

### （五）莫斯科式的缓和

凡是同共产党签署过某种条约的人应该首先编一本厚厚的术语词典，标明条约中每个词的共同含义和共产党的含义（如“不干涉”、“主权”、“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假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把他们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斯大林的初次会谈放进“术语词典”的话，那些卫星国就不会象遗产那样从希特勒转到斯大林的手里，苏军也不会驻扎在易北河，谁也不会知道有卡斯特罗那样的人存在，苏维埃国家也不会到亚洲和非洲

的热带丛林去寻找自己的“小兄弟”。假如战后编了这本词典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就不敢撕毁那些尚未实现的协议，西方世界里的天真幻想和痛苦失望也会少得多。现在，就连福特总统也不愿意再用“缓和”这个词；他十分明智地宁可使用现实的“有实力地位的和平”一词。和平与爱好和平的政策是排除原子战争的唯一抉择，但是，如今所谓的缓和既非和平，也非爱好和平的政策。它是克里姆林宫强加于美国的全球性雅尔塔。既然美国人找不到合适的词，便只好借用法语里的一个等义词“缓和”来表示。美国如果聪明一点，倒不如直接到俄国人的词汇中去找。那时，他们就会知道，根据苏联奥热戈夫大词典的解释，“缓和”的释意是：

（1）安抚，（2）削弱。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直接译成苏联对“缓和”政策的概念，我们便会发现，苏维埃国家对这个术语的理解过去和现在都是：安抚敌人，使之削弱。苏联领导对于“缓和”所作的这种主要解释，是骗不了人的。他们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说明，“缓和”是意识形态战的继续，共产主义只有通过这种战争才能真正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缓和”才能在西方共产党和“第三世界”民族共产主义势力的配合下为实现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创造有利条件。

把“缓和”纲领应用到目前条件，是在第24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称为“和平纲领”，其实这是个含义不清的纲领。“和平”（МИР）这个词在俄语里有九种解释，与本文直接有关的就有三个：（1）世界，（2）没有战争，（3）交战双方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英美国家在表达这些不同概念时用的是不同的词，指世界时用的是World，指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时用peace。那么24大所宣布的这个纲领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呢？

“冷战”还在继续。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对于共产

党人来说，“冷战”便是意识形态战。既然布尔什维克断言，在意识形态方面无和平可言，那么24大宣布的所谓“和平纲领”便可能是世界纲领，全球纲领，要西方停止对苏联进行“冷战”而苏联却继续对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战的纲领。

但是，最使人吃惊的是，直到“和平纲领”的作者本人道破了天机之后，西方仍然莫明其妙！他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说：“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向我们的战友——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保证，我们今后也将永远同你们战斗在一起……，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争取这种胜利而战斗。”（见1971年出版的24大材料）这一战斗已见分晓：越南、老挝、柬埔寨、安哥拉、苏德条约、波德条约、捷德条约、两个德国的条约、赫尔辛基会议、尚未得手的葡萄牙和大有可为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罗得西亚、西南非洲、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勃列日涅夫在25大上对于“缓和”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他侃侃有词地说：“缓和为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机会。”（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

与此相反，西方认为，“缓和”的结果对西方是不利的。当法国总统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提出把“缓和”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时，总书记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他说得对：第一，怎么能既签订意识形态上的和约，又不放弃莫斯科从物质上援助其他国家革命与内战的信条呢；第二，怎么能不放弃自己在西方后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传统”权利而又能保护自己反对自由世界向自己后方传播消息的“传统”权利呢。众所周知，由于西方把“冷战”中的“和平”理解为意识形态战的结束，因此取消了相当一部分对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苏联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扩大了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机关。（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美国

关闭了已有20年历史的、以其研究成果而得到世界公认的慕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而莫斯科却立即建立了由25大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领导的“美国问题研究所”。）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向25大说明，应当如何理解“和平纲领”：它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国际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要加倍努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争取……保障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权利。目前，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异常广泛而多种多样，以致现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时，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事态，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任何一个客观的人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事态的影响日益有力，日益深入……”（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总书记供认，莫斯科利用“缓和”的形势，从物质上帮助亚洲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非洲的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建立了新的“进步”制度。勃列日涅夫补充说：“苏联对于斗争中的爱国者一向给予全面的支持。”

克里姆林宫在欧洲提出的近期目标是，召开欧洲会议，争取西欧国家和美国“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领土现状和政治现状。……现在，这一点已成为现实”。勃列日涅夫暗示，苏联只对“最后文件”这一部分承担义务；至于文件第三部分关于自由和人权、各国人员交流、自由交换意见和情报等等，总书记认为那是西方企图“利用这个文件作为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以冷战进行反共反苏蛊惑宣传的幌子。同时，总书记再次证实了苏联在解释国际条约上所惯用的两面派手法——利用条约的有利部分，忽视条约给它规定的义务。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利用西方的危机和罢工运动来达到共产主义目的有着重要意义。他看到了分化“共同市场”和北约组织的现实可能性。他含糊其词地指出：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共同市场’和北约组织的内讧都加剧了。”总书记保证要在拉丁美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其矛头显然对准美国：“我们支持（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加强政治自决和经济独立（自然是独立于美国）的愿望。”

克里姆林宫已经狂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总书记一步一步地逼着华盛顿在世界政策上彻底投降。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声明却作了另一种解释，说什么美国“歪曲苏联的政策，借口莫须有的‘苏联威胁’，再一次掀起军备竞赛……企图干涉我国内政……这不是同苏联对话的语言……很显然，威胁着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华盛顿的政策观点在这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这种观点是压迫和反动势力对各国人民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反对这种行径。”（见1976年2月25日《真理报》）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逻辑十分奇怪，根据苏斯洛夫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苏共通过103个共产党和亲共的党在96个国家中进行活动，这可以不叫干涉别国内政。而华盛顿帮助自由国家不受共产主义控制，却成了“对他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真是海外奇谈：我偷你家的牛可以，你偷我家的猪不行。

总书记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国家和苏共在“缓和”问题上的“分工”：苏联政府机关的任务是与别国建立“和平共处”关系，而苏共的任务则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苏联所谓的“进步”就是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请看有关言论：“一些资产阶级活动家对苏联共产党人声援别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问题大叫大嚷。这种做法要么是出于幼稚，要么是故意装糊涂。因为缓和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清楚明白的事情。然而，国与国之间的争执与冲突不应通过战争来解决……缓和绝对不能代替阶级斗争的规律。谁也不能指望共产党人在

缓和的条件下会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妥协……”总书记夸奖苏共在帮助世界上一些共产党彻底消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战略战术。勃列日涅夫提到，“共产党人不能等待资本主义自动灭亡”，而要下决心通过革命来加速这种灭亡。他最后总结说：“今天，我们可以同别国的共产党人一起声明，斗争的途径与基本方向已经选定，联合行动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苏联一位著名思想家在评论勃列日涅夫在25大报告中所谈的“缓和”问题时写道，“在分析各种力量争取国际缓和的斗争结果时不考虑世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是不对的……在缓和的形势下，许多新兴国家公开同帝国主义（即同西方国家——原作者注）进行对抗。……国际缓和也影响到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社会政治过程。它促进了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当前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的条件下，缓和加强了左派力量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共主义的斗争效果……为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团结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众所周知，这些可能性已经在许多西欧国家里胜利地变为现实……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罢工人数大大增加。斗争有时发展到反对统治集团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基础……前面就是新的胜利。”（见1976年第11期《新时代》杂志）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苏联共产党也有一些操心的事：同中国的“冷战”在继续尖锐化，同拉丁美洲和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一些共产党发生了思想分歧。奇怪的是，在同这些党发生的分歧问题上，莫斯科和北京的教条主义立场异常相似，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下列宁主义的概念，就会发现这一点。列宁主义指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的特殊贡献。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夺取政权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暴力的“无产阶级

革命”，（2）巩固政权的唯一方法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是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里抽掉了这两点，剩下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十分相似，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无论是同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还是同北京的共产主义都同样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是历史表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只能在落后的国家取胜，因为那里推崇的是力量，而不是理智，是专制，而不是民主。俄国也好，中国也好，第三世界国家也好，都是如此，只有欧洲不是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验恰恰表明，欧洲不希望由一种专政代替另一种专政。但是某些国家却不反对通过和平途径来改变本国的社会制度。如果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的左倾倾向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亨利·基辛格就是未卜先知了，他说：再过十年，欧洲可能真的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上述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懂得这一点，只有不可救药的斯大林分子库尼亚尔除外。因此，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共产党正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深刻修改，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观察家们一致认为：“这是策略”。一点不错：首先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然后再撕下面纱。列宁关于战术和战略的学说正是这样要求的。让我们重温一下列宁的一段教诲：“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23页）我从来不怀疑，象贝林格和马歇这样灵活的策略家会使克里姆林宫的教条主义者接受列宁的这种教导，以便为自己在意大利推行的“历史性妥协”和左派力量在法国的联合进行辩解。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策略是有人情味的



“共产主义”。在华沙条约坦克的影响下（杜布切克的“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达不到的东西，在北约组织坦克的保护下却完全可以办得到。拉丁美洲正在孕育着这种共产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用苏联的坦克运到东欧，它也可用这种坦克运到西欧。但是不论在俄国，还是在欧洲，都没有人真心欢迎过它。而是象瘟疫一样避之不及。因此“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只是在西方那种混乱不堪的资本主义和苏联那种面目狰狞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抉择而已。由于这是一种尚未试过的新鲜玩意儿，人们寄予希望，因此有一定的吸引力。欧洲“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的危险也就在于此。如果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学到了列宁的手法，采用了列宁的处方，那么它们取得政权会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果真如此，必将在欧洲的其他部分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也将席卷东欧，甚至苏联。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对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这种试验怕得要死。如果给“欧洲共产主义”祝福许愿，无异于给克里姆林宫挖掘坟墓；而公开地反对它，又会在西方开辟对苏共意识形态战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是中国）。这使克里姆林宫左右为难。因此勃列日涅夫绕开了这个问题，只好有气无力地谈一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之类的鬼话。（莫斯科的这句行话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上其他党的霸权。）

克里姆林宫既不相信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又不相信西方批评家说的这只是个策略问题。不过我们同意莫斯科的如下观点：凡是公开声明放弃列宁主义大厦的两大支柱——“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确实不是列宁主义者。因为勃列日涅夫本人代表政治局在列宁诞生100周年那天声明：“历史经验已经清楚地证实了列宁的如下思想：各国朝社会主义发展

的特点只能表现在一些非根本性的问题上，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特点’则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见1970年4月22日《真理报》）

当然，欧洲共产党人所遵循的首先是策略动机。但是在政治上重要的不是动机，而是后果。其后果之一就是世界共产主义可能产生新的分裂。这将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同西欧共产主义的分裂。届时，整个欧洲——西欧和东欧——将会动荡起来。这种动荡包含着许多危险，也孕育着许多希望。

（写于1976年）

## 五、勃列日涅夫的宪法

苏联的新宪法并没有新东西。制定这个宪法用了几乎20年时间（赫鲁晓夫1959年在21大上首次提到它）。据勃列日涅夫说，工作是“从容不迫”的。这项工作的主要工具是剪刀和浆糊——从赫鲁晓夫的党纲里剪下一些条条块块，再同斯大林宪法里剪下的条条块块贴在一起。从法律角度来看，新宪法是比旧宪法质量更差的修订版。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使克里姆林宫在国内外的战略目标具体化（这种目标曾是斯大林有意回避的）。勃列日涅夫说得对：“宪法不仅是一个法律文件，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文件。”（见1977年6月5日《真理报》）更确切地说，这个宪法与其说是法律文件，不如说是政治文件。因此，从法律形式上来分析它的具体章节，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要揭示这一法律文件的政治意义却是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力求这样做。

## （一）一党专政法律化

勃列日涅夫在他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里说：“在制订草案时，我们立足于宪法的继承性，保持和发扬了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见1977年6月5日《真理报》）我们来看看列宁给苏联宪法所下的经典性定义：“……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无论是法定的或是事实上执行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一切缺点、任命一切人员和进行一切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一个原则。”有人指责列宁说：这样一来，你们实际上既没有“宪法”，又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只是一党专政。列宁不动声色地说：“当有人指责我们搞一党专政时，我们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坚持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423页）

勃列日涅夫说得完全正确：苏联新宪法体现了列宁的这一基本思想。列宁和他的继承者之间只有一点差别：列宁作为一位灵活的策略家，宁愿用苏维埃这个幌子来掩盖一党专政（党的独裁统治），所以在他经手的两部宪法（1918年和1924年）中，从来不把党作为一种政权力量列进去；但是他的继承者在保留这一幌子的同时，却把幌子后面的东西：党的绝对权力亮出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列宁写他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国内战争开始后的3个月，当时，要不要党的专政的问题，已在战场上解决了；第二部宪法写于喀琅施塔得起义后的第四年。当时，列宁被这个曾是十月革命的“荣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的这次起义吓得仓皇失措，特别是被他们提出的“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

这种对群众有吸引力的口号吓得要死，他写道，喀琅施塔得事件要比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加起来还要危险得多。所以，列宁的这两部宪法的民主要比目前这部宪法多得多。而且，那里一次也没有提到党。1918年的宪法第一章说：“宣布改俄国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了防止背着人民使国家实际上不由苏维埃而由党来管理，列宁在第7条里强调指出：“政权应完全地、毫无例外地……属于工农代表苏维埃。”1918年的宪法第14、15、16条“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真正自由”，承认了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结社和建立组织的自由（我们没有忘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然合法存在）。甚至1918年宪法所规定的关于信仰自由这一条要比1977年的宪法民主得多。1918年的宪法说：“承认所有公民具有信仰宗教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但1977年的宪法只承认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见第52条）。

列宁既是一位头脑清晰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想入非非的幻想家。否则就不能解释下列现象：1918年的宪法里有这么一条：

“第9条，俄罗斯联邦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建立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没有阶级之分，又没有国家政权。”据党的理论家们说，苏联现在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而且“建成”了“成熟社会主义”；据1961年的党纲说，我们将于1980年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但是国家的职能将不会消失。恰恰相反，苏维埃国家成了极权主义国家，而它却自称为“全民”国家。苏联这种极权主义的基础也是由列宁奠定的。正是列宁用“权力合并”的极权主义理论代替了当代法制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理论。

“三权分立”的思想是法制思想的最伟大发现。它最初是由亚

里斯多德提出来的，但是作为一种严格的理论提出来是17世纪末期的英国科学家洛克，特别是18世纪中期的法国科学家孟德斯鸠。根据这一学说，国家上层政权不是一块不可分割的顽石，而是三部分彼此独立的政权——立法（议会）、行政（政府）和司法（法院）部门的合成体。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三权分立”这一学说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意义，简单地回顾一下公元以来的国家发展史就够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把全部上层权力集中于一人（独裁者）、一个集团（寡头政体）或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是无数暴虐制度胡作非为的基础，那怕是纯粹的君主制统治也要比它好得多，因为君主制统治要以成文的法律为依据。“三权分立”的学说已成为防止产生新的暴政的保障。它不仅在国家学说史，而且在国家实践史上为当代法制民主国家的形成开辟了崭新的时代。这种学说就是法国大革命宪法和1787年美国宪法的基础。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及其宪法都已经毫无例外地建立在“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上。东方的共产党国家却不是这样，它们根据列宁的学说退回到专政制度，要求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于一个机构之手。因此，1918年的宪法第31条写道：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立法、行政和检察组织”，大家都知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别称，因而政治局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政府机关和裁判机关，另外还是独一无二的企业主（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代，而是生活在“成熟社会主义”时代）。然而，新宪法对这个实际存在的独一无二的苏联最高权力只字未提。新宪法的创始人却第一次在苏维埃制度的历史上使党的专政，即政治局专政合法化了，新宪法第6条说：“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共产党确定总的前景……确定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路

线……”

如果把这种党的行话翻译成普通语言的话，那就是说，在苏维埃国家里，行使立法、管理和检察职权的是党的各级机构；在莫斯科，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下层是它们的分支机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区委、州委会、市委、区委和机关党委。最好把这些统统写进新宪法，而把那些既没有人需要、也骗不了人的苏维埃的幌子一概扔掉。

## （二）从联邦制到一体化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列宁大概是第一个理解到俄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家，他知道，在非俄罗斯民族约占半数的俄国帝国，只有对所谓民族问题采取极为细致的态度，才能避免重蹈以前各大帝国崩溃的覆辙。列宁既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国沙文主义者，但在政策上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就在于他的细致入微的策略手段。他在推翻旧的俄罗斯帝国和建立新的苏维埃帝国时，都同样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策略手段。

不妨举一个典型例子：国内战争时，邓尼金将军打着“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的口号，而列宁的口号却是：一切非俄罗斯民族，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内都有退出俄国的权利。结果邓尼金输了，列宁赢了，而俄国却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但是，同样是这位列宁又教导说，夺取政权是比较容易的，保持政权却要难得多，特别是在俄国这样多民族的国家里。因此，列宁制订了连马基雅弗利也为之羡慕的灵活的民族政策。

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22年，当时的四个苏维埃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准备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时，党中央于1922年9月24日在列宁因病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斯大林关于建立联邦的计划，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并入俄罗斯联邦，并使其享有自治共和国的权利。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共产党政府拒绝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而乌克兰的党中央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列宁立即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性，便坚决否定了这一计划，并设法通过了中央关于由平等的和享有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联邦的新决议。当然，享有主权的共和国是不存在的。直到现在，联邦仍是虚有其名，但是列宁既保留其形式，又保存了它的内容——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为了保存这一内容，列宁在1924年的宪法里（它是列宁逝世的10天之后，1924年1月31日通过的）加进了一条纯属虚构的权利，即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享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1936年的宪法和目前的宪法都重申了这一权利。但是，享受这种“宪法权利”的简单愿望不会对苏联造成任何威胁，须知在叶若夫时期，对各加盟共和国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各种诉讼案，恰恰都是指控被告有使自己的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嫌疑。那是斯大林时期的事。至于现在，对乌克兰的卢基亚年科小组和对亚美尼亚的埃里基扬小组的诉讼案也恰恰因为：他们按照1936年宪法（第17条）的规定，要求让乌克兰和亚美尼亚退出苏联。但对他们判刑是有法律根据的，因为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刑法典第58条之规定以及根据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俄罗斯联邦新刑法典第64条之规定，凡是违反这3条精神而触犯了苏联“领土不可侵犯性”的行为，不仅可以定罪，而且可以处死。这说明，苏联的刑法权高于苏联的宪法权。

当然，列宁的本意，也并不允许有人退出苏联。完全相反，

他还打算让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加入苏联。因此，列宁在1924年的宪法序言里写道：“新的联盟国家是……把各国劳动者联合成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的新的坚决步骤。”（见《苏联宪法史》第460页）

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乃是在共产党欧洲的范围实现列宁这一遗训的第二步，因为根据这一“理论”，东欧华沙条约缔约国只能享有部分主权。

苏联的理论界领导人正在把这个悄悄对外推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发展到帝国的内部。在新宪法草案公布后的第五天，在遥远的伏龙芝（吉尔吉斯）举行了一次民族问题的理论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只要看看这次会议的领导人和报告人是谁就行了，他们是三个苏共中央委员——费多谢耶夫、乌苏巴利耶夫和伊诺泽姆采夫。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次通过这三名中央委员之口，把1961年党纲里的一句名言：“各民族繁荣和接近”以建立“统一民族”的思想应用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费多谢耶夫在开幕式上说，建立“苏联人民”这个社会历史共同体并不是限制苏联人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接触，“恰恰相反，而是要促进这种接近……”。然而，必须指出一个重要情况，这种理论目前正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从国内政治利益的角度看，“苏联人民”的提法巧妙地掩盖了非俄罗斯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同化和合并的现象，从而在苏联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这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各民族合并成一个新的统一民族的理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理论显然同苏联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任务相矛盾。因为克里姆林宫的近期目标是，把苏联各民族建成“新的社会历史性共同体”作为建立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人类的前奏。因此，费多谢耶夫在提到东欧各国人民时说，“苏联人



民”并不是一种新的民族，而是“各种民族的有机结合的典范”。

（见1977年6月8日《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补充说：“应当把苏联人民看成一种国际联合的初级历史形式，这种形式是各国人民向非民族化人类迈进中的必然现象。”如果“苏联人民”是一种初级历史形式，那么它的“进一步的形式”又是什么呢？苏共中央委员乌苏巴利耶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民族结合和国际主义结合当前不仅发生在苏联国内，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更加广泛的历史共同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

费多谢耶夫和乌苏巴利耶夫的讲话也是对1977年宪法第30条的一种评述和解释，这一条说：“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组成部分，根据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发展和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同志互助关系，积极参加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国际分工。”

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并逐步使它与“新的苏联共同体”合而为一的权利有了法律根据。

### （三）共产主义国家体系的基础

列宁在1917年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里明确地说，未来的苏维埃国家将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规部队和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形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里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而且他还批评了那些有意忽视这种思想的社会党人。列宁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最好鉴证。苏联每年出版几万本书，每月出版几百本杂志，每天出版几

千份报纸，没完没了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语录，但是从来没有遇见国家消亡这段话。为什么呢？因为出现的一位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证的”解释。这位经典作家就是斯大林，他在1933年举行的党的一月全会上说过：“我们不是通过削弱国家政权，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加强这种政权来达到国家消亡。”

斯大林的这一思想渗透在整个新宪法里。因此，在新宪法的序言里并未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改为“全民国家”，从而使共产主义国家永久化。领导“全民国家”的共产党——“人民先锋队”当然也将永世长存。苏联的“全民国家”在“新宪法”里仅仅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仍是过去的那种共产党专政。唯一的差别是，现在已经公开宣布，并在宪法上法定下来。关于这一点，“新宪法”的创始人在第1章便开宗明义了。他们在第2条谈到：“苏联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那么，“全民国家”及其最高主权就应由享有主权的人民来决定了吧。否。其中第6条便把刚刚宣布的人民主权否定得一干二净。我们知道，最高立法者、行政执行者和裁判者只有一个：“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对内和对外政策路线是由苏共确定的。”这就是说，确定和指导国家整个政策的不是国家的最高机构，而是党的最高机构。在这儿，人们才明白了“新宪法”的奥妙所在：原来把所谓“民主集中制”这种纯粹党的管理原则塞进宪法里去了。（见第3条）

何谓“民主集中制”？这是列宁在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上（1906年）提出的，它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一种折中的产物。以后，列宁就用它来掩盖党组织的独裁统治。当党内出

现了要求贯彻这一原则的反对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派别）时，无需再加掩饰的列宁便一口拒绝了。请看第九次党代会的记录：“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列宁同志谈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称那些谈论民主集中制的人都是些蠢货，他还说民主集中制已经成了腐朽过时的东西。”但是象斯大林这样的“民主派”，却把“民主集中制”当成掩盖自己独裁统治野心的可靠工具。因此他与列宁不同，而把民主集中制保存在党章之中。现在，斯大林的门徒们把“民主集中制”写进了国家大法，这再次表明，所谓的苏联民主仅仅是苏联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的幌子而已。

#### （四）列宁论联邦制

如果你对新宪法信以为真，那么苏联是由15个“享有主权”的加盟国家、20个“自治”国家和8个“自治”州组成的。就是说，苏联是一个联邦国家，据第70条说，它是“由各民族实行自由自决，由平等的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自愿联合而组成的”。至于各民族如何自由自决、它们如何“自愿地”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之前，承认非俄罗斯民族具有退出俄罗斯的自决权。但是，一旦在中央掌了权，当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和土库曼人民利用这种权利宣布自己独立并要求退出俄罗斯的时候，列宁和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便公开宣布：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决权”是“劳动阶级的权利”，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些已经实行自决的边疆区在红军远征军团的刺刀下只好重新合并到苏维埃帝国里。

波兰、芬兰、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之所以还暂时

处于列宁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那只是由于红军尚未具备征服它的力量。列宁只好耐着性子承认它们独立并等待良机。众所周知，这种良机终于在斯大林时期来到了。苏联的理论家在滥用列宁的学说方面从来没有象在民族问题上那么来劲。列宁认为是策略性的东西，他们却奉为原则；列宁认为是战略性的东西，他们则避而不谈，或者故意掩饰，以免小民族对灾难性的前景感到胆战心惊。

灾难性的前景是什么？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质可谓昭然若揭：在列宁看来，苏联应当通过同化，通过大民族并吞小民族，用大民族语言代替各民族的本族语言来逐步贯彻民族融合的方针。这便是使苏联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仅遭到小民族的抵制，也遭到俄罗斯民族的反对，因为它们想使俄罗斯民族变成丧失俄罗斯历史特点和文化特点的某种混血民族。这也是使俄罗斯人非俄罗斯化的方针。

列宁按照共产主义的学说把这种同化过程称作最伟大的过程。当有人向他指出他的同化理论在俄国这种多民族国家里是不近人情的，他却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反对同化的仅仅是那些想使历史车轮倒转的犹太反动市侩。”（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6页）他坚决反对联邦国家。在他1917年以前所写的各种文章里他都断然“拒绝”与社会主义相违背的联邦制。他说：“即使不同的民族组成了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鼓吹联邦制原则，也不会鼓吹分权制度。”他还写道：“不难看出，为什么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联邦制和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为联邦制辩护；对于这个问题，根本不用谈。”（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40页和218页）

列宁在断然拒绝未来共产主义国家实施联邦制原则之后过了

3年,1917年10月25日至26日,列宁隆重宣布成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为什么?列宁为何改变初衷?列宁之所以自食其言,是为了事业的利益。他执政后看到,要建立和维护新的苏维埃帝国,除了采用联邦形式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列宁心里明白,他建立的国家,形式上是联邦制,内容上却是专制集权制。在这方面,专制集权的布尔什维克党便是很好的保障,因为苏维埃国家将由这个党来管理。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结构,列宁不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从来不承认联邦制的领导原则。但是,列宁对苏维埃国家联邦制的外部形式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

1922年,斯大林趁列宁身体有病,让中央通过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在自治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计划。列宁坚决反对这样做。当列宁得知,这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的共产党也反对斯大林的计划时,他认识到斯大林和中央在民族问题上的举动具有分裂苏维埃帝国的危险性。列宁便建议用新的联邦制计划,即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计划来代替斯大林的“自治”计划。斯大林却坚信俄罗斯联邦并吞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是必要的,他刚愎自用,给病中的列宁写信,指责列宁是“比独立的卫护士更狂热”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但是,列宁作为灵活的策略家,他心里自有一本账。他于1922年10月8日写给政治局的一张便条说:“对于大国沙文主义,我宣布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应当绝对坚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轮流在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担任主席。绝对!”(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214页)

由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头目轮流“担任主席”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36年斯大林宪法出来为止。斯大林改变了这种做法,任命

加里宁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常务主席。勃列日涅夫比他走得更远，他自己却担任了这一职务。

今天的“苏维埃联邦制”表明，列宁向“大国沙文主义”宣布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失败了，而且是“绝对地”失败了。请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俄罗斯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俄罗斯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俄罗斯人；  
莫斯科的各部部长——俄罗斯人；  
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人；  
全部苏共中央书记——都是俄罗斯人。

当然，由俄罗斯人来管理俄国，这是完全正常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假惺惺地谈论什么“联邦制”呢？人们心里明白，伪善是丑恶对美德的报复。

### （五）苏联式的公民权利与自由

不管看上去多么奇怪，有一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美国总统卡特的无形意志在操纵着苏联新宪法的作者。要不是他的争取苏联公民权的战略，要不是他对萨哈罗夫院士作了勇敢的回答，要不是白宫示威性地接待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顶多只是照抄斯大林宪法中一些公民权和自由的条款而已（就象新宪法的其他部分那样），搞得不好，干脆就一字不提。但是，克里姆林宫决心要让卡特和整个世界震动一下：斯大林在宪法里给苏联公民规定了“十条权利和自由”，而勃列日涅夫却翻了一番——现在有整整20条！目的是让全世界看一看，卡

特完全是无的放矢。但是，评价某个国家的人权和自由与其说是根据宪法，倒不如说是根据贯彻宪法的行动。问题不在于苏联宪法用一些附带说明使这些“权利与自由”化为乌有。（如第39条说：“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损害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苏联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的自由……”）须知，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运动恰恰是在苏联宪法的基础上，并在“遵守宪法”的口号下发生的。民主运动同目前的人权运动一样，都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要求遵守苏联宪法。这一运动不仅不违背根本法，而且毫不违背根本法的附带条件，这就是说，这种运动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在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那么它的结局又如何呢？

结果，这一运动的多数参加者被关进了监狱、集中营、疯人院或被驱逐出境。问题在于：（1）宪法里有没有规定由政府及其行政侦缉部门从物质上和法律上保障苏联人享受宪法权利与自由呢？（2）宪法里有没有指定最高立宪法院来规定苏联政府的宪法行动和最高苏维埃的立法行动呢？没有，新宪法没有，旧宪法里也从来没有过。

西方在人管人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了最人道的贡献。西方宪法的出发点是，权利高于国家；苏联的宪法却相反：国家高于权利。因此，西方宪法是“国家为人而设”，苏联宪法却是“人为国家而存在”。西方宪法规定，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设立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最高法院，以监督政府和议会遵守宪法与宪法的权利。但是，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国家便是一切，个人是一钱不值的”）却使苏维埃国家变成同西方法制国家相反的法西斯国家。

林肯有句名言：“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的事情人民

办。”墨索里尼却在他的《法西斯理论》一书里首次提出他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这就是：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离了国家，人的精神生活便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讲，国家是极权的……离了国家，个人和集团都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要改造的不是人的生活方式，而是生活内容，要改造人，改造人的性格与信仰。”（见《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4卷）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理论同布尔什维克理论有何区别？不要忘记，列宁和墨索里尼都是他们本国社会党的左派，他们曾参加过同一个共产国际，又几乎同时离开，去为各自的极权主义思想而奋斗。当然，列宁比墨索里尼走得更远。墨索里尼是在宗教势力盛行的天主教国家里活动，当时，这个国家还挂着君主制招牌，保护私有财产并保留着文化阶层。而列宁是从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彻底消灭了旧俄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其极权程度而言超过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用列宁和新宪法的话说，它是个“新型国家”。“新”就新在党成了一个国家的代名词。因此，这个“新型国家”的政权不是扎根于人民和人民选出的代表（即“民主”），而是依赖于少数人和“一党专政”。

党是由占总人口6%的人（或由大约9%的成年人）组成的，但是它有立法权，管理权和全国社会产品的分配权。党不仅操纵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管理着人的思维、兴趣、感情与想象力。对这个党来说，国家宪法并不是法律，而是使自己的专政合法化的形式和体现自己意志的宣传工具。

#### （六）违反宪法精神的“成熟社会主义”

管理不善和营私舞弊一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到了



今天，这已不仅是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了。列宁早在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还不会进行管理”。他认为这些情况会使“理想”的制度及其推行者蜕化变质。没过多久，斯大林就使自己导师的这句预言应验了。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变成了“斯拉夫型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整个经济变成了城乡军事警察农奴制。这个制度的基础是以1935年（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和1940年（工人、工程师、职员固定生产岗位、迟到早退给予刑事处罚）的两个“劳动法”为后盾的普遍强制劳动。在反对“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的重要法律之外，又增加了关于“怠工”、“破坏行为”和“经济反革命”等新法规。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强制劳动的最高形式——数百万在押犯的奴役劳动。斯大林曾对列宁说，共产党人是善于经营管理的，但是那是奴隶主的经营管理。斯大林死后，这种奴隶制曾一度遇到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奴役劳动中摆脱出来，斯大林的强制劳动法也不起作用了。后来赫鲁晓夫想通过各种反“寄生虫”的法令来恢复其名誉，未能取得斯大林法所具有的那种效果。依靠强制劳动而取得效果的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土崩瓦解了。赫鲁晓夫自以为找到了解体的原因：开始进行没完没了的改组，将权力分散后又加以集中。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更加加深了这种总危机。赫鲁晓夫被撵下了台，但是未能消除危机的起因：强制性的经济管理。因此，一个又一个新的努力，如“柯西金的改革”和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政策”等，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玩意儿。

现在的新宪法里有一章叫做《经济制度》（第2章的第9条到第18条），宪法的作者想通过这一章产生奇迹。但是，其中有一条本来是可以妙手回春的，后来却删掉了。这是第17条：“根据法

律，允许在手工业、农业和生活服务行业内部存在个体劳动，以及以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劳动。”宪法这一条仅是使如下一个现实情况合法化而已，这就是：集体农庄庄员少得可怜的宅旁园地养活城市数百万人口；数千名“工余劳动者”挽救了国营单位无力完成的任务，保证了数百万户住房的日常维修；制鞋工和缝纫工的地下“家庭小组”保证了人们在穿鞋穿衣方面需要流行式样的问题。因此，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在苏联形成了，这种阶级可以称之为“自由劳动者阶级”，以便同国家劳动者相区别。如果新宪法的作者让这个阶级合法化，从经济角度看，固然是明智的；然而从政治角度看，却又是极其冒险的。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制度，所以斯大林取缔了它。如果让“自由劳动者阶级”合法化，就可能成为所谓“成熟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百出的证明，从而产生取消这种制度的危险。《经济制度》这一章的其他部分都旨在使现行的“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合法化，从而听任国家计委的专横武断，让政府部门官僚主义猖獗，使人民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

列宁在1921年举行的俄共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俄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命运归根结底将决定于经营管理工作的结果。如果共产主义的俄国能用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的管理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那么我们便真正地在国际上取得了胜利。”苏联成立60年的历史，对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回答：共产主义恰恰在经营管理方面彻底地破产了。

苏联的共产主义毫不留情地吞噬了革命的前辈及其后代，丧失了它青春的活力，向全世界表明这种经济模式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因此，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变成纸老虎，就连西方昔日的拥

护者——西欧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也只好与它分道扬镳了。但是，这些情况并未触动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他们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行我素。他们事后给自己授予战争英雄和苏联元帅的称号，给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收罗最好的外国汽车，用人民的血汗在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修建别墅，从特殊配售店里免费购买高级洋货和国产品，让自己的孩子面无愧色地“接父辈的班”。共和国、州和区一级的头头也照此办理，学会了莫斯科“领导同志”的作风和生活方式。下层的官僚尽管条件没有这么优越，但是也有他们自己的诀窍：“窍门人人有，全靠自己找！”因此，营私舞弊和收买行贿之风盛行，这在别的制度下是罕见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人民怎么办呢？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也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抢劫赃物！”、“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风气盛行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的国度里，勤勤恳恳的劳动变成了最卑贱的营生。迟到、缺勤、“跳厂”、“消极怠工”、“虚报产量”、“弄虚作假”成了普遍现象。伴随而来的是，老老少少普遍酗酒。国家有意把伏特加酒变成“人民的鸦片。”醒酒所的数量比幼儿园还增加得快。冷酷、粗暴、说下流话成了所谓苏联生活方式的“道德规范”。这便是流氓斗殴、劫持行凶的共同土壤。其规模之大，以致苏联政府不敢公布全国刑事案的统计数字。

在一个扫除了文官的国家里，一些专家（约2,500万）和学者（约100万）若不按中央委员会那些无能之辈和克格勃强盗们那样思考问题，便等于犯了严重的国事罪。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也看到另一种现象。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正在把国家和制度推到了灾难的边缘。他们不是采取断然的改革措施而是使国家背离宪法精神。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

的，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实行任何改革都必然以丧失垄断权而告终。他们宁愿断送国家的前途，也不愿交出政权。

政权能使人名声显赫、生活优越、身价百倍，因此，也是他们孜孜以求、有求必应的上帝。但是，由于党警专制主义者过于沉迷于政权的诱惑而不顾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需要，其覆灭便指日可待了。

## 六、克里姆林宫的教条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

政权同生理学的规律一样：胃口越吃越大。勃列日涅夫在权力稳定之后，便逐步把权力从扩大的无人负责的政治局转移到它的两个下属机构——中央书记处和总书记秘书处。当苏维埃制度建立60周年和总书记上任13周年之时，勃列日涅夫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已稳稳地掌握了多数，并把自己的事务性办公室变成了“内务办公室”。这些情况是在国内国际矛盾重重的条件下形成的，由于这些矛盾，克里姆林宫面临着一些十分头痛的问题：是缩小还是扩大“缓和”，是签署还是拒绝赫尔辛基协议，是疏远还是利用欧洲共产主义？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到这个制度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实体。一方面，这归根到底要涉及到这个国家在西方贷款和技术工艺等基础上实行经济复苏的前途，另一方面，如果在国际国内（如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运动的态度上）放宽政策并承认有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存在，又可能使这个制度丧失意识形态的方向，法国总统本来早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欧洲共产党

现在也是这样宣传的。

有人以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铁板一块，他们当真以为，坐镇克里姆林宫的不是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而是象最高苏维埃那样，是些表决机器。西方常常用纯粹西方的社会概念来衡量苏联的权力结构，因而说克里姆林宫里也有“鸽派”和“鹰派”。其实这种情况过去不曾有过，现在当然也不存在。但是，克里姆林宫里确实存在着国家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只要国内外的政治发展不涉及关键问题，这两者尚可和睦相处，平安无事。他们一致认为：无需再为“斯大林个人迷信”操心了（“因为大家都受到斯大林的实惠”），相反，应当给赫鲁晓夫戴上“唯意志论”的帽子（“因为大家都受他之害”）；不应当煽动原子战争，但是却应当把军队武装起来以对付局部战争；要大肆鼓吹裁军，而自己却要全副武装，以便使苏联的导弹核武器在陆海空以及在各大洲保持优势。

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苏联的物力不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的忍耐也已达最大限度（现在究竟不是斯大林时代了）。所以，他们不得不从追求利润的西方资本家那里寻求军队所需的经费来源（列宁说过：“光是战胜资产阶级还不够，应当迫使它们为我们工作……”）。简言之，应当借西方资本家之手来建设苏联的军事工业。

当然，克里姆林宫也知道，万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西方政府是否会取消技术和工艺禁运，私人银行是否会提供贷款，这都取决于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西方在一系列争议问题上所提出的要求——从裁军一直到赫尔辛基会议精神。归根结底涉及到打开“铁幕”的问题，哪怕能做到南斯拉夫那样也行，尽管南斯拉夫丝毫也没有放弃过共产党专政。

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正是党内领导集团中实践上的实用主义者（基里连科和乌斯季诺夫）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的分水岭。从事态的发展以及党内斗争的逻辑来看，领导集团内部这两种人——实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目前正处于彼此对立状态。本来，在高级领导层中，这两种思想倾向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存在。但是，这两者的斗争刚刚在实际政策上有所表现，教条主义者就取胜了，赫鲁晓夫本人成了斗争的牺牲品。然而，现在要谈的已不是这两种倾向的冲突，而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给教条主义者助威的是僵死的马列主义，而给实用主义者撑腰的则是国家的实际利益。

实用主义者是一批寡廉鲜耻的人，对他们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某种绝对真理，而只是掩盖他们所作所为的遮羞布。他们的优点是，不作理论的奴隶；他们自己不懂理论，既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全集》。他们的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不超过中学常识课本，而且随着“总路线”的变化而变化。当实用主义者刚刚学着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时候，还勉强能服从于理论教条主义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给他们设下的种种“禁令”（例如对柯西金的“改革”），但是目前的情况已有所变化。实践表明，苏斯洛夫之流所奉行的使苏联闭关锁国的教条主义政策阻碍了科技革命的发展，他们对一切改革所持的否定态度使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苏联成了唯一不出口工业品、而出口原料和半成品的工业国（只有一点例外，它出口武器）。

我们现在看到，实用主义者对现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但是，既然党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实用主义者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来清除那些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占垄断

地位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换句话说，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对抗意识形态权威的力量（如，斯大林在1947年提拔苏斯洛夫来对付日丹诺夫；赫鲁晓夫在1961年提拔伊利切夫来对付苏斯洛夫）。目前，苏斯洛夫是最高的、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权威。据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有人建议他当中央第一书记，但是他断然拒绝。他不喜欢大哄大喻，虚有其名。他是专搞幕后活动的。他是党的意识形态祭司。30年来，他是全国一切精神产品的总监察官。例如，过去他经常检查饶舌的赫鲁晓夫的即席演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他仍起这种作用。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再没有比突然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异端邪说”的帽子更可怕的事了。（当初，苏斯洛夫曾抓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关于“社会主义基础”的“异端邪说”大作文章，使莫洛托夫受到中央的批评；还有一次，乌布利希说苏斯洛夫在一次中央决议里把一条反列宁主义的语录说成了列宁自己的话，为此苏斯洛夫……把中央宣传部长斯捷帕科夫撤掉了。）所以，在理论上碌碌无为的领导人（大都是以前的工程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得不请求苏斯洛夫进行检查。但是，从党的意识形态导师苏斯洛夫本人来说，他既无出众的才华，又无渊博的知识。他对马克思主义也只有死读书的本领。对他来说只要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出发说出什么能作，什么不能作就已经足够了。仅这一点，他成了中央委员会里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当中央四次更换最高领导，全部撤掉中央书记时，只有苏斯洛夫一人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他没有个人生活，“一切有人性的东西都与他无关”。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与别的领导人，包括同斯大林在一起喝过酒。他根据需要才出国，从不让自己的子女随同前往。（苏斯洛夫曾对阿利卢耶娃说过：“我们的孩子自己不想出国。”）在那个早已资产阶级化了的党内，他是

唯一的禁欲主义者。他也是在党内扼杀创造思想的刽子手。他把自己这种思想狭隘、不求甚解和无创造性的作风立为一切理论家务必遵守的党法党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乏味之极。

在苏联，每年有几百本书，每月有几千本“研究性”杂志，每天有上万篇报刊文章，连篇累牍地阐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然而你却找不到任何一点新的思想和任何一个有见地的结论。本来有许多文章的作者是很有才干的，但是为了讨好苏斯洛夫，谁也不敢在破除党八股方面开创记录。否则就不能名利双收。因此，除非苏斯洛夫下台，才会开创一个全国精神解放的新时代。也只有苏斯洛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才能成为真正的总书记。现在似乎已在为苏斯洛夫下台作准备。请看，勃列日涅夫已开始建立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意识形态部门。例如，勃列日涅夫让佳热利尼科夫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让齐米亚宁担任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抗衡苏斯洛夫），让鲁萨科夫担任负责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中央书记（代替卡图谢夫）；几年前由基里连科负责西方共产党的工作以抗衡波诺马廖夫，契尔年科担任负责理论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以抗衡苏斯洛夫分子卡皮托诺夫；让阿法纳西耶夫担任《真理报》总编辑。

勃列日涅夫的第二个步骤是非正式地取消了苏斯洛夫党内总理论家的垄断地位。勃列日涅夫的上述意识形态助手们宣扬总书记是党内主要的和唯一的理论家，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而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部门则对这些新神话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勃列日涅夫派因此对苏斯洛夫公开进行报复。例如，在苏斯洛夫75岁寿辰那天，他不仅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第三次授勋——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而且没有得到国家的最高勋章——列宁勋章



（授予他的仅为二级勋章）。不仅如此，5年前（在他70岁那天）以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名义给他发的贺词，现在又作了明显的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字字句句都是在党的礼仪盘上仔细衡量过的）。以前的贺词是这样开始的：苏斯洛夫“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在党和国务活动的各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见1972年11月21日的《真理报》）在75岁的贺词中，这种重要的提法都删掉了。这并非由于中央新的记录员健忘，而是出于新仇旧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嫌怨报复啊！勃列日涅夫的新记录员早就把致苏斯洛夫贺词里删掉的东西加到致基里连科的贺词里去了。（见1976年9月8日的《真理报》）

总起来说，在基里连科70岁寿辰时曾经发生过某种事件，表明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部门曾想悄悄地把这个日子混过去。原定在1976年9月8日授予基里连科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而不举行什么会议。然而，奇怪的是，过了5周之后，人们已经忘了基里连科的生日，勃列日涅夫却于10月14日以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为基里连科召开了授勋和祝寿大会。（应当指出的是，当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任州委第一书记时，基里连科是这个州委会秘书处成员。）

这个祝寿活动泄露了天机：基里连科把自己的生日变成了给勃列日涅夫誉以新的“党和各族人民领袖”的“加冕”典礼。斯大林死后，“领袖”一词变成了禁区。似乎它已从党的词典里永远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表示“集体领导”精神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现在，基里连科第一次破了戒。他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不仅是总书记，而且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新领袖！他还说：“列昂尼德·伊里奇通情达理，诚恳热情，睿智贤明，对列宁主义无限忠诚，党和人民都热爱你。你的整个生

活道路、你的聪明才智使你能够具备只有当代伟大人物、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才具备的那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贵品质。”（见1976年10月15日的《真理报》）

“勃列日涅夫是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这句新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完全一样，本来应该成为国家理论与实践的规范。但是没有得逞。不知内情的人会对此感到不解。显然，苏斯洛夫派进行了抵制。因此，1976年12月18日，在勃列日涅夫70寿辰前夕，在以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名义致勃列日涅夫的贺信中，使人出乎意料的是，根本没有基里连科的那种提法（“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贺信只是说，他是“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和“党的卓越活动家”。甚至连在他的时代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归功于他（勃列日涅夫），而泛泛地归之于党。勃列日涅夫只是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思想是这么提出来的：“在党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你个人的贡献是巨大的。”

其实，我们从党史中得知，所谓“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是领袖一人（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专利权。那么，按党的宣传来说，为什么其功劳超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总和的勃列日涅夫会没有这种专利权呢？一年之后，苏联科学院对这封贺信中没有讲清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科学院授予勃列日涅夫一枚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表彰其“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科学地研究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迫切问题，以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世界历史性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见1977年11月17日的《真理报》）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德罗夫在给勃列日涅夫颁发奖章时指出，勃列日涅夫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所作的理论贡献不仅是卓越的，而且是“独到”的。

早已获得这种奖章的苏斯洛夫，作为党内唯一的理论家，未必是主张给勃列日涅夫授奖的倡议者。授奖仪式上的情况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代表中央参加这次仪式的全是总书记个人的亲信：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契尔年科、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因而，《真理报》以几乎整整第一版的篇幅刊登了为党内独一无二的理论家勃列日涅夫举行“加冕”大会的情况（并附有勃列日涅夫坐在中间的一张大型照片），但是苏斯洛夫却“故意缺席”，虽然按理他是应当出场的（监督苏联科学院和一切人文学术机关，是苏斯洛夫的职责）。缺席的还有波诺马廖夫，他被认为是负责国际共产主义问题的仅次于苏斯洛夫的第二位理论家。

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争吵的根本问题是今后如何对待赫尔辛基会议的精神和对欧洲共产党持什么立场？教条主义者的立场是清楚的，他们始终认为：赫尔辛基会议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错误，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大发明。相反，实用主义者则认为赫尔辛基会议是获得西方物资和工艺知识为共产主义服务的唯一可能的途径。特别是，苏联科学院新院长、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亚历山德罗夫引用列宁的语录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被征服的资本主义本身是不会让你吃饱肚子的。要把资本主义留下的全部文化拿过来，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把它的全部科学、全部知识和艺术都拿过来。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见1977年第16期《共产党人》杂志刊登的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

在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上，实用主义者遵循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给西方共产党人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表明，如果列宁在世的话，他自己就是第一个欧洲共产

主义者。这里仅举其中的两句话：（1）“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式、保持缄默，隐瞒真相”。（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25卷第119页）（2）“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象贝林格的那种“历史性妥协”！——作者注）、机动、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生100周年的报告里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战术的真正的百科全书”。（见1970年出版的《列宁主义方针》第2卷第560页）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口头上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怕公式，但是并不否认共产主义思想这个主要的精髓。它们遵照列宁的意见，为了更准确地达到夺取政权和建立党的专政这个战略目的，表现得更加机动灵活、狡猾和善于退让。列宁在完成十月革命的时候，并没有立即表示要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和建立“党的专政”，直到他在台上坐稳了之后才宣布了这两点。此外，列宁还认为可能“通过和平途径”来夺取政权。他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从1917年4月到7月之间），本打算不通过起义而通过在苏维埃里争取“议会”多数来夺取政权。直到不能如愿以偿之后，他才发动了起义。所以，同莫斯科教条主义的斯大林分子相比，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则是更加彻底的列宁主义者。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本人在经过了某些动摇之后也理解了这一真理。请看他最近的一次谈话：“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敌人。它正在改变策略和手段，它企图通过局部改革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削弱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共产党正在改进革命斗争的战略策

略。它们力争团结一切民主力量来反对垄断统治。在这方面，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论点，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立论都已十分完善和毫无争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毕竟是探索。重要的是使这种探索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见同年第16期的《共产党人》杂志第15页）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同苏斯洛夫派的激烈反对态度迥然不同，而是有条件地承认了欧洲共产党的新的战略战术。在十月革命60周年大庆之后不久，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召开了由各国共产党第二流代表参加的所谓国际科学理论会议。苏斯洛夫在开幕词中说，历史“证实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必将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思想”。（见1977年11月11日的《真理报》）波诺马廖夫在报告里也重复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确信，生活将证实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的必不可少的特点是正确的。”何谓“根本性的必不可少的特点”呢，波诺马廖夫作了反复说明：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见1971年3月18日《真理报》刊登的他的《关于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报告）当然，不论是意大利人，还是法国人，甚至西班牙人，都未能在这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得到发言的机会。

可见，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同勃列日涅夫不同，他们没有看到欧洲共产党人提出什么“有意思的论点”，也不存在任何“探索”。列宁已经“探索到了”一切：历史已经完全证实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和不可侵犯的。在刊登勃列日涅夫60周年大庆报告的那一期《共产党人》上，意大利共产党主席路易吉·隆哥呼吁欧洲共产党人借列宁的话来对付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他说：“历史经验迫使我们懂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么崎岖不平，困难重重……弗·伊·列宁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

说：“所有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走的道路不会完全相同……有人“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把这方面的前景描写得单调一色，再没有比这一点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隆哥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的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十分珍贵的……它是一种方向，但是很难把它作为唯一可行的模式。”（见1977年的《共产党人》第16期第103—104页）

勃列日涅夫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谅解口吻以及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对它毫不妥协的抨击，这种分歧如果仅仅涉及到当前政策中的部分问题，那么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的策略手段。但是，这里谈的不仅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战术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战术的根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是不会捉迷藏的。克里姆林宫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好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日薄西山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整个政治领导集团的总的危机。毫无疑问，争夺中央总书记宝座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是在勃列日涅夫本人的领导下开始的。在1978年的11月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建议通过两项与解决他的政治遗产直接有关的决议。一项决议涉及到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所谓整个“意识形态战线”的现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意识形态战线”的矛头瞄准着它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全会上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表的讲话，形式上虽然比较和缓，内容上却很有分量。提出如此广泛问题的主谋者显然是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主任契尔年科，他早就想把勃列日涅夫树为党的唯一的理论家，如果不把苏斯洛夫搞掉，起码也得否定他作为党内意识形态导师的身份。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也说明了基层来信“杜撰者”的幕后活动，人们认为其作者就是契尔年科。

（在1966年的23大上，勃列日涅夫引用契尔年科组织的“共产党

员来信”建议将“中央主席团”重新改名为“中央政治局”。)

且听勃列日涅夫的说法：“不久前，政治局研究了几封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群众来信……许多来信强调：这项工作也象其他问题一样，需要进一步提高，任务日益复杂，现在的水平已经不够了。意识形态工作上的缺点和落后状态可能造成后患。我同意这种提法。”（见1978年11月28日的《真理报》）随后，勃列日涅夫不仅严厉批评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而且严厉批评了它在新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效果，他说：“我们有一支庞大高明的宣传队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队伍的效率不高。在涉及到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已经成熟的问题时，缺乏原则性的重大举动。报刊材料、电视和广播节目都缺乏说服力，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结论，而是一般的泛泛之谈，既没有见解，也没有激情……”勃列日涅夫还批评国际问题上的宣传情况：“对国际问题的报道应该提高时效，要有具体事实，国际评论要针对大家关心的所谓热门事件……不要拾人牙慧，而要深刻地、有论据地分析那些国际事实，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意识形态和新闻报道中千篇一律的苏斯洛夫八股进行批评有什么来头？勃列日涅夫的回答没有能说服头脑清醒的观察者。勃列日涅夫说：“现在，苏联人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他们关心各种问题，因此，对群众性宣传机构提出更高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

勃列日涅夫向全会报告说，政治局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各种迹象表明，该委员会是为取消苏斯洛夫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垄断权而采取的一项组织措施。

勃列日涅夫建议中央全会通过的另一个决定则直接涉及到他

的“皇嗣”问题了。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使所有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西方算命先生威信扫地，因为他们在未来继承人问题上的种种猜测都落空了。勃列日涅夫建议把自己“内务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契尔年科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根据官方次序排列，他在政治局的官谱上占第五位，实质上已仅次于勃列日涅夫而名列第二。按勃列日涅夫的意愿，他的继承人应是契尔年科，后者在短短时间内打破了党史上的升官记录，在不到三年时间内，他由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秘书变为中央书记，随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又成了政治局委员并继续兼任勃列日涅夫的秘书。他之所以能够步步高升，除了靠勃列日涅夫提拔外，也有他本人的某些因素在内，如组织才能、足智多谋、用权有术，再加上党内所说的“理论修养”。就前几项才干而言，他弥补了自己上司的不足，在党的理论方面，他超过了苏斯洛夫（凡是把苏斯洛夫的刻板著作同契尔年科论党的建设问题的创作才能作过比较的人都有此同感）。

但是，上面所说的并不意味着关于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契尔年科有朝一日将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完全不是这样。契尔年科爬上权力之巅的最后这段道路还是非常险峻的，因而也是危机四伏的。对此勃列日涅夫本人要负一定的责任。勃列日涅夫破格地、出人意料地把自己的部下提拔到仅次于自己的地位，从而挑起了契尔年科的那些没有受到提拔的竞争者——以及克里姆林宫宝座的合法追求者——的倾轧与明争暗斗，他们不仅反对契尔年科，而且也迁怒于勃列日涅夫本人。我认为，马祖罗夫便是这种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党的上层人物可以饶恕自己的领导人的各种缺点，如傲慢无理、残酷镇压等等，但是绝不能容忍他在干部制度上胡作非为。



## 第二章 对外政策

### 一、克里姆林宫扩张政策的新阶段

苏联的扩张政策在赫鲁晓夫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同上层政权结构向斯大林主义方面变化有关，也同苏联军国主义分子在幕后对克里姆林宫的总政策一个劲儿地施加影响有关。这一合乎逻辑的结果，不仅是由于恢复了作为“伟大统帅”的斯大林的名誉，而且是由于根据列宁关于国际事务中的政治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学说修正了第20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提出了老目标和新任务。我们力求分析这些问题，虽然谈不上是全面分析，也不敢说我们的结论是无懈可击的。

—

当我们分析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即整个意识形态是以僵化的教条为基础的，而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的整个政治战略却是相当有弹性的。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以这种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行动基础的教条主义的党。它的意识形态信仰有

何等的反科学和毫不妥协，它的政治战略也就有何等的实用主义和灵活多变。的确，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基本的，而它的宗旨则是功利主义的：它必须为实践服务。列宁是对的，当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为布尔什维克服务，应为其夺取政权的政治学说提出论据。因此，列宁和他的继承者关于党和革命的全部理论贯穿着一种指导思想：政权的利益高于理论的纯洁性。因此，政权是个恒数，而意识形态则是政权的附属物。进行全面统治的欲望是不可遏止的，用弗雷德的术语说，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性欲”。既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是不惜代价、无论如何要在俄国夺取政权，并把自己的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而政权则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列宁就不得不象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来对待马克思，把马克思从头到脚颠倒过来。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被新的唯心主义——即具有无限“权欲”的人的理性可以决定物质本身——所取代，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革命规律，则被“主观因素”（党）——它能够而且应该超越历史阶段地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所取代。列宁认为，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向和命运不是由客观存在的物质所决定，而是由主观意志来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唯意志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在革命的问题上从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的修正，同时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遮羞布来加以掩饰。

为了同马克思主义保持表面上的继承关系，列宁撰写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的阶段的理论，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但是，同马克思讲的反相，是从东到西地发展。因此提出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学说，以使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冲破和消灭帝国主义整个桎梏的基地。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夺取政权最初的日子里就说，苏维埃俄国的历史

使命是按着苏维埃俄国的样子建立一个“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150页）

苏联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没有暴力的，使人类过着和谐的社会生活的虔诚信仰，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已经丧失殆尽，这种信仰在他们以后也一直不曾有过。因此，即使不发生任何内讧，只要利益所需，布尔什维克也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其意识形态袈裟的纯洁性。在苏维埃专政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危机，当时只好拿制度的命运来押宝，并且只好在意识形态上向帝国主义投降才能挽救局面。列宁毫不动摇地走了这条路（布列斯特和约）。后来又出现了可以用来扩大自己统治范围的富有诱惑力的国际形势，斯大林以意识形态上的投降为代价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当赫鲁晓夫感到由于热核武器在军事技术上产生的变革，需要不仅在军事战略上，而且在政治战略上进行修改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干的。因此，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列宁主义。为了维护政权并扩大其对共产主义国家范围以外的统治，而又不冒自我毁灭的原子战争的危险，赫鲁晓夫牺牲了列宁主义的某些至今仍被认为是神圣的部分。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政治战略主张及其工具——苏联的外交，只要利益所需，就允许发生极其不可思议的变化。但是，他们决不会忽略最主要的东西——政权。

西方（特别是美国）直到最近才完成了修改世界政治战略的过程——从“抑制”和“对抗”直到目前同苏联共产主义“合作”，而苏联却始终只有一个总路线：对抗。当然，苏联的对抗象战前一样要通过各种形式和不同的阶段（迫不得已的妥协、暂时的退却、“喘息”的时期），但是，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积

聚新的力量，重新部署旧的势力，以便展开新的攻势。甚至防御性的共产主义也都是侵略性的。“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正如热的冰或者干的水一样，是一种互不相容的概念。问题不在于几经更迭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性格或非理性的思维，而在于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规范：按列宁的说法，这种规范的历史使命是全球性的，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暴力。

列宁认为，暴力不仅是每个孕育着革命的旧社会分娩时的“助产婆”（马克思语），暴力还是组织革命的唯一、最后的手段。因此，列宁不仅深信苏联同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永恒的意识形态对抗是一种规律，而且深信归根结蒂要在军事上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这方面，列宁有许多论述，不仿引用其中几段。1915年，列宁在一篇《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中，对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一著名原理提出根据。他又说，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并非是目的本身，而是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联邦的手段。他写道：“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的联合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消灭为止。”（《列宁全集》第3版，第18卷，第232页）

但是，由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但是，列宁深信，“在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掀起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同上，第3版，第18卷，第233页）

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事。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列宁就宣布了这样一些规律：第一，共产党俄国和西方之间的长

期临时协定是不可能的（当时还没有“共处”这个时兴的词），第二，把在全世界传播和确立共产主义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绝对任务。请看他的话：“国际帝国主义……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发动国际革命，必须从我国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同上，第3版，第22卷，第17页）

苏维埃俄国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呢？在1920年11月莫斯科党的书记会议上，列宁作了回答：“一旦我们有力量打倒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会抓住它的脖子。”（同上，第3版，第25卷，第500页）

列宁直到去世之前仍然忠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1）在帝国主义时期，战争是注定不可避免的；（2）战争是革命的根源；（3）苏联的历史使命是组织世界革命。因此，列宁的政治战略并不限于苏联准备新的战争，而且要在别国之间煽动战争。列宁教导自己的追随者：“应该想办法使他们（即外国人——作者注）互相打起来，因为鹬蚌相争，渔翁总会得到好处的”。简言之：“共产党的实际政治任务是利用这种仇视，使它们互相争吵”。（同上，第3版，第25卷，第500—502页）

因此，列宁的战略绝不允许苏维埃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缔结裁军条约，因为，一方面，如果俄国裁军，就失去了给予其它国家的革命以军事援助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裁军国家之间的战争作为革命的根源，将由于裁军而不再发生。因此，列宁在1919年的党纲中特地加进一点，其中说：“和平主义口号、国际裁军的口号，不仅是反动的乌托邦，而且是直接欺骗劳动人民”。（1954年《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412页）

当有人向列宁指出“战争是革命之本”这一理论在政治上站不住脚的时候，他以恩格斯为例说：“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同，恩格斯理解得十分深刻，任何战争，哪怕是在先进社会里的战争，都不仅是造成破坏、野蛮、痛苦和群众的灾难”，“他说：将来，要么是工人阶级胜利，要么是为取得这一胜利而创造可能的和必要的条件”。（联共〔布〕七大，速记报告，1962年版，第140页）

列宁在对其他国家讲话时，特别坚决地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策略典范对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列宁全集》第3版，第23卷，第386页）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对各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和并非遥远的未来。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的基础”。（《列宁全集》第3版，第25卷，第171—172页）

## 二

列宁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直到赫鲁晓夫在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之前，一直是意识形态的信条和行动纲领。北京把赫鲁晓夫的这一贡献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最恶劣的“修正”。但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本着一个极其清醒的动机：热核武器的出现象一道威严的命令，迫使修改列宁关于战争是革命之本的学说。新的热核战争不再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其结果将不是世界革命，而是世界灾难。哪怕是一场触犯核大国利益的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也会变成一场大

战。因此，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说，“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战争不是革命的根源（第22次代表大会），“和平共处”是必要的抉择。由此也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夺取政权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形式（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不仅可以通过起义，而且可以通过取得议会的多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其他国家不是必然的等等）等许多主张得出了结论。

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走上了修改20大的“修正主义”道路，同时也不放弃他们在世界上制造心理气氛所捞到的好处。苏共集体领导修改20大的决议并不是立即进行的，远非甘心情愿的，想必也不是一致的。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的将军们。随着共产主义阵营（依靠苏联军队的直接军事援助，或者苏联政府的军事援助而出现的）离心力的增长，苏联军事集团对党的领导施加压力，以便在某个附庸国表现出不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苏联霸权主义）或者站到不同于苏联的“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情况下，使军队武装干涉的权利合法化。

将军们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是充分充分的。1956年秋天匈牙利的反苏革命；同年发生的虽未成功，但却具有威胁性的波兰“10月事件”；北京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公开破裂（表面上的理由就是那次20大的“修正主义”）；共产党朝鲜和越南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冲突中持“中立”态度（尽管苏联给予的物质和军事技术援助比中国占优势）；阿尔巴尼亚倒向中国；罗马尼亚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古巴强调对苏联的完全独立，虽然其生存正是依赖于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政治上的优惠；南斯拉夫没有回到苏联集团，尽管苏联方面正式承认其社会主义形式的合法性和斯大林在同铁托冲突中的不公平；最后，杜布切克在捷克斯

洛伐克搞的政变（他选择“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事情表明，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让其他一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除了列宁的道路、苏联的道路之外）合法化，是克里姆林宫“结盟”战略的极为惨重的失算。

诚然，这一方针本来是打算建立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一致，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苏联领导在亚洲失去了自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威望，苏联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基础明显地动摇了。对于这种危险的迹象，苏联军事领导比政治领导察觉得更早。斯大林曾经教导这些军事领导不要用教条主义的废话，而要用军事战略的物质范畴来思考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使苏联将军们忍无可忍了。在他们的直接压力之下，政治局（经过一定的动摇和试图同杜布切克妥协无效之后）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宣布：任何东欧国家脱离苏联集团的行动都自然会遭到苏联的武装干涉。克里姆林官的这一声明已成了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进行“兄弟援助”的行话。这一声明在西方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尽管其中没有任何勃列日涅夫独特的东西。军事集团和政治局仅仅是在其权力范围内恢复了被20大轻率修改的列宁关于所有国家必须走苏联道路的学说而已。但是，对和平事业来说，最主要和最危险的并不是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不管从中得出的结论对东欧各国人民来说是多么的不近情理），而是连无所不知的“克里姆林官通”都出人意外地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克里姆林官为列宁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学说以及战争是革命之本的学说恢复了名誉。即使在原子时代，不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战争，即有限的局部战争是可能发生的。

在第22次代表大会上（1961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完全同意当时克里姆林官的政治战略，抛弃了“有限战



争”的概念,其根据是,“在现代条件下,任何武装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全面的导弹核战争”。现在,苏联的军政领导人不这样想了。诚然,以索科洛夫斯基为首的苏联军事理论家,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不同意所谓任何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全面战争这样一种官方的观点。他们只是说,“如果在有限战争中动用战术核武器,才有这样的危险性”。(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军事战略》)但是,他们接着又说,美国“有限战争”的概念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主义考虑”。然而,在1968年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中这段话统统被删掉了。如果苏联本身不受惩罚地(在没有发动世界战争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地、交火或不交火地参加了一系列“有限战争”或武装冲突(第二次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侵占匈牙利;苏中边界武装冲突;间接地参加在越南和近东的战争),那么,这算不算“冒险主义”呢?

至于西方,格列奇科元帅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就发动了30多次“小的”战争,在地球上许多地区进行了数百次武装行动,这些行动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核战争。(《真理报》1971年2月23日)这里的寓意是清楚的——“帝国主义者”竟然干了列宁嘱咐我们干的事。这就修改了22大关于“任何武装冲突都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全面的导弹核战争”的决议。这样一来,赫鲁晓夫领导当初如此坚决反对的美国军事思想家关于“有限战争”的理论,已经被现今的苏联军事和政治领导认为是合法的了。由于命运的戏弄,美国的军事学家(泰勒、基辛格、布罗基)竟然为列宁关于战争(哪怕是动用战术核武器的有限战争,而不是发动起世界性的核战争)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学说恢复名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三

为了说明苏联政治战略新阶段的目的和任务，这些事实具有特出的意义。十分明显，不搞清楚苏联的军事战略和学说，要分析苏联的政治战略是不可能的。现在越来越清楚，苏联政治战略的方向、速度、重点和地理学是受苏联军事战略的利益支配的。在苏联共产党专政的历史上，最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从今以后军事战略不再由政治家（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一样）制订，而是由将军们研究制订。关于这一点，我们有第一手材料加以证明。苏联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斯基尔多教授在1970年由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作为教科书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军事领导及其机关的极其重要的职能是制订和实现战争的战略计划，善于领导武装力量和全体人民的活动，利用一切可能来达到战略的政治目的。”（斯基尔多的《人民、军队、统帅》一书，1970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作者只在理论上承认，指挥权应属于政治领导，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不相容地使政治领导与战略领导相对立起来：“政治领导应给战略领导指出，应该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使用武装力量，才能达到预期的军事政治目的。同时在现代条件下，上层军事领导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同上）。

这完全是新事物。这是新时代潮流产生的结果。早在战前，当时的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要求在军事学院开设战略课，并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这样一种说法：战略问题是属于当时尚未成为“大元帅”的斯大林的权限之内。

现在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军事战略不仅是上层军事领导

的权限，而且它还有各种机会从昔日的附属物变成苏联政治战略的统帅。

苏联的将军们几乎是套用普思卡尔的著名公式：世界政治战略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不能委托给政治局的“政治副手”来搞。苏联上层军事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们在他们的各种著作中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军国主义方针辩护，其理由是：美国企图对苏联发动核战争。军事领导提出一个理论，据说苏联受到进攻的威胁是与共产主义在苏联的成功直接有关（即共产主义取得的成就越大，敌人的进攻就越猛烈）。为使这一理论更有分量，格列奇科元帅把列宁搬出来：“伊里奇高瞻远瞩地强调指出：我们取得的胜利越大，资本主义剥削者越要联合起来进行更坚决的进攻。”（《真理报》1971年2月23日）同样，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越大，国内敌人的反攻就越猖狂。这个理论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苏联陷入了人们称之为“叶若夫主义”空前的灾难。

格列奇科从自己的国际问题理论中得出什么结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克里姆林宫的结论可能是这样的：苏联政治战略必须以苏联武装力量对美国占优势这一原则为依据。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话，那就是“苏联武装力量占优势的原则”。勃列日涅夫本人提出这个主义是相当谨慎的，他说，“不论从哪个方面企图保障其对苏联的军事优势，我们必将以增加军事威力给予回答。”（《真理报》1971年2月23日）但是，前面谈到的苏联军事理论家对此表达得更为清楚。他写道，“当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一个国家在战争过程中能够动用的经济潜力，而是双方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就拥有的能够投入斗争的那些力量和手段的对比。”（斯基尔多，第97页）“主要的、起

决定作用的是哪一方能够使自己的力量压倒对方的力量。”（同上，第99页）作者补充说，政治领导必须“考虑到自己和对方的力量对比，并使其向有利于自己方面变化”。（同上，第113页）

“保证对敌人的军事技术优势”。（同上，第126页）格列奇科元帅在25大上已经正式宣布了“苏联的实力优势论”，他说：“苏联能够以优势的力量回击实力”。（《真理报》1971年4月3日）

假如这是苏联的军事理论，那么，它的结论就是：苏联军事战略是以优势原则为基础的。

这种军事—政治战略的利益和任务要求修改20大的意识形态方针和策略观点。他们先从“共处”这个声名狼藉的提法开始。我们记得，20大决议中提到了“共处”的问题，尔后，勃列日涅夫在23大（1966年）上对这个提法作了解释。20大决议中说：“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苏共20大速记报告，1961年，第2卷，第413页）这个公式现在在苏联报刊上已经销声匿迹。它已经被默认为是反列宁主义的（不无北京的影响）。今后的“总路线”不是“共处”，而是在国家和本大陆范围内以及在各大陆之间为共产主义利益而斗争。“共处”一词从苏联将军们的辞汇中消失，而搬到葛罗米柯主管的部门去了。同时这个词在外交部也已经作了新的、勃列日涅夫式的解释。总书记的解释是：“苏联认为国家之间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苏共23大材料，勃列日涅夫报告，第29页，1966年）

苏共20大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结论由于苏联国防部那本书中用鲜明的军事语言所说的那种原因而不能成立了。“共产党人过去支持，今后仍将支持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战斗、民族解放

战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起义……各国人民在反对国内和国际反动派……的斗争中，一贯得到苏联的支持”。（斯基尔多语，第27页）

克里姆林宫运用手中之权，不仅恢复了20大所修改的列宁关于战争是革命之本的学说，而且恢复了列宁关于进行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的全部理论。如果说20大曾决定可以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可以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也可以通过议会取得政权，把大多数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西方几个有影响的（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甚至说到保护议会和以多党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苏联的现领导则已经全盘否定了这些论点。在这些问题上回到了列宁主义原来的立场。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100周年时作的报告中说：“历史的经验（指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作者注）越来越明确地证实了列宁这样一种思想：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特点只能是指那些非主要的东西，至于象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一党统治之类的‘特点’，列宁认为对大家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真理报》1970年4月22日）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报告（1971年3月17日）中重申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一声明：“列宁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在我们的时代仍保持其生命力和现实性”，这就是：（1）“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必要的”；（2）“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国家”；（3）“事实一再证明列宁的思想，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不会自愿退出舞台，放弃政权”。（《真理报》1971年3月18日）因而，共产党人通过议会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政治局坚信，世界正处于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的前夜。克里

姆林官认为，世界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1）世界革命条件业已成熟，客观前提在西方国家也已形成；（2）苏联将给世界革命以最大限度的援助。

关于第一点，被人们称作国际共产主义问题主要专家的波诺马廖夫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中心早已形成……，在非社会主义地区的许多国家，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年深月久，乃至几十年来所积累的熔岩，足以冲破资本主义统治的地壳”，他又警告说，“一切都取决于是否善于利用现有条件。”（《真理报》1971年3月18日）关于第二点，我们也有同样重要的权威性声明。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受政治局的委托所作关于列宁的报告时说：“我们党过去和将来都一贯忠于列宁的遗训，做到‘最大限度地在—国实现，以便在各国发展、支持和发动革命’”。（《真理报》1969年4月23日）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也重申了这一点：“是的，列宁生在俄国，但他一向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和因素。”（《真理报》1970年4月22日）波诺马廖夫好象在给两个同事的讲话进行注释，他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国际条件现在更加有利，因为国际无产阶级现在拥有象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这样强大的力量。”（《真理报》1971年3月18日）

因而，苏联政治战略的新阶段的特点，是全面修改20大决议，回到列宁的革命扩张的理论上来，确认今天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并强调苏联准备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来支持世界革命。

我们现在正处在世界政治的这样一个时期，即两个超级大国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公开地表现出来——美国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

已有所收敛，而苏联则竭力扩大它在世界各地的势力范围；美国建议“以合作代替冲突”，而苏联则鼓吹“正义战争”，以及在西方的后方和第三世界举行起义；美国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实力优势”转到“力量均势”，从“集中回击”（后来是“灵活反应”）转到现在的拥有“足够的热核威力”来进行“实际恫吓”，而苏联则坚持“实力优势”的方针。

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美国不想扮演“世界宪兵”的角色，但是，政治自然界是不会容忍真空状态存在的——美国从哪儿退出，苏联和中国就从哪儿进去。当然，它们不会到那些美国根本没有到过的地方去。因为，共产党的战略是全球性的。

#### 四

现在，克里姆林宫既不象斯大林晚年那样固执己见，也不象赫鲁晓夫那样搞些心血来潮的冒险行动，它不是虚张声势地夸耀自己的威力，而是要用两面手法——在宣传和公开外交中，它宣扬世界和平，而在世界革命政策和秘密外交方面，它在自由世界的后方搞秘密活动网，在其防御同盟的阵营里搞倾轧。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不搞赌博，而是稳扎稳打地干，它不是同时反对所有的敌人，而是各个击破，反对敌人甲的时候，就同敌人乙结盟；反对敌人乙的时候，又同敌人丙结盟。这是列宁的策略要求之一。靠着这种策略，斯大林在国内反对各种党内反对派，在国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干得非常漂亮，取得了成功。克里姆林宫的精心构想是：它要联合所有国家，也要孤立每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这一构想，它也有一个根据充分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列宁的两个思想：关于“薄弱环节”和

关于“特殊环节”的思想。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是由一系列国家环节组成的一根统一的链条。任何革命都不可能立即打碎整个链条，因此，首先应该打开“薄弱环节”，以便后来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地把整个链条打碎。“特殊环节”的思想是在取得政权后出现的，这种思想在于“要善于在每个特殊的时刻找到特殊的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控制整个链条，然后再可靠地转到下一个环节”。（《列宁全集》，第36卷，第205页）克里姆林宫不仅把“薄弱环节”和“特殊环节”的思想用于革命，而且用来分化自己潜在敌人的同盟。

列举两个典型事例说明之。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克里姆林宫认为法国是个“薄弱环节”——它不仅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反美的法国共产党，而且由于法国人保守的民族主义根深蒂固和戴高乐将军的一意孤行。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把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这位将军的虚荣心鼓动起来了。他说，法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但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它应该不作美国的附庸国。诚然，法国没有退出大西洋军事联盟，以讨好莫斯科，但是，在政治上重要的不是动机，而是后果。不过，法国只是一个“薄弱环节”而已，还不是那种抓住后就可以分化欧洲大西洋联盟整个链条的“特殊环节”。克里姆林宫眼里的“特殊环节”，从经济潜力、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和欧洲中心的战略地位来说，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政府的更迭（德国政策和东方政策的改变）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欧洲最大的盟友成了克里姆林宫最眼红的对象。如果这个德国能以法国为榜样，背弃大西洋军事联盟的话，就会打开闸门使共产主义洪水一直冲到英吉利海峡。克里姆林宫十分清楚，这样的前景在目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将来却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克里



姆林宫也非常了解，德国人现在不会为了使德国内部关系正常化（打通疆界，推倒界墙）和将来为两个德国恢复统一创造条件而付出这样的代价（除了失去自由）。这一切只有取决于莫斯科。

因此，在社会自由党执政的时期，波恩的东方政策改变了。这种变化不管在德国人当中引起什么样的争论，我们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是困难的：第一，我们不了解其“内部概念”（如果有这种概念的话），第二，不了解其“疆界”。这一改变对双方各有利弊（其弊端对德国来说，比苏联更甚），关键在于，谁最善于利用自己的所长来实现预定的任务。克里姆林宫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的对德政策正在一步步地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这个欧洲“特殊环节”最终脱离这个组织，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克里姆林宫的这一政策不是缺乏理性的，因为莫斯科的支付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许诺德国恢复统一。

与莫斯科的对德政策相联系的是它的全欧政策。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念念不忘召开关于“安全和合作”问题的全欧会议。培养“全欧共同体”的感情来与“大西洋共同体”的感情相抗衡，唤起人们的“全欧爱国主义”感情，莫斯科重新提出戴高乐的口号：争取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但它的目的却与戴高乐迥然不同，它想在欧美之间钉进一个楔子，造成一种欧洲安全取决于欧洲人民自己的虚假情绪，然后从后门把自己的私生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塞进欧洲人民的大家庭，防止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进一步经济政治一体化，甚至造成某种全欧“合并”的印象，以便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来使自己的欧洲霸主地位合法化。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克里姆林宫提出一个奇怪的口号：“不要分裂，欧洲要统一”。（《真理报》1971年3月23日，茹科夫的文章）

我所以把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口号称之为奇怪的口号，因为关于毫不妥协地把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理论和对自由欧洲拉上“铁幕”的做法，也都是属于克里姆林宫的货色。

苏联扩张主义的对象除了欧洲以外，还应该指出两个地区（苏联在那里也是采取异曲同工的办法，只是目的不同而已）——印度支那和近东。在这两个地方，扩张的主要方法是苏联提供武器，但是，苏联在印度支那的目的是不准中国扩张，并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影响；在近东的目的是十分深远的：这就是使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从军事上依赖苏联，进而变成在国家一政治上长期牢固地依赖苏联。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要在这些地区继续进行战争或者临战状态。所以，克里姆林宫宁可让美国人呆在越南，也不愿让北越在中国的帮助下取胜。对于近东也是如此。发动新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对苏联未必有利，而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它也不感兴趣。消灭以色列国对它未必有利（因为到那时苏联就没有理由在这里存在下去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不战不和”的局面更符合苏联政治战略的利益。克里姆林宫的战略还巧妙地、一帆风顺地利用其它因素——限制白宫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玩弄手腕。这里的悲剧在于，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没有识破它的锦囊妙计。东南部人气质的遗传特点是容易感情冲动和健忘，这使他们在同样威胁两个民族的险情面前，在苏联共产帝国主义面前变得目光短浅。只有当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时，它们才能成为以色列的致命的危险。克里姆林宫对此就是持这一方针。如果苏联得逞，那么，以色列—阿拉伯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在布尔什维克化了的近东将确立起苏联国内那样的“国际和平”。

裁军和限制导弹核武器问题在苏联政治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暂且把一整套复杂的技术问题，诸如各种类型的装备、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定义，以及美国在欧洲基地的意义等庞杂的问题放下不谈。最好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否有一把统一的钥匙来打开苏联在裁军和限制军备会议上的策略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因为存在着上述一系列互相掣肘的因素，苏联政治在圈子里兜不出来。从国内观点来说，有着坚决主张裁军和限制军备的因素，但从国际观点来看，也有同样坚决反对的因素。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处于两面夹攻的状态中——即一方面是农业生产不足的持续危机、工业利润低（其中由于用来加速和扩大科学技术革命的投资不足）和劳动生产率低，而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日益要求提高他们低得可怜的生活水平；还有最大限度的工作强度同最低的报酬；国家计划表上的丰富商品同百货商店门前排队越来越长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党的领导需要把军事工业的大量资金调拨给民用企业。因此，苏联似乎比美国更需要在限制费用奇昂的战略武器谈判之中取得成果。

然而在这方面，苏联碰到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对美国也同样存在，只是没有那么尖锐而已。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中国。如果说共产党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完全取决于苏联，那么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发生战争就取决于中国，就其前景来看，这一战争是十分可能发生的。但是，未来的中国是个拥有大量人力资源的、具有威胁性的导弹核大国。另一个问题是不肯让步的苏联将军及其“苏联武装力量优势”的理论。苏联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能兜出圈子，进行有效的谈判，这两个条件是：苏联军国主义者彻底“裁军”和吸收中国

参加裁军和限制军备的谈判。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两点都做不到。要监督苏联的军国主义者，苏联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和意志坚强的政治领导，这种领导现在找不到；吸引中国参加，则必须苏中和解，这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

要顺利举行裁军谈判和限制导弹核武器谈判，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时间因素。“苏联武装力量的优势”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这些谈判总要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之间没有尖锐分歧。对于这个任务，克里姆林宫解决得越早，签订协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五

苏联意识形态扩张的宣传家们不是在世界无产阶级中间，而是在世界资产阶级中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尽管苏联对外政策上的帝国主义侵略性和国内日益凶残的暴政经常有所表现，而西方自由党人仍然在幻想苏联的共产主义会趋向“自由化”、“变质”、“同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左派自由党人虽比较欣赏这种共产主义，但却宁愿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冷战”（现在勃列日涅夫把它改称谓“意识形态战”）时期的反共分子断然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信念。欧洲的超资产阶级带着他们的亿万巨款和新工艺争先恐后地闯进克里姆林宫，去帮助布尔什维克更有效地建设他们倒霉的共产主义（难怪列宁说，我们将利用资产阶级干的蠢事）。在西方的一些大学里，有数以百计的新的亲共分子在活动，他们是各种现代化“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到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假冒预言家，从而使一部分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大学生能够挖他们自己国家的墙角。

西方那些政治上的后生小辈为了获得一张毕业证书，也为了功名前途而去莫斯科朝圣，为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那里搞到个偏居末位而感激涕零。此外，联合国在特别决议中一致隆重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决议把这位契卡机关（史无前例的宗教裁判所）的发明人和斯大林的真正导师，宣布为“20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

目前，这种“苏联狂”还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东西。但是，如果西方国家领导人沉湎幻想，那么，危险就会变成现实。如果他们认真地想一下，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正是这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门徒，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如果他们再同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好多空文，以为今后就能把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隔开，那就将大祸临头了。

当然，要排除热核战争，只有共处才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签订维护和平的国际协定是必要的。关键在于，签订协定的各方怀着什么样的鬼胎。但我们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打算：“条约是积蓄力量的工具”。（《列宁全集》第3版，第22卷，第334页）

当我们谈论苏联扩张政策的策略和战略，以及实现这一政策的工具——苏联外交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苏联对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所持的独特态度，以及苏联对条约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作的独特解释。从苏联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出，在解释自己的权利时，布尔什维克是不厌其烦的；而在履行义务时，却又斤斤计较；在破坏或撕毁已经对它不利的条约时，它是一丝不苟的。当西德《明镜》周刊的记者向基督教民主党领袖之一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博士问道，据说布尔什维克将无条件地扩张到莱茵河，根据这种“虚构”来制定我们的政策，难道有好处吗？德雷格尔

博士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事实回答说：“这不是虚构。相反，这是社会主义对全世界的勃勃野心。我敢断定，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都是苏联撕毁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是希特勒撕毁的。”（《明镜》周刊，1971年，第8期，第41页）

在政治智能水平方面，当今的苏联领导并不比西方高明。但是，同西方领导比较，苏联领导有三个极其危险而且高度机动灵活的优越条件：（1）苏联领导固定不变；（2）苏联领导不用向任何人报告工作情况；（3）苏联领导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约束，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时发表了长篇批评性文章，这篇文章与其说它是纪念巴黎公社，不如说是批评克里姆林宫。中国意识形态学家指责苏联领导人背叛共产主义，继续奉行20大的修正主义方针。如果共产主义是象斯大林所实践的那样来理解，那么，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至于20大的“修正主义”，我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早已经重新修改了，他们在所有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又回到了正统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如果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是以同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争论下去了。（仅在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全民国家”这样的小问题上，克里姆林宫还坚持22大的术语；这是北京进行抨击的具有实际根据的唯一一点）

诚然，北京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分析中也有一些振振有词的论据。中共中央机关报写道：“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亿万劳动人民的监狱……。勃列日涅夫一伙不顾苏联劳动人民的死活，竭力煽动军国

主义和鼓吹军备竞赛，投入大量的卢布来生产越来越多的飞机、大炮、军舰、运载火箭和原子弹。这些新沙皇利用这些骇人听闻的机器在国内加紧压迫广大群众，在国外维持其殖民主义统治，控制其他国家。”（《北京评论》，1971年3月19日）

俗话说：同行相近，同类相识，北京共产党领导人比任何人都了解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全球霸权主义政策的实质、手段和意图。

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采取进攻姿态。勃列日涅夫在24大上阐明这种进攻就是“永不停息的意识形态战争”。

（《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苏联领导人在24大上特别满意地记录了这场“意识形态战争”在三个地区取得的成果：（1）在欧洲，由于缔结了苏德条约和波德条约，苏联政策赢得了全胜，迫使对方无条件接受苏联所要求的战后欧洲边界，而且建立了一种心理上的桥头堡，由此发动新的攻势，把美国挤出欧洲并在欧洲埋下意识形态地雷；（2）在“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在同民族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密切合作下，削弱了西方的地位，同时为共产主义胜利顺利地准备了基础（勃列日涅夫说：“今天在亚洲和非洲已经有不少国家采取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3）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莫斯科终于解决了压倒北京的霸权问题。波德戈尔内在24大开幕时说，所有这些成就是“有意义的和巨大的”。

在24大上共有来自91个国家的102个党（共产党、“民族民主党”和左派社会党）的代表团参加，这个创纪录的数字，就是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就的明显例证。列·勃列日涅夫把这些党称作是“现代三种基本革命力量伟大联盟的体现”。他补充说：“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为了取得这

一胜利，我们将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很奇怪：勃列日涅夫一方面郑重宣布，克里姆林宫将不遗余力地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同时又抱怨“帝国主义者”试图重新搬出“苏联威胁”的无稽之谈……（同上）

克里姆林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物质上和组织上公开支持反西方的战争和别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自己责无旁贷的权利。谁要否认这种权利，就被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冷战”的煽动者。

勃列日涅夫在24大所作的唯一耸人听闻的讲话，就是关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意识形态纠纷的原因。但是，用德国人的话说，勃列日涅夫“顺水推舟”。他说：“中国领导人要我们放弃第20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北京当然是提出了这种要求，这是无需怀疑的，然而，克里姆林宫在实际上和行动中已经履行了这种要求，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北京要求克里姆林宫（它已经用党的新决议恢复了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利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签署投降书。要知道，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当初曾在22大上逐条重复赫鲁晓夫在20大上对斯大林的各种指责，甚至还加上了新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在22大发表的记录稿上都有记载。此外，政治局的这些委员们（并非赫鲁晓夫，而是波德戈尔内）还建议把斯大林的尸体象“罪犯”一样搬出陵墓。因此，苏共中央或党代表大会如果决定正式修改20大和22大决议（关于列宁主义的“新发明”和斯大林的罪行），对于政治局来说无异于公开进行政治上的剖腹自杀。政治局委员们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走这条自我否定的路。



## 二、苏联帝国主义的发展

在西方大学的讲台上广泛传播着这样一种理论：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基础不是要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各大国共有的传统因素，即本国本族的利益。这种理论已经传播二十年了。由于这一理论的鼓吹者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制订“东方政策”的顾问，因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不正确的诊断必然开出不正确的处方，其结果是共产主义在地球各个角落节节胜利。

苏联的全球战略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中有些是经常性的，另一些则是不断变化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产生、发展和相互作用，既可了解克里姆林宫今天的国际政策的效果，也可弄清西方对克里姆林宫的姑息政策。

在确定苏联对外政策的因素中，有的是为实质性的，即政治思想因素、军事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些是不断变化的、暂时性的和派生的（如“和平”、“自决权”、“共处”、“缓和”，等等），这些可以称为从属性因素。还有一种民族因素，即本国的民族—国家利益。由于条件不同，这些因素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乍一看，这些因素似乎有些主次不分：那些主要的、实质性因素往往不引人注意，而从属的、不断变化的因素却被看成是主要因素。苏联的对外宣传、组织机构、以及实现苏联国家对外政策目的的工作风格、方式和方法，却一直是根据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被称为是变化着的因素。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历史地探讨这个过程和评价每种因素的意思

义，借此在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性因素中找出最重要的因素，在从属性因素中找出最典型的因素。

在苏联对外政策中，“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表现为苏联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形式。苏联帝国主义并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正统帝国主义的重演。它是超民族的，因而是革命的和活跃的。这种帝国主义，与其说是经济帝国主义，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所关注的不是原料、不是销售市场、不是廉价劳动力、不是资本输出场所（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关注的东西），而是那些从属于一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的人。正统的帝国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殖民地和它所掠夺的人民。苏联帝国主义却主要是追求这些目的，并认为其余一切问题均可随之解决。正因为如此，苏联帝国主义是新型帝国主义，更有弹性、更为活跃、归根结蒂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可见，这个帝国主义是超民族的，其目的是在殖民地人民中间组成新的统治阶级，在对其上层进行监督的情况下推行本国的政策。

许多人，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苏联帝国主义和苏联对外政策视为沙皇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有机的继续。另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侨居自由世界的俄国人则否认上述两种政策之间有任何联系。这两种观点都是感情用事的主观认识。如果把帝国主义俄国的对外政策同苏俄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那就意味着对沙皇对外政策活动的条件、规模、性质和目的估计过高，而对苏联共产帝国主义的上述目的、全球战略的规模和意识形态专政估计不足。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利益是领土战略性的，是占领欧亚，因而它是局部性的。苏联的利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是全球性的。共产党人一向把共产主义俄国当作实现其最终政治目的——

世界共产主义统治的物质、军事和人的基地。

苏联今天的对外政策，是遵循列宁的思想。列宁依据政治思想这个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制订了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列宁毫不动摇地使俄国的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党的意识形态原则：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我们面前摆着两条基本路线：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高于一切，而资产阶级的路线则认为大国地位和民族独立高于一切。”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68页）从列宁的这段话中，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因素对民族因素具有明显而绝对的优势，他宁愿牺牲民族原则和民族利益，假如需要以此为代价来加速世界革命的话。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这个因素，也就是列宁的苏联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因素。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其实质来说不是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政策，而是苏联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

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对外政策在方针、速度和形式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有时强调这些因素，有时强调另一些因素。

列宁预言，十月革命只不过是个开始，是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奏，这个预言没有实现，列宁在俄国立即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方针似乎也是失败的。国家不得不过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阶段。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起初是迂回进行的、在敌人后方进行侦察，后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同非苏维埃世界发展贸易关系。这一政策的近期目标是争取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达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列宁仍是一位空想家，他依然认为世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些停滞不前。外界在外交上承认苏维埃俄国是重要的，这可以使苏联在国外的非法机构合法化并减少共产国际工作上的困难。列

宁认为，世界革命的时代在下列意义上说已经来临了，即在西方可以组织起共产主义的队伍，进行他们自己的“十月革命”。总之，列宁仍然相信自己的关于发动革命的理论。托洛茨基也主张这条路线（“不断革命理论”）。可是斯大林不相信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公式的现实性。正如列宁不相信马克思的自发革命一样，斯大林也不相信列宁提出的由于出现了新的条件而可以发动有组织的革命的论点。

尽管斯大林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过，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其经济制度在社会关系中越来越进步。马克思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老理论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新理论都为生活所推翻，因而，根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治概念也被推翻了。现代西方国家逐渐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意志的超阶级的、全民的民主机构和社会的最高仲裁者。正是在德国，出现了“国内和平”时期，以代替声名狼藉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确，欧洲无产阶级本身不仅变成了自己革命口号的反对派，而且几乎完全走上了社会民主制的道路，使共产党只起到一个狭隘的和影响很小的政治派别的作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无产阶级甚至拥护资产阶级政党。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斯大林修改列宁关于在其他国家组织革命的理论，他提出自己的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制订了对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理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为斯大林的对内目的——工业化、集体化和建立庞大的恐怖机器——服务的。他相应地修改了苏联的外交。官方的外交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的外交（李维诺夫公式）。甚至连与苏联直接毗邻的小国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第三国际仍然在起作用，但是已经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是作为苏联

秘密警察在国外的间谍机构在起作用了。总之，“民族共产党人”斯大林既胜过了死去的列宁，也战胜了他活着的战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且在得到外国同情的情况下着手在一国建设“本国共产主义”。外国则希望通过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俄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以共产主义的形式）能战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危险的国际主义。况且，苏联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当它不超出本国范围时，对俄国人是有益的。但是，后来才发现，斯大林民族共产主义归根结蒂是要在别国组织共产主义革命，把当地的共产党人作为辅助力量。斯大林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存在的任务。革命胜利的国家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独立自存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手和工具。”（《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116页）

当俄国还是一个农民国家的时候，这个基地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来说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工业化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和军事战略基地作了准备，并成了组织共产主义制度的出发点，要建立这种制度，首先和主要依靠苏维埃国家巨大的军事—工业潜力，而不是依靠变化无常的当地共产党人的努力。因而，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纲领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对外政策观点来看，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奉行世界共产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必须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对国家重新装备。就在这个基础上，三十年代末修改了老的“共处”方针，在缔结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后，斯大林积极开展苏联对外政策活动。兼并了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同时，在苏联意识形态体系中宣布对“文化珍品重新评价”。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以及培养

“苏维埃爱国主义”，大赦俄国历史上的英雄和统帅们，为历史上旧俄的某些外交政策恢复名誉，例如，承认征服高加索和土库曼是进步事件。俄国的民族主义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性因素。

现在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目的何在。否认民族主义因素对共产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是违反科学和历史真实的。每一个共产党政府都根据它所在的独特的民族环境，根据其主要群众，根据领土、传统、历史和该国人民的民族特点来制订和实施自己的对外政策。一个政府，它不能长时期不受惩罚地忽视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概念。尽管共产党人利用这个被他们征服的民族来达到它的长远的、甚至与该民族切身利益相反的目的。这样的事情仍然常常发生，共产党的主张不过是这个民族大国政策的遮羞布或工具而已。这样一来，民族主义有时成了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实质性因素。不过，必须说明，在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列宁选择了前者，铁托选择了后者，斯大林和毛泽东则二者兼而有之。苏联对外政策的历史，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就是这两个因素在确定苏联对外政策方针方面孰先孰后的历史。

既然，按斯大林的考虑，如上所述，苏联应成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而苏联人则是这一革命的主要体现者，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概念就不单单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而且是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在实现对外政策意图时需要唤起什么感情，是俄国人的民族感情或民族主义感情，还是苏联人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觉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找到了一个对共产主义来说十分奇怪的，而对其本身的目的来说却是极为有效的答案：要的是爱国主义！

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这种“爱国主义革命”，在对外政策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的反应，在对内政策上则是斯大林对俄国民族精神的投降，为的是利用俄国民族意识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因此，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从未使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哲学（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从未提到过他们的名字），这是合乎情理的。不但如此，他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和大赦了教会。苏联政府在战争期间的民族宣传也是按照那条路线，在各加盟共和国号召各族人民成为其伟大祖先和民族英雄（乌克兰的波格丹·赫麦利尼茨基、哈萨克的沙米尔、中亚的伊马诺夫等等）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斯大林在这方面态度鲜明地论证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他在谈到日本投降时说：“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人民中留下了沉痛的记忆。它是我国历史上的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日本一定失败，污点必将消除。我们老一辈人等了40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2年，第40页）当然，斯大林没有谈到他的党及其奠基人列宁在俄日战争中是“失败主义者”，他们力求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仗。对待那次战争，布尔什维克依然是从政治思想因素出发，从夺取政权和实现其政治学说的观点出发，为此，甚至不惜以民族惨败为代价。正是由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破产，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不得不把赌注压在俄国的民族因素上。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挽救俄国的不是苏联共产主义，而是觉醒了的俄国民族主义，当然，也有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政治战略上的致命错误。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把民族因素看成是一种孤立的东西，而应看作与共产主义的总的战略目的——建立世界统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一战略要求在民族问题上机动灵

活，所以，共产党人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感情上要的把戏，只不过是一种武器、方法和为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目的而利用这种民族因素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亲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们不得不把民族因素作为主导因素提到首位，或者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对付希特勒那样，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对付斯大林那样，或者现在北京对付莫斯科那样。铁托和哥穆尔卡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在共产党国家内讧中把宝押在民族主义身上是小国统治者的一种策略手段，目的是要赢得本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反对大国统治者，换句话说，这是“民族共产主义”对付“大国共产主义”的一种自卫方式，而不是笼统地反对共产主义。因而，在共产主义制度发生政治危机或军事危机的情况下，民族因素（无论在苏联的政策中还是在其卫星国的政策中）具有实质性因素的形式，而在其他场合，则是从属性因素。

“为和平而斗争”、“共处方针”、“不干涉”原则、“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等等，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均为从属因素或派生因素。对这些问题的详尽研究不属于我们的任务。苏联对外政策史本身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一政策的实质性因素，不是决定其利益和方针的原则，而是从属的和派生的、不断变化的和机动灵活的因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如果苏联对外政策所遵循的确实是承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及他们国家的主权的话，那么，在东欧和中欧就不会存在“人民民主”制度，而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就根本不会有被共产主义征服的民族了。这同样也包括“缓和”、“和平”和“裁军”等方针在内。因为共产主义不能马上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共产党人今天仍然死抱着列宁关于“薄弱环节”



的著名理论不放，并且认定会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因为，根据这个理论，从内部瓦解和控制自由国家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共产主义体系准备以“共处”作为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竞赛的形式。克里姆林宫的“共处”，并不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精神上的接触，甚至也不是双方在民族政治和社会政治观点之间达成协议，相反，而是采取一系列手段对敌人进行意识形态战争。克里姆林宫不止一次地声明，“共处”的口号意味着没有“热战”，但却继续进行反对民主的意识形态战争。其实，这是“冷战”的继续，布尔什维克将“冷战”改名为“意识形态战争”。

民族殖民地问题，或者说关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问题，关于他们的自决权问题，也是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从属的、派生的因素。在提出和解决民族问题时，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贯的出发点是：为了顺利实现世界革命的总计划，可以并且必须利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允许他们获得广泛的自由直至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总问题的一个派生的、从属的部分。因此，共产主义支持的只是那样一种民族运动：第一，它能削弱、消耗西方的力量；第二，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共产党人的监督和领导。

对外界的恐惧因素和“干涉狂”也影响到苏联对外政策方针。有人以为只要消除苏联领导人产生这种恐惧的理由，对克里姆林宫作出重大让步，并证明西方热爱和平，克里姆林宫就会摆脱假想的恐惧而在地球上建立持久和平，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第一、苏联恐惧因素的根源和本质；第二、同共产主义制度讲和平的一切条件都是绝对不可靠的。一般地说，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和平的，在某种程度上的长期休战

则是可能的。共产主义把这种休战看作是间歇，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解放战争”新阶段道路上的喘息之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对于其全球扩张阴谋有可能被提前揭穿这一点，十分自然地怀有一种恐惧之感。

由此可见，苏联的恐惧因素，与其说是考虑到历史经验或潜在敌人的意图，不如说是出于共产主义战略侵略实质的内在因素。共产党人尽管在策略上赌咒发誓，但是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长期共处和本质上的共处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决心要消灭自由世界。恐惧因素就是苏维埃政权担心它的侵略对象可能会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防止苏联的侵略。就这一点来说，这种因素是下意识的产物：它起因于共产主义内部，而不是外部。但是，这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和策略作用。这个国家为备战花费巨额军费的理由是：必须回击“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对苏联策划的侵略战争。人民生活的低标准也被解释为由于必须拨出这笔开支。

所有这些都属于克里姆林宫对外界的恐惧因素，但是，共产党人对本国人民也怀有恐惧因素。为了各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和真正的和平，他们之间经常进行相互了解是必要的，在精神、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进行合作也是必要的。克里姆林宫对这种合作，对各国人民精神上的交往怕得要死，它害怕失去“恐惧因素”（这会妨碍它进行仇视他国人民的教育），害怕败露自己对外政策的意图，最终是害怕危险的民主自由思想从外部传染给本国人民。因此，才有了“铁幕”。实际上，苏联至今仍不放弃领导世界共产主义的野心，不肯拆除隔绝双方的“铁幕”，关于有监督的裁军、禁止热核武器、通过增加现有的国际条约来保障和平平等的议论，统统都是无稽之谈。要求苏联政府在欧洲安全和世界

安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作出新的让步，无异于邀请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新的侵略。

今天，我们正处于苏联对外政策史上翻开新篇章的时期。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政策，但是，也不能把它同战后斯大林—莫洛托夫的直接或间接侵略的方针相提并论。新领导奉行着与苏共20大、22大、24大、25大决议相联系的对外政策，当然并不排除原来列宁—斯大林的政策，但是，由于苏联的国内外条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由于原子战争能引起同归于尽的危险，不得不提出另外一些手段和方法：军事—经济扩张、意识形态侵略、契卡的渗透、外交的讹诈，以便把欧洲共同体从内部炸掉。

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政治思想不受“均等”、“力量平衡”等时髦理论中陈腐偏见的约束。它只知道一种理论和一种“绝对的无上命令”：在陆、海、空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因此，苏联的军事战略不是建立在防御，而是建立在进攻的基础上的。苏联军事战略这个公开的“秘密”还是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我国，长期来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一直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包围已不复存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社会体系：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苏共21大的报告，莫斯科，1959年，第97—98页）

21大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大大地加强了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作者注），并为它开辟了“新的前景”。勃列日涅夫在24大、25大上也谈起了这个“新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的国际经济计划就是以这个“新

的前景”为基础的。换言之，“新的前景”无非就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因素——即经济扩张的因素，它有三种形式：同卫星国的经济“互助协作”（就是使卫星国的经济为莫斯科的国际政策服务）；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是武器和“指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竞赛”，目的是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工艺和贷款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消灭这个资本主义本身的基地。

如果我们没有再单独地研究一个虽然没有名称，但是却相当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性因素和从属性因素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共产党人不喜欢对此进行宣扬，然而他们的敌人总是到事后才了解其成功的诀窍。这就是策略艺术。

问题不在于共产党人策略上的弹性。它不总是有弹性的，有时它也会把自己的制度引进死胡同（列宁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战后的苏联），当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打算而明显地违背自己的策略学说时往往就走进死胡同。共产主义策略的效能和弹性是根据其作用范围而定的。这种策略的多变不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智力过人，恰恰相反，是由于它的功利主义、目光短浅和没有道德。共产党策略的多变，是由于共产党人绝对否认任何道德标准——不管是宗教的，还是其他传统习惯的道德标准。纵然昨天还是神圣的原则，只要今天同制度的利益发生冲突，立即就弃之如粪土，而代之以其他有利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原则。根据这一准则，改变老的原则和采取新的原则同样是为权力服务的：要看老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妨碍权力的加强和扩大，新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权力的加强和扩大。列宁是这样干的，斯大林是这样干的，他们的继承人也是这样干的。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5大上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道德的全部含义，就是为共产主义

利益服务。”（《真理报》1976年2月25日）。共产主义领袖们总是用这个“道德辩证法”的规律来解释自己策略上任何不可思议的变化。当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时，甚至连辩证法本身也会变成彻头彻尾“辩证的”了。

在解释自己的学说时信口开河，在选择手段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制约，在保卫自己的目的时表现出来的狂热，为了达到它顽固不化的主要理想和政权可以牺牲任何其他理想（民族的、社会的和哲学的理想）——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学说的特点。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贯彻这一政策的工具——苏联外交以及苏联选派到国外去工作的外交干部（其中一半是编内人员，另一半是克格勃遴选的人员）都是由这种策略主张决定的。

苏联外交一向只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吸取其道德哲学思想，而手段、方式和方法则是自行研究制定的。这里，它没有鄙弃古典的和资产阶级外交学派（从塔列兰和梅特涅到俾斯麦和邱吉尔）的遗产。从这些学派接受了现实利益高于道德的实用哲学。当然，共产主义传教士在口头上是同塔列兰的外交犬儒主义或者同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哲学划清了界限的，实际上，他们从这些人的理论中吸取了全部教义，并纳入苏联策略和战略的广泛范畴。

人们通常认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共产主义的策略灵活性，使共产党人变成自己学说的俘虏，迫使他们为原则而蛮干，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拒绝机会主义的妥协，如果现实同教义发生矛盾的话，宁可牺牲现实利益，只要有利于形式，哪怕是有损于内容，也要保住自己的威信。如果对共产主义一般的策略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外交持这样的看法，那就大错特错了。随机应变、妥协政策、有

预谋的让步、善于利用敌人营垒里的矛盾、甚至从自己的敌人那里招募同盟者，列宁的这些遗训成为苏联外交最根本的基础。随机应变的艺术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一原则。列宁总是以赞许的态度援引克劳塞维兹的话：政策上的进攻是防御的最好形式。然而，他指示自己的学生：退却也是一种经常需要学习的特殊的专门艺术。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二个原则是要正确地选择进攻的时机，攻人之不备。马基雅弗利早就向统治者提出兵不厌诈的思想。列宁也坚持这种观点。他说：“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精锐的敌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的，而不是革命的。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58页）

在时机尚未成熟，正在积蓄力量和侦察敌方实力的时候，应当善于在敌人的后方、在敌人营垒里工作。列宁由此引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三个原则：“一定要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里，在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组织里进行合法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版，第25卷，第177页）如果不让共产党人进去，“就应当善于……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法，保持缄默，隐瞒真情……当然，在西欧，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特别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种工作是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并且还要系统地去进行。”（同上，第199页）

由这些一般的策略方针又引出共产主义对待国际条约和条约

义务方面的第四个原则。这就是，任何义务都是有条件的。有一本苏联外交手册以赞赏的口吻引用了马基雅弗利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贤明之君一经发现自己意见之危害，或作出许诺之原因业已消失，便立即收回成命。”（《外交辞典》第1卷，莫斯科出版，1948年，第588页）列宁—斯大林主义就是这样对待条约的意义和一般国际法的。

在谈到对国际法的态度和国际条约在布尔什维克眼里的价值时，列宁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的力量足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我们就马上掐住他们的脖子。”（《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360—361页）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学说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共处”的真意。由列宁起草并在党的第七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上通过的党的现行法律是，“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指出，中央委员会有权随时中断同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缔结的一切和平条约，有权向这些国家宣战。”（《苏共决议汇编》，第8版，第8卷，1970年，第27页）

结论是一清二楚的：苏联对外政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政策，而是苏联国内政策在国际上行使其意识形态职能。这种职能并非由国家的任务和利益决定，而是由统治者，即共产党及其政权来决定。党的利益同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发生外来侵略时才吻合起来。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分道扬镳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就是那些最有推动力的实质性因素，至于共产党学说的基础，则是加强政权和建立世界共产主义的统治。苏联对外政策就其本质而言不能是消极被动的、防守的和保守的政策。因为它的使命是履行世界革命和世界统治的总政策，所以它也是实现这种统治的有弹性的工具。可见，苏联的政策是一种进攻的武器，而他们的学说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甚至在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

或者退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们的任何退让只能看作是一种间歇，是新的进攻的喘息之机。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在内，可能会在某些阶段程度不同地影响到苏联的对外政策，但是，有两种因素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就是国内政权的利益和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取胜。这说明，他们不是为了某种和谐一致的抽象共产主义而斗争，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统治，即苏联共产主义的新的阶级制度而斗争，为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统一的世界共产主义管理体系而斗争。在实施苏联外交政策过程中尽管有种种曲折（从列宁到斯大林，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两种因素都是经常起作用并且起决定性作用的。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和无可争议的结论：苏联的“缓和”政策就是列宁的“喘息”政策，而所谓的“共处”不过是“积聚力量”以便最终解决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而已。

1918年同德国人媾和时，列宁说过，他拿空间做买卖是为了赢得时间，而在我们时代则相反，克里姆林宫拿时间做买卖是为了获得空间。何时结束喘息和怎样结束“共处”，将由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同共产党人进行媾和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此。全部国内经济计划，即所谓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如果只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是共产主义准备向自由世界发动新的进攻的计划，这次是全面开花，包括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科学技术等。（见《苏共纲领》——《苏共决议汇编》，第8卷，第196—306页，1972年版）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24大代表苏共庄严地重申：“今天，我们想再次向我们的战友——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保证：我们党将永远同你们在一个紧密的战斗行列里前进……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我们将为取得这一胜利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斗



争。”（《苏联共产党第24次代表大会材料汇编》，第22页，莫斯科，1971年版）

苏联外交政策之变化无穷、道德伦理标准对它毫无约束力、对待国际法抱着纯粹功利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随心所欲地解释自己义务的做法，所有这些，都使苏联政府成为国际条约中的危险对手。苏联政府把条约和协议中给予自己的权利看作是无条件的，而把应承担的义务视为有条件的。因此，自由世界的安全，不是建立在自己力量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同克里姆林宫的条约基础上，这种安全只有在苏维埃国家充分享受了自己的条约权利和与此相关的利益，只有在它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受惩罚地撕毁这些条约时才是有效的。

在上次战争爆发之前直到结束之后，苏联缔结了大约25个互不侵犯、友好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国际条约和协定。结果怎样呢？其中24个条约是苏联撕毁的，只有一个条约是它的对手（希特勒）撕毁的。

苏联之所以需要国际协定和条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它实际上已经取得的阵地（奥得—尼斯河分界线，把柏林和东欧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这些协定和条约来进行思想渗透，并把自己人派到意识形态敌人的后方去。

恰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以“独到的新手法”丰富了自己的国际实践，苏联所签订的国际协定，无论它自己还是它的对手都事先知道：苏联领导是决不会恪守的。最新的典型例子就是赫尔辛基会议。当然，从这里不能得出结论说同克里姆林宫缔约总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不在这里。在接受严重历史教训以后，最终必须明白，从雅尔塔到赫尔辛基，克里姆林宫不是普通的谈判的一方。它所尊重的只是超过它本身的那种力量。它推崇的是

能够运用自己优势的国务活动家。因此，只有在对方有能力确保双方都能恪守条约的情况下，同克里姆林宫签订条约和协定才是有意义的。

### 三、克里姆林宫的扩张和西方的顽症

当前，西方对克里姆林宫百般殷勤讨好，以实质性的让步来换取维护和平和遵守条约的空洞许诺，这种“绥靖”政策是在重蹈覆辙。人们对罗斯福总统在战争期间所犯的惨痛错误至今记忆犹新，他当年对斯大林妥协，希望“同斯大林面晤，以便说服他接受基督教的道路和民主原则”。嗣后，威廉·布利特（美国驻莫斯科首任大使）写道：总统以为，在克里姆林宫坐着的是一位绅士。其实，那里是“著名的高加索土匪头子柯巴”。这里要提醒一下，现在领导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是这位土匪头子的得意门生。但是，正如大家所知，任何一个侵略者，他总是本能地把“绥靖”政策当作对方软弱的表现，甚至以为是在直接邀请他继续扩张。过去的“轴心国”和占领别国领土的苏联（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日本占领中国，德国占领奥地利，德国和苏联占领波兰，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就是这样看待民主国家的无所作为。克里姆林宫也是这样理解西方今天在苏联扩张地区奉行的“绥靖”政策和无所作为的观望态度。现在，克里姆林宫坚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必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新的条件、新的对象和新式武器要求制定新的战略。热核武器和导弹的出现不仅在战争技术上，而且在苏联的“世界革命”概念上引起了变化。热核战争是自我毁灭的战争。这对苏联侵略者来说也是最起码的常识，因而他们在20大（1956年）修正了列宁的这样一个战略观

点，即所谓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大战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世界革命。苏联领导人在革命战略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修正”了列宁的论点，他们得出两点结论：①从斯大林的直接侵略转为“世界扩张”政策；②从通过世界大战来进行“世界革命”的政策转到全球革命战争和“世界革命进程”的政策。这两点结论可以转译成如下著名公式：“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是“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诚然，对列宁主义的这种“修正”，结果是成败参半：在苏联帝国的后院，反苏运动愈演愈烈（波兰、匈牙利），苏联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外国共产党开始鼓吹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本“民族的道路”。莫斯科立刻看出了危险的广度和深度，对匈牙利的反苏革命进行血腥镇压，以教训那些不懂得新战略的“远距离瞄准政策”的人，也就是要非共产党世界相信，它无需发射原子弹就可从内部征服它。当然，后来又对这一战略进行某些重大修改，悄悄地从中取消了关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多种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并宣布“苏联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卫星国的离心力。但是，这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是在西方组织“和平”改革，在发展中国家发动亲苏的“民族解放战争”，再加上苏联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和平”扩张（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军事上和间谍方面的扩张）。这些都是不可动摇的。新的战略是同赫鲁晓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战略的炮制者是克里姆林宫现今的意识形态导师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经验证明，赫鲁晓夫根本不适于担任苏斯洛夫在新战略方面让他担任的那个角色。关于柏林

问题的最后通牒、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冒险行动、破坏巴黎“四大国会晤”、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由于“U—2”飞机事件而对美国挥动拳头——所有这一切都招致外部世界对苏联的反感，使新的战略任务复杂化。况且当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同美国人《面对面》（关于赫鲁晓夫访美一书的书名）地讲述了新战略的秘密目的时，他在自己的同事中引起了愤慨。他说：“我们不用战争就能埋葬资本主义，今天的美国参议员的后代们必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这里，赫鲁晓夫破坏了列宁的圣训：把你明天要对敌人采取的行动预先透露给敌人，那就是罪犯。这些情况统统都在赫鲁晓夫被推翻的时候都告诉了他。说实在的，只有消除了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之后，才能更“科学”、更有系统，然后更有效地运用新的战略。

这个战略在苏共24大（1971年）上取了一个现代化的名字，叫“和平纲领”，其中“和平”一词不能理解为“没有战争”，而应理解为地球。苏联扩张政策新时期的全球纲领及其不变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产生的，那就是：在工业国家通过“和平”渗透和“意识形态”斗争，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和平”扩张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全世界确立苏联型的共产主义。

西方提出了什么样的自卫对策呢？西方的政策变化无常，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因为他们不理解这样一个极简单的事实：放弃斯大林的直接侵略政策或者赫鲁晓夫考虑不周的颠覆行动并不意味着放弃列宁主义的“历史使命”——把苏联建成一个统治世界的基地和据点。要知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因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受到指责，他们的错误是，在新条件下使用的方法不对头。除此之外，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无论在世界观还是在心理上都同样是一些侵略者。谁宽恕他们的挑衅性行

动，谁就是在怂恿他们采取灾难性的行动。要制止这种行动，只有明确而坚决地告诉他们：再进行挑衅就会遇到优势力量的抵抗。杜鲁门总统正是用这种政策才从斯大林手中拯救了朝鲜、伊朗的阿塞拜疆、土耳其、希腊、柏林乃至整个欧洲（“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联盟组织）。肯尼迪总统短暂的统治证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尊重的只是实力和在必要时使用实力的决心（如古巴导弹事件）。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整个战后时期，被鄙视地称谓“冷战”时期，然而，他们忘记了，恰恰是“冷战”使世界避免了“热战”，避免了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这种扩张在勃列日涅夫—尼克松的“缓和”时代得到顺利发展。苏联领导人公开声称：“缓和”的心理气候对于他们达到对外政策目的是最有利不过的。自然，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不会自动帮助他们的，但是，国内的悲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反应迟钝。因此，除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关系正常化这个重要的和理智的决定外，基辛格没有能完成他的任何一项创举。基辛格关于同潜在敌人建立“力量平衡”的构想（西方军事领导人把这个构想变成军事术语，就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建立“战略均衡”）忽略了一个“细节”：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领袖同“力量均衡”的保守哲学是格格不入的，而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则对明智的“战略均衡”的学说格格不入。他们只知道一个学说：力量优势。“力量优势”原则是苏联军事战略的核心。这一思想贯穿于克里姆林宫的整个政治战略。

基辛格关于苏联帝国后院的<sup>1</sup>政治构想究竟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很难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是主张正统外交的，他反对“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内部事务，至于苏美之间的磨擦，他想

通过秘密外交友好协商解决。而且，他把国家的实际利益置于各种道德范畴之上，这一套不仅是从马基雅弗利那里，而且是从塔列兰和梅特涅那里学来的。因此，他的“力量均衡”的构想至少在客观上，意味着不仅要保持西方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现状，而且要保持共产党国家内部的原状（例如，“索南费尔特主义”就是这样的，他认为要同苏联和解，保持东欧的“安宁”是有益的）。于是，对美国的政策开始“重新评价”。基辛格的同事（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认为这一“重新评价”的实质是：美国不想起“世界宪兵”作用，这一点被苏联看作是天赐良机。

先请读者谅解，这里我想援引自己的一个老论点。七年前，我在分析当时的局势时曾经写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政策的这样一个阶段：即两个超级大国已明显地显露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收缩自己的活动，而苏联却竭力扩大其在世界各个部分的存在，一方面，美国建议‘以合作代替对抗’，苏联却鼓吹在西方后院和在第三世界发动‘正义战争’和起义。”（《新杂志》第104期，第223—224页，1971年）今天，我们遇到的已不是这两种趋势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说明苏联全球扩张政策十分活跃，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事实说明西方患有可怕的顽症。苏维埃国家已经扎扎实实地准备进入这一政策的新时期（见前几章所述）。苏联在不同地区奉行扩张政策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是有区别的，这要取决于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甚至地理上的条件。在西欧，这些方法和手段多多少少是“和平的”，不过，那是在没有“反动集团抵抗”的条件下（见《苏共纲领》）；在第三世界，则几乎始终采用暴力的手段和方法。

克里姆林宫坚决要求召开赫尔辛基会议，也是为苏联扩张的

新时期进行政治准备的重要因素。这里追求三个明显的目的：

(1) 要国际上确认苏维埃国家已经在东欧占领的阵地；(2) 在西方同世界共产主义阴谋进行斗争时精神上解除武装；(3) 为莫斯科对西方后院进行思想渗透和人员渗透创造合法条件。布尔什维克为达到这些目的所施展的伎俩是令人惊异的，而西方在保卫自身利益方面所表现出的毫无原则性也是令人吃惊的。克里姆林宫肆无忌惮地一面无视赫尔辛基协议的义务，一面却享有这个协议的权利。当然，克里姆林宫在签署这个协议时，就没有想履行它。克里姆林宫只是想用这个协议来安抚西方，或是在政治上使西方中立化，以便在世界上寻找列宁所指的那种主要“环节”。

今天克里姆林宫首脑们把非洲和近东看作既是“薄弱”环节，同时又是“主要”环节。昨天这种“环节”是东南亚，明天则将是南美洲，同时，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欧洲共产党人正在埋葬西欧。前途是相当悲观的，但是在现今西欧患有顽症的情况下，这种前途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布尔什维克选择这次进攻的时间并非偶然。除了苏联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外，外部因素也是非常有利的。由于越南战争的失利，美国暂时放弃了世界政治的这个边远地区，而水门事件和美国人对外情报机构的猛烈抨击，使美国政府的行动大受约束。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国会的权力空前强大而政府的行动受到空前限制。当安哥拉的亲西方势力请求美国提供武器，而福特—基辛格政府打算同意时，国会却予以否决。在这同时，克里姆林宫却不仅给安哥拉运去了武器，还运去了古巴人，并且在非洲的中心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安哥拉只是它在非洲政策中的一个试验场，

它想在这里检验一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所欲为。完全出乎意料：战斗的民族主义安哥拉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一位美国政府的负责人反而声明说卡斯特罗干涉者是一种“稳定的因素”。这种成果鼓舞了克里姆林宫在非洲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侵略。“非洲之角”只是克里姆林宫使整个非洲苏维埃化的非洲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对卡斯特罗来说，这也是以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其他国家人民（首先当然是南美洲人民）以“兄弟援助”的一个试验场。克里姆林宫在这里将更慷慨地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

还应该指出苏联扩张政策中“军事—物质准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干部因素。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为了在葡萄牙前殖民地夺取政权，莫斯科在葡萄牙人离去前几年就培养了当地干部。在60年代初莫斯科建立卢蒙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时，苏联就开始为各大洲系统地、精心地培养这样的干部。“领导干部”——当然是苏联自己的干部，他们是在许多专业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学校是：“外交学院”、契卡学校、军事谍报学校、各种外语院校以及卢蒙巴大学。指导干部（领导干部中的指导者）当然是契卡人员，这些人员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斥西方和“第三世界”。克里姆林宫用在国际颠覆人员和间谍人员身上的资金比世界上所有的侦察费用的总和还多，我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因为苏联预算中用于克格勃的经费比用于军备的经费更加保密。第二项无限制的开支是用世界各种语言进行口头宣传、书面宣传和广播宣传，这在发展中国家搞得特别厉害。其宗旨是诬蔑西方的秩序、对前殖民地人民进行反西方教育、大肆宣扬“苏联的生活方式”。

自由世界拿什么来同这一切相对抗呢？它的政治战略是什么



呢？是否能制止苏联的扩张？头两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根据历史经验只能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回到杜鲁门时代”，美国应该重新领导自由世界，并提出新的“杜鲁门主义”，要明确警告：从现在起，克里姆林宫及其同谋者干涉他国人民和其他大陆的事务不能不受到惩罚。伦敦《每日快报》说得好，“我们指望恢复杜鲁门的品质……以便制止各种表现的苏联侵略。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就象人需要血液一样”。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同苏联帝国的人民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也对自己的统治者不断施加压力，防止其进一步在对外政策上冒险。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入广泛地发展“缓和”，不仅使苏联政府，而且使苏联人民也能享受缓和的实惠。卡特总统的卓有成效的、简单的想法是，把保卫“人权”作为美国政策的道德指导原则，并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在苏维埃制度的整个历史上，一个外国的元首第一次提出如此无懈可击的思想，直接击中了苏维埃专政的要害。因此，苏联的宣传发出疯狂叫嚣，它拒绝履行赫尔辛基协议，苏联政府还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声称，它不会再在任何一个提及“人权”的文件上签字。最起码的人权问题，对于一个其全部哲学基础是通过暴力使人类失去人性的政权来说，已成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 第三章 评勃列日涅夫的三篇回忆录

#### 《小地》

遗憾的是，在我们取得胜利之后，往往把人抬得比胜利还高。

布拉特·奥库贾娃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军事回忆录《小地》（《新世界》杂志，1978年，第2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它是传记性的、军事史的、政治性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文艺性的文献作品，它记述许多公务上的情况。然而，如果作者描写的只是苏联普通战士的事迹，那么他那种旧事重提和叙述当事者心理的“艺术手法”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取的，但是作者显然只是宣扬自己的业绩。问题不在于勃列日涅夫过于主观（对于这类作品来说是很自然的），而在于他违背了回忆录的基本规律，用主观性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因此，当勃列日涅夫生动描写玛丽娅·佩坚科这位姑娘的英雄形象，叙述萨拉金·瓦利乌林英勇牺牲的情景，或是描绘年轻的中尉在医院死去的场景时，还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当他写到，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党中央曾想把他从前线召回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以及上级指挥部想给他提职晋升的时候，他两次都拒绝了，坚决要求留在第一线，这就不可信了。这暴露了他的虚情假意，而且从他后来那股钻营投机的劲儿来看，读者了解到，谦虚并不是他性格中的重要特点。

在回忆录的开始部分，勃列日涅夫谈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意义时，第一次透露了克里姆林宫缔结这个条约的真实

动机。苏联的历史学家迄今为止都异口同声地说：苏联不希望战争，签订上述条约只是为了赢得时间，推迟德国发动战争。后来，我们从勃列日涅夫的话中知道，签订条约是为了准备同德国开战。希特勒的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进犯苏联是为了先发制人。

请看勃列日涅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勃列日涅夫说，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会召开会议，向党的宣讲员通报苏德条约的内容。当时大约有400人出席会议。有位宣讲员提问：“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要解释互不侵犯条约，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谁要不相信，谁就是进行挑拨。可是，人民不太相信啊。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要不要解释？”（……）我说，“一定要解释。同志们，我们将一直作解释，直到彻底粉碎法西斯为止！”

在分析勃列日涅夫的作品之前，我们先说明一下小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其实，在地理意义上讲，小地并不存在。这是新俄罗斯斯克郊区大约30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是海边一块突出的岬地。新俄罗斯斯克城在德国人手里，但是海面还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指挥第18集团军的列谢利泽将军决定利用这一形势在海湾沿岸登陆，建立打击德国人的据点。1934年2月初，第18集团军在黑海舰队的支援和掩护下，先派出250人在那里登陆，几小时后又又有800人登陆，五天以后，登陆的兵员已达17,000多人。勃列日涅夫写道：“为了使读者对当时局势有个清楚的了解，我告诉大家，在登陆的那些日子里，凡穿过海湾到达小地的人都荣获了勋章。”勃列日涅夫引用了在第一批登陆中一名上尉的报告，从中可以知道，党在战争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每七个伤亡人员中只有一名是非党人士。但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却暴露了“党”的

巨大“牺牲”的一个简单内幕：在每次登陆或者冲锋之前，这位勃列日涅夫需要签发一大叠战士的入党申请书，并且隆重地授予他们候补党证。作者说，我几乎在每次战役前都听到这种感人的表态：“我要在火线入党！”不错，他是听到了，因为这些话都是党自己编出来的。靠这种方法把大批战士列入“共产党员”名单，党在战争中增加了500万人，据勃列日涅夫说，其中有300万人阵亡。当然，勃列日涅夫知道，整个党在战前只有300万党员，而全国在战争中损失了2,000万公民。关于他们，作者只字未提。

言归正传，我们再来谈登陆的情况。从勃列日涅夫的描述中看不到作者在登陆时处于什么地方，——也许是在方面军政治部。反正他不是登陆部队之中，尽管海军政治部的主任们，以及第18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雷若夫上校都在登陆部队里，——格列奇科元帅称他们是小地的真正英雄。（安·安·格列奇科的《高加索会战》，1971年）一般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不惜笔墨提及英雄的名字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却绝口不提后来成为将军指挥集团军的雷若夫。勃列日涅夫是在登陆后两个半月才第一次到小地去。那时第18集团军已有2/3的队伍驻扎在那里了。1943年4月，勃列日涅夫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他回忆说，“我的位置在新俄罗斯斯克郊区的前线、小地的狭窄据点。在战争中，你在哪儿打仗是不由自己选择的，但应该承认，这次任命使我感到高兴。”

在第一批访问小地的一艘渔轮上，勃列日涅夫经受了他的第一次战争洗礼，渔轮碰上水雷，炸了，把勃列日涅夫抛进了大海。但是，过去有三份官方材料对这次事故的说法是一致的，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回忆却有所不同。第一个最早的来源是《真理

报》军事记者、苏联英雄博尔津科上校。他是小地保卫战的参加者。早在1958年，他就写道：“勃列日涅夫到小地去过好几次，每一次都冒着很大的危险。有一次，渔轮碰上了水雷，勃列日涅夫上校被抛到海里，水手们把失去知觉的勃列日涅夫抬了回去。

（博尔津科《战争生活》，1958年）第二个有权威性的材料来源、是前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格列奇科元帅写道：“有一次，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上校乘坐去小地的一艘渔轮撞上了水雷。爆炸的气浪把勃列日涅夫抛进海里，他失去了知觉。由于水兵们勇敢机智，勃列日涅夫得救了。”（安·格列奇科元帅的《高加索会战》）第三个更权威的 material 来源是由勃列日涅夫私人助理于1976年在莫斯科撰写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传略）一书。这本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作序的传略已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先后出版。书中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乘坐的渔轮撞上水雷，被炸毁了。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被爆炸的气浪抛到舷外，水兵们救了他。”

然而，现在勃列日涅夫本人却这样叙述：“……我们的渔轮碰上了水雷。当时我和领航员站在一起，在爆炸声中我们一起被抛了出去。

“……那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千万别落回到甲板上来。

“幸而，掉到离甲板相当远的水中……我从小就会游泳，毕竟是在第聂伯河边长大的，因此在水里能掌握自如。我喘了口气，四下张望，发现了两艘汽艇，脱离拖船后，慢悠悠地向我们划来。

“我游近9号艇，发现领航员索科洛夫也游到船跟前了。我们用手抓住船舷，帮助那些扛着弹药在水中有些不支的人们爬上

船去。”

这样一来，不是水兵们救了勃列日涅夫，相反，竟然是勃列日涅夫救了水兵们。而且自己是最后一个上船，于是有人喊他：“你怎么了，聋啦？把手递过来！”

“后来才弄清楚，这个喊我，拉我手的人是海军下士佐莫达。他在水里没有看见肩章……”不过，勃列日涅夫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还在炫耀肩章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他补充说：“……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时刻这是不重要的，我抓住船舷（而不是抓住士官的手！——作者）。往上一挺身就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这件特殊的英雄业绩把第18集团军突出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第18集团军总是派驻艰苦的地段”），但是这件事并未被文件所证实。在最高统帅部的通报中和在斯大林的命令中经常表彰一些功勋卓著的军、军团、师、团等，但是，第18集团军的功勋（在那个小的地的功勋）在上述通报和命令中没有一处提及，否则，勃列日涅夫是一定会引用这些文件的。同时，按勃列日涅夫的说法，在小地发生的不是局部性的战斗，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因此，作者断言：“我想，在小地登陆和在小地进行的战斗，堪为军事艺术的典范。”他还说，德国人也特别重视第18集团军和小地。作者写道：“我们攻占了登陆场以后，法西斯分子不停地向登陆场开火，倾泻了大量的炮弹和炸弹，自动步枪和机关枪的火力就更不用说了。据估计（何时？在哪儿？是谁估计的？——作者），小地的每个保卫者平均可推到1,250公斤这种致命的金属。”

读者很容易猜想到，引用这个确实很吓人的数字，用博尔津科的话说是为了证实“曾几次到过小地”的政治部主任也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危险。勃列日涅夫接着又叙述：“第18集团军登

陆部队几乎有2/3的人在登陆场参加了激战，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地度过的。因此，我也分摊到了这些致命金属的一部。”但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作者吓唬人，而读者却不害怕。因此，勃列日涅夫也感觉到对小地的“致命”生活有点渲染过份了，写了几页之后，他又突然承认：“读者可能会形成一种印象，好象登陆场的几千人过的日子就是冲锋、投弹、刺杀。不，这里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过着正常的生活。阅读和出版报纸，举行党的会议，欢度节日，上课。甚至举办象棋比赛。陆海军歌舞团举行演出”……战士们在前线举办象棋比赛不仅不感到害怕，而且能解闷。作者谈到1943年“五·一”节这天，司令部给战士们送礼的一段描述是很有意思的。是多发了一个面包？还是伏特加？还是烟草？都不是。作者毫无幽默感地写道：“小地人在1943年‘五·一’节得到了一件好礼物。天一亮，人们就高兴得赞叹和笑开了。原来，战士们夜间在各个驻防点树起了红旗。于是，大家一起床就看见了，当然德国人也看到了。红旗给了人们一种意外的鼓舞……”

德国人对苏军登陆场——小地的军事行动终于开始了。不知是真是假，勃列日涅夫认为，希特勒把小地之战看作象莫斯科战役、伏尔加战役或者库尔斯克战役那样具有战略意义。作者写道：“希特勒一心想把我们抛进大海，所以他就想在这块阵地上孤注一掷。形势极为严重。于是，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我，给小地的战士们写了一封号召书。它传遍了每个战壕和掩蔽所。战士们也都敌血为盟。”为什么在战争条件下要搞这种野蛮的“血书”呢？原来，这是政治部主任的需要，以便向斯大林表忠心：“后来我给斯大林寄去了一份，让他了解战士们是怎样打仗的。”

我们知道勃列日涅夫并不热中于共产主义，而是热中于自己的官运，因此，下面的情景完全是虚情假意的：“4月18日，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一批最高统帅部代表乘飞机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当天，他们同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和空军司令亚·亚·诺维科夫一道来到了第18登陆集团军司令部。一位参谋部上校（这是谁？——作者）跟我说起这件事……”

“元帅想见您。”

“怎么，是命令吗？”我问道。

“我没有接到他的命令”，上校回答道。“但是，他说他很想同您聊聊。”勃列日涅夫写道，他也很想同朱可夫聊聊，因为他深信，第18集团军一定会把他关于必须给小地增援空军力量的意见向元帅报告，还有：“在艰难的时刻最好别让我离开登陆场。我就是这样做的：同战士一起留在小地。”这段神话来源于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元帅写道，当他在各个战场上视察时也来到了第18集团军。在元帅写这篇回忆录时，18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已经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了。当然，在编辑和校订元帅回忆录的中央机关里，人们一定会给他指出，到第18集团军去，没有询问一下勃列日涅夫上校的情况是不合适的。因此，朱可夫回忆录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跟勃列日涅夫了解一下战士的情绪，但是碰巧他到小地去了。”（朱可夫元帅《回忆与思考》，1969年版，477页）如果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元帅想见见上校，甚至想征求他的意见，那么，读者可想而知，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普通的上校宣传员，而是最高统帅部赏识的一位军事战略家了。

在苏德战争期间，苏军玩忽士兵们的生命，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军队，任何一次战争。因此，苏军比德军的伤亡多得多。斯大林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的全部“天才”就是建



立在人海战术的原则上，甚至在能力、技术和时间因素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斯大林都要求采取大规模地正面冲锋。结果，与一切军事惯例相反，苏军即使防御时也比德军在进攻时的损失惨重得多。用斯大林的这种军事学说培养出来的元帅和将军们不把自己的士兵看作活生生的人，而是看作无生命的战争工具。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援引了朱可夫元帅的一段话。当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朱可夫，美国人正使用技术手段来清除前沿战场上的地雷时，朱可夫认为这种方法效率低，不顶用，他表示，我们苏联指挥员在清除前沿战场上的地雷时，要先派遣一个营的士兵。为了使后续部队能够更快前进，这些士兵全部牺牲了。当然，为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日本人在战争中也有自愿送死的神风敢死队。但是，朱可夫派去送死的扫雷营（往往是惩罚性的）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因为身旁背后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督战，谁要不执行命令或对敌投降，就立刻开枪）。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与此相反。他引用了他在1943年底写的关于《爱惜有生力量》一文中的话。他写道：“……我们伤亡很大。……在战争中，怜悯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保存下来的战争年代的文献中，有一份由我签署的命令：……你们要经常不断地注意爱惜有生力量，关心士兵的健康”。作者指出，“……这里所写的，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主要的事情。”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就无法理解自己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一些有关防御的命令中的指示：“不管伤亡多大，必须坚守这些据点（基辅、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朱可夫在战争初期认为斯大林的这种指示是错误的，斯大林撤掉了他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后来，又是这位朱可夫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城郊广泛地运用这个

主张，斯大林又启用他作为自己的副手。

勃列日涅夫认为，给苏联带来胜利的不是坦克、大炮和飞机，甚至不是人民，而是政治工作者。当然，作为一个军队的政治工作者，这种意见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它不仅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且出自一位国家元首之口，实在是荒谬之极。但是，让我们听一听作者的论据：“如果考虑到，部队的士气一向是部队顽强战斗的重要因素，那么在战争期间，这一最锐利的武器正好掌握在政工人员手里。他锻造了军人的精神和灵魂，否则，无论是坦克、大炮还是飞机，都不可能为我们带来胜利。”如果持这种观点，就很难理解，帝俄军队既没有政治指导员，也没有政委，它是怎样取得无数胜利，并在地球1/6的土地上建立起帝国的。当然，精神因素在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这证明红军在战争最初两年，在有政工人员的情况下，大约有500万士兵投降，或者毫无抵抗。如果说这支军队后来开始抵抗，尔后又进攻的话，那并不是由于有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工人员，而是因为希特勒使他们看到他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不是瓜分俄国，而是要对全体苏联人民建立外国的统治。

勃列日涅夫不是用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用自己个人的品质来写他作为政治部主任的成绩。勃列日涅夫的叙述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它的历史事实，而是当前这位党和国家首领的宣言。因为勃列日涅夫说，他是一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国务活动家，读者们以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斯大林式的暴君，而是一个“通情达理”（苏联的宣传就是这样给勃列日涅夫画像的）的新型的共产党领袖。且听他自我表白：“……工作要动脑筋，要稳。即使有人犯了错误，也不许对他大声呵斥。我对训斥人的习惯是深恶痛绝的……有些人总喜欢大声训斥。无论是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还是党的

领导人都不应忘记，他们的部属只是在职务上服从他，这些部属不是为经理或主任服务，而是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不能侮辱人的自尊心，贬低他们的人格。”

“我今天这么认为，在战争时期我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还没有相反的证据来否认这一点，的确，他没有训斥过自己的部属，但是需要指出，在苏维埃机关中广为流传的污言秽语起初是在党内产生的。然而，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此。这位“通情达理”的领导人的主张，同克格勃一直在进行的残酷审讯，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信仰者和“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集中营、疯人院的做法，是无论如何协调不起来的。就在不久前，勃列日涅夫由于签署了关于把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彼得·格里戈连科驱逐出境的野蛮命令而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

既然勃列日涅夫认为，政治机关是一切的一切，因此，他没有把政治机关的作用限于其本身的活动，即宣传和召开会议等方面。作者对我们说，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们参与制订司令部的作战计划。迄今为止，我们从苏联的一些著作中了解到，制订集团军作战计划的，有集团军司令、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见安·安·格列奇科元帅的《高加索会战》一书第1卷附录，1971年）现在勃列日涅夫却硬说他亲自参加了这样一些战役计划的制订工作。他写道：“……政治工作者是武装部队的灵魂。”

“当然，他们参加了进攻和防御战役的准备工作，没有他们就无法制订出作战计划。例如我就不记得有过这种情况，列谢利泽将军或其他我与之共事过的集团军司令员不考虑我提出的看法或修改意见，这些看法和修改意见有时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说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对这一点我们会得到证实

的，不过我们还要指出：在制订集团军司令部作战计划时，确实有党的工作者参加，但在职务上军衔上都高于政治部主任，这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即中央委员会代表，没有他的签字，甚至连司令员本人的命令都是无效的（现在也是如此）。在大树“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凡是斯大林在高加索和俄罗斯所到之处，凡是参加过他的每一个政治行动，凡是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国内战争时到过的每一个集团军或方面军，后来都被宣布为整个布尔什维克革命道路上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最后，全部党史都成了斯大林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的神话、奇谈和轶闻了。作为革命的战略家和国内战争的统帅，斯大林不仅超过托洛茨基，而且超过了列宁本人。现在，要树立“勃列日涅夫个人迷信”也同样需要编造种种历史轶闻和神话。因此，有可能把他在战争中没有起过的作用归功于他，把不属于政治部的职能算在它的名下。

勃列日涅夫正式传略的撰写者比他本人更大胆，他们说：“在高加索会战的各个阶段，列·伊·勃列日涅夫都积极参加了制订防御战和进攻战以及实施这些战役的计划。1943年9月，第18集团军从陆地、黑海舰队从海上共同实施登陆战役，以彻底解放新俄罗斯斯克的大胆设想，他是倡议者之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传略》，莫斯科，1976年，第18页）但是，格列奇科元帅在描写列·勃列日涅夫的职能和作用时却说得不一样：“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军人谈话，召开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会议，出席党的会议和共青团会议，给新党员发党证。”（安·安·格列奇科元帅的《高加索会战》，第412页）这才是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要把战役领导和战略意图都归功于勃列日涅夫，就意味着不仅是歪曲他的履历，而且也是伪造历史，夸大政治部在苏联武

装部队中的作用。至于新俄罗斯斯克登陆战役这个“大胆设想”是怎么产生的，勃列日涅夫写道：“安·安·格列奇科的集团军同我们协同作战……。他夺取一个山头，停歇一下，再夺取一个山头，又停歇一下。我记得，列谢利泽、科洛宁（军事委员会委员——作者注），还有我和扎列卢阿上校四个人一起躺在毡斗篷上。这是休息时刻，我们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列谢利泽说：

‘你们知道吗？攻占塔曼和克里米亚的关键不是这些山头，而是攻克新俄罗斯斯克。我们一道来请求最高统帅部再拨给我们17,000至20,000人。我们准备好，就开始突击。后来，我们就这样干了。’”（《新世界》1978年，第2期，第21页）

“总书记”的御用传记撰写者就把“斗篷”上的这次会议变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倡议”。勃列日涅夫把苏军于1943年9月拿下新俄罗斯斯克一事作为一次具有战略规模的大会战来加以描写，这就不仅提高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而且要证明在战后31年授予这个城市以英雄城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后来勃列日涅夫成了总书记。但是，德国人退出黑海的高加索沿岸地区，是1943年1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就决定了的事。德国人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就从高加索自动撤走，以便在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部署新的防线。他们防守着新俄罗斯斯克周围的沿岸地带是为了掩护撤退。1943年9月夺取新俄罗斯斯克的战斗快要打响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此没有抵抗就迅速撤了出来，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就这个意义来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高加索“会战”、也没有发生过新俄罗斯斯克会战。只发生过为时六天的被作者称作“新俄罗斯斯克会战”的“名誉”战。

在听他叙述的时候，读者总是等着作者何时才会讲他自己参加这个“会战”的情况，尤其是因为勃列日涅夫编写了一本《登

陆人员须知》（遵照列宁国内战争时的指示）。象国内战争中的列宁军事委员一样，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须知》中首先号召共产党员们学习“列宁的指示”：“共产党员同志！战斗中你应当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共产党员不仅要生得高尚，而且要死得无愧。”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向读者交代任何细节来说明他相信自己的指示。很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功绩是：哀悼死者，隆重地埋葬，并慰问死者的寡妻：“……我心不由主，悲痛难忍。我曾亲自给阵亡军人的妻子写信，在战友的墓地撒下一撮土，我和大家一起鸣枪致哀。……他们完全履行了列宁的指示……”不过，作者终于引用了一个细节来证明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他的功绩。这桩事发生在第18集团军和海军舰队开进城市，工兵开始在地上清除地雷的时候，“在海员俱乐部前面有一片马铃薯地，我走在前面。科洛宁问我：

‘你上哪儿去？’

‘你是军事委员会委员，’我答道，‘而我是政治部主任。我应该先走两步。’”

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读起来很通顺，如果撇开苏联文学中不可免的宣传废话，有些地方写得还是相当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使我们对这位苏联党政首脑的性格形成和思维方式增加了了解。当然，作者并非追求这个目的，至于从文学上捞取功名他想得更少。他的目的纯粹是政治上的考虑：他想向党和人民表明，当初在小地的那位默默无闻的政治部主任就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和治国之才，可惜当时对此估计不足。勃列日涅夫以斯大林为榜样，开始用第三人称谈到自己。他写道，在红场庆祝胜利的阅兵式上“……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将军被任命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混成团政委”（勃列日涅夫是1944年11月被授予将军军衔

的)。在《小地》问世后10天，我们就了解到回忆录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1978年2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命令：

“为了表彰列·伊·勃列日涅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对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授予他胜利勋章。”

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是1943年11月8日颁布的。勋章在白金上面镶嵌钻石，总重16克拉。受勋者的名字载入克里姆林宫一块特制榜上。但是，勃列日涅夫获得了胜利勋章，却粗暴地破坏了关于这个勋章的法令。根据胜利勋章颁发条例，只有“在几个或一个方面军规模内胜利地指挥战役，并使局势发生有利于苏军的根本变化的统帅方能荣膺这种勋章。”（科列斯尼科夫和罗日科夫合著《苏联的勋章和奖章》，1974年莫斯科出版，第43页）在整个战争中获得胜利勋章的一共只有12个人（有两位统帅获得两次），他们是方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和最高统帅本人，其中有五名外国人：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铁托、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和波兰元帅罗拉·日米耶尔斯基。（《军事历史杂志》，1978年，第11期）在荣获这种奖赏的人中没有一名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如赫鲁晓夫、贝利亚、布尔加宁、日丹诺夫等，也没有一名是集团军司令员，而现在却有了一位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列·勃列日涅夫上校。

勃列日涅夫醉心于各种奖赏和官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军事勋章和军衔有强烈的欲望，在担任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勃列日涅夫曾三次荣获最高军衔——上将、大将、元帅，后来加上最高统帅之职。他曾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一次获得荣誉战斗武器——军刀；现在勃列日涅夫所荣获的都是在战时或者胜利后只有统帅才能获得的最高军事勋章。试问：为什么在和平时期，一个普通非军人，一个经常声称他希望和平的国家首脑却需

要战斗勋章和高级军衔呢？

## 《复兴》

当斯佩兰斯基向亚历山大一世呈递一份著名的国家改革方案（其合乎逻辑的结局应当是一部宪法）时，卡拉姆金没有接受：“俄国需要的不是宪法，而是50名有头脑的省长。”经过125年以后，斯大林把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为国家制定了一部肆虐暴政的“宪法”，同时把国家划分成一百个党的世袭领地，控制这些领地的现在不叫省长，而是叫做第一书记。他们不一定要有头脑，但是必须忠实于总书记——象狗一般地忠实。列·伊·勃列日涅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新的回忆录《复兴》（《新世界》杂志，1978年，第5期）中，勃列日涅夫叙述了他怎样成为一个所向披靡的州委第一书记。据《真理报》就他的回忆录发表的评论文章说，“乌克兰的两个州——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由于他的功劳，不仅从废墟上重建起来，而且使这些地区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这颇象古代的神话，凤凰鸟在灰烬中起死回生。”（《真理报》1978年5月10日）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战前的1939年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这个时间不能不使人想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当时大约有1,000万苏联公民被关进集中营，“列宁的党”已经葬身于“叶若夫时期”的“国内战争”中——在300万党员中有163.5万人被枪决或流放。党的精华消灭殆尽。凡是革命前就任的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统统被枪毙了。在革命以后担任书记的人中活着的只有三个人：哈萨克的贝利亚和巴吉罗夫，乌克兰的赫鲁晓夫。列宁时期的中



央委员一个不留地被枪决了，甚至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也有三分之二被枪决。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全部被枪决，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有将近一半被处死。在这以后，斯大林着手“复兴”党。在乌克兰，这项任务委托给赫鲁晓夫。党的“复兴”工作所依靠的人，不是象列宁建党时那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仰者和思想上的革命家。个人暴政制度所需要的是没有个性的人。它需要的是那些对文明人的高尚情操，如荣誉、良心、情爱和恻隐之心等等绝对不沾边的新干部。斯大林对于自己的干部只需要三种品质：无条件地执行命令、铁面无私和麻木不仁。当赫鲁晓夫遵循这些准则在乌克兰开始“复兴”党的时候，他发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担任州委书记的理想人选。战后，赫鲁晓夫又想起自己提拔的人：1946年8月，他任命勃列日涅夫担任扎波罗热州党委第一书记。于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了党的生涯，直到他策划倒赫阴谋而登上权力的顶峰。

现在从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来看，似乎根本没有存在过一个赫鲁晓夫。而且，回忆录中也只字未提勃列日涅夫直接所属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作者想给读者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他是由莫斯科任命的并直属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者所以要这样弄虚作假，不仅是为了要同自己昔日的靠山划清界限，而且是为了强调自己同斯大林的直接继承关系，斯大林的影子象上帝一样在作品中时隐时现。顺便说一下，各加盟共和国党的州委第一书记均由这些共和国中央任命，而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履行审批手续。党章是这样规定的，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因为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都隶属于乌克兰，勃列日涅夫当然也直接属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领导。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中的许多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地方都是

为了达到弄虚作假的目的。譬如，在谈到他1947年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情况时，不明内情的读者也许以为他是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其实不然，他是在基辅向赫鲁晓夫汇报。因为乌克兰党中央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不同，它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局”（其他共和国只有中央“局”）。当然，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这些小事对于一位身居帝国最高宝座的作者来说则暴露了其赫列斯塔科夫式的品质。

看来，我在分析《小地》时对勃列日涅夫在文学上的野心有点估计不足。当他引用《战争与和平》的话对战争中的死亡和功绩发表哲理性议论时（就是指彼得·罗斯托夫和安德烈·博尔康斯基公爵），我原以为这不过是说说好听而已。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复兴》却象托尔斯泰的《复活》一样，是从象征性的小草（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小草从“石板缝”里长出来）开场的：“青草从废铁和碎石乱瓦缝里钻出来，远远可听到野狗的吠叫声，到处是一片废墟，烧焦的树枝上挂着乌鸦窝。”“艺术散文”的手法到此结束。故事接着便用党的语言（州委会的记录，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真理报》社论都是用的这种语言）来描写了。如果说作品的名字应在某程度上与内容相适应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这部《复兴》应当取名为《向我学习怎样当好第一书记》。

各个区、市、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现任第一书记们应该象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小斯大林们”当年学习斯大林时所用的方法和手段来向勃列日涅夫学习。当我们在党的20大和22大上听到斯大林的暴行以后，今天听到在党的工作中号召“复兴”斯大林式的方法和手段确实是一种凶兆。但是，勃列日涅夫不仅号召学习斯大林的“党的工作作风”，而且还直接承担了义务，当时他引用自己的话（引自1947年州委会议上的一次速记记

录)说：“我们应该利用党所积累的全部武库”。又说：“今天读这些发言，你会注意到有某些重复，但是总的来说，我现在仍赞同和支持这立种场。”“全部武库”已经被上述两次代表大会判为纯粹的斯大林主义。作者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他不是没有人道主义感情。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位工人的妻子把家庭食品卡丢失了，勃列日涅夫建议给她发一张新的；进行安装时，一台塔式起重机由于超重而下落，本打算把起重机手判为“破坏分子”，勃列日涅夫阻止说：“为什么制造神经过敏和恐怖气氛呢？”假如作者在当时向斯大林提出这种修辞性的问题，那么这篇回忆录将永远不会出笼，或者最多不过是作为作者在科雷马某地集中营生活的纪念品而已。对于这点勃列日涅夫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他还知道：今天唯一的要求是尊重他亲自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他独断专横地审讯了奥尔洛夫、鲁坚科、季希、加姆萨胡尔季、科斯塔夫、金兹伯格、夏兰斯基等人，还要迫害萨哈罗夫院士，迫使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精华离境出国，并且折磨关在集中营里的几百万政治犯和教徒。在干出这些事情之后，《复兴》的作者却问自己的读者说：“为什么要制造神经过敏和恐怖气氛呢？”

其实，恐怖也是一种锐利的工具，可以有计划地从人们身上剔除人的感情，自惭形秽，产生人命危亡的势不可免的感觉。已经降为工业奴隶的“苏联人”居然也成了《复兴》作者的注意中心。这种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已经变成“机器零件”（用斯大林的语言——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用勃列日涅夫的语言，要么是“工作的工具”，要么是在生产中创造“奇迹”的“战士”。作者写道，德国人认为，要恢复苏联的工厂需要25年，而美国人察看了第聂伯河沿岸被破坏的企业后说，一般说来恢复这些企业是

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兴建新厂，可是我们在一年之内就把这些企业恢复起来了。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作者认为，“是党的组织能力”和工人的热情解决了问题。例如，他回顾了妇女队的工作：

“每当到第聂伯罗建设工地去的时候，老远就听到运送水泥……的姑娘们响亮的声音。她们的头巾上面落满了水泥粉，不管酷暑寒冬，她们总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如果你问事情进展如何，她们总是大声回答：‘很好！’妇女们柔弱的身体经不起长期从事这样繁重的劳动，许多人病倒了。但是她们‘有觉悟’，谁也没有扔下工作。”作者写道，妇女队长安娜·拉什卡列娃也病了，她患了结核病。人们建议她做轻微的工作，可是这位有觉悟的苏联姑娘断然拒绝，安娜回答说：“我不能离开工地。”后来她痊愈了。勃列日涅夫查问她的病是怎么好的：“原来，她不是单靠药物……安娜靠的是……不放下工作。”对于一个患结核病的姑娘，谁能想出一个比水泥工作更新奇的药方呢？

当然，在战争大破坏之后，哀鸿遍野，疮痍满目。一切都感到不足——食品、衣物、住房、燃料。美国人曾建议根据“马歇尔计划”援助所有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战争初期，斯大林制度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需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因此，他立即采纳了美国的租借法案（100亿美元！）。而现在，需要援救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苏联人时，斯大林却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勃列日涅夫为斯大林的这种政策辩解：“看来，同美国政治家打交道总是困难的。（……）资本主义国家希望我们陷入困境，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干涉我国的内政。”所谓“干涉内政”无非就是美国希望保证美国的机器和钢板不致用来加强军备生产，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则想监督其食品和物资能送到苏联普通老百姓手里，而不是用作军队的

给养。

勃列日涅夫当时是怎样解决这个州的艰巨的供应任务的呢？他是怎样“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铁和水泥的“计划”、同时又给人们供应面包、肉、奶、蔬菜，养活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孩子们，使数百万战争残废者得到抚恤的呢？关于这些问题，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然而，放肆的赫鲁晓夫在1963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告诉我们，就在勃列日涅夫当书记的那些年代，那个地方的人们死于饥饿，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却还一个劲地出口粮食。住房情况如何？大多数工人住在“临时房子”和土窑里。这里作者引用了他在党代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说：“……我想直截了当地说，党的州委和市委在住房建筑方面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不得不向会议报告，住房计划只完成了11%。

大厅里喊：只完成7%！

——甚至只完成7%！”

既然是7%，就别再提什么“党对人的关心”啦！

就是由于这种“关心”，作者在1947年9月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是十分珍贵的奖赏——我获得了第一枚列宁勋章”。从这个偶然的时机我们才得知，光荣的“小地英雄”和“卫国战争的政委”从前线回来时竟没有得到一枚列宁勋章！我们这位回忆录作者的记忆力好象齿龈脓肿一样，它从这面鼓起来，而另一面就完全萎缩下去。因此，国家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与此有关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在他的回忆录中都销声匿迹了。

在乌克兰中央领导人中，作者没有找到一个值得在回忆录里提及的人，而在莫斯科中央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提到的只有一个日丹诺夫，他是位机敏的领导人出现的。作者把他拉

到自己的回忆录里是毫无必要的，完全是出于微不足道的理由——勃列日涅夫写信给中央的日丹诺夫，请求拨给3,000只灯泡：“不到三天，我们不仅得到了批准，而且收到了灯泡”。但是，苏联读者是研究党内伊索语言的伟大专家，他们知道：总书记是在用日丹诺夫之流的镇压规模和镇压办法来威吓那些现存的和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

斯大林只出场一次，安排斯大林这场戏大概是为了表明作者同自己的“主人”有直接联系，这里避开了赫鲁晓夫、波克列贝舍夫和马林科夫之类人物的出现。勃列日涅夫说，在播种大忙期间他到各区去视察，他早晨七点钟乘车来到一位区委书记那里，看到他郁郁不乐，便问道：“你怎么了，亚历山大·萨维奇？你说，发生什么事儿了？

——……你早上收听广播了吗？

——没有，怎么啦？

——《真理报》在社论里骂我们啦……（……）

——哦……我说呐，那么，斯大林会打电话来的。我该去一趟。

夜里，约·维·斯大林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而且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

斯大林教导党要严格遵守上下级关系，不管是在隶属关系方面，还是上下级之间，以及自己同下属之间的关系上，都要严格恪守等级制度。有时，人们当了几十年的州委第一书记，甚或部长，都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接见，也没有接到过斯大林的电话。中央机关和斯大林的“内务办公室”就是为此而存在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即使斯大林需要打电话，那也只会打给赫鲁晓夫，让他给自己的部下“洗脑筋”。因此，说到作者同

斯大林进行的“严肃的谈话”，只有共青团员才会相信这种鬼话。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同斯大林进行的这场“严肃的谈话”只能是“主人”的独白，就像斯大林同伊格纳季耶夫之间进行的谈话一样：“勃列日涅夫同志，要么你完成计划，要么撤掉你的职”，也许还会象扎波罗热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的信那样，骂几句粗俗的下流话（斯大林喜欢朗读这封信，并且在自己房间里挂着列宾油画的复制品）。

勃列日涅夫在一度沦陷的乌克兰不仅“复兴了”被战争破坏的企业，而且“复兴了”斯大林的恐怖活动，其规模比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对此并不回避，但是只是一笔带过：“也不得不研究一些与经济无关的重要问题……，安全机关调查并揭露了那些曾经充当法西斯帮凶的叛徒、警察和宪兵。他们不应该逃避惩罚。”作者说，作为第一书记，他对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和检察院也负有领导责任。所以他也不能隐瞒他领导恐怖活动的责任。

在这些被占领的领土上战前住着 9,000 万人。现在，由于斯大林集团让德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然而对此负责的却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而是那些被占领者蹂躏的苏联公民。所有的成年人无一例外地经过了国家安全部的“过滤器”。有几十万人送到集中营。此外，有几百万前线战俘也被德国人强行运到德国。乌克兰的契卡分子是特别凶恶的，因为在战争期间既抗击希特勒又反对斯大林的游击队在战后又继续为独立的乌克兰而斗争。勃列日涅夫承认这个事实：“……值得指出的是，战后时期需要有特殊的警惕性。没有一周不发生各种特别事故的……”勃列日涅夫之流打击这些“匪帮”的斗争在乌克兰又造成了几十万人的牺牲，而斯大林犹感不够。要知道，当初作为勃列日涅夫首长的赫鲁

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20大讲到高加索人民全部被驱逐出境时说：“乌克兰人所以幸免这种厄运，只是因为他人太多，无处可流放这么多人。否则，他们也会被斯大林流放的。”斯大林很不信任乌克兰人，他原则上不允许让乌克兰族的人担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因此，先后担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麦利尼科夫都不是乌克兰人，而自认为是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象科罗特钦科、基里连科等人都被任命为州委第一书记。

对于这些第一书记的组织才干、坚强的毅力和政治上的敏感，我并无贬低之意。斯大林的锻造干部的熔炉从不出废品：它或者锻造出刑事制度上铁了心的狱吏，或者把那些不服“改造”的人烧成灰烬。勃列日涅夫出色地经受了这座熔炉的各种考验。当然，他不是斯大林，但却是斯大林培养出来的人。他是斯大林式的管理能手，他不是创造者，而是个模仿者。因此，当他号召自己的党向斯大林时期的勃列日涅夫学习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亲斯大林的党羽便匆匆忙忙宣布《小地》和《复兴》是党的巨大瑰宝。各州和各共和国都曾就此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举行理论会议，举办学术讨论会。社会主义文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寻找理想的“正面人物”，一直没有找到。现在却在上述作品的作者身上找到了。这一发现使党沉浸在难以形容的喜悦之中，使那些永不绝迹的献媚大军欣喜若狂。

在共青团第18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已经被转弯抹角地（万事开头难！）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行列。

《真理报》也不甘落后。它证明，《小地》和《复兴》是“政治才略的教科书”。（《真理报》1978年5月6日）

克里姆林宫的御用文人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也在《真理报》上撰文，从“艺术价值”的角度分析了勃列日涅夫的《复



兴》。必须承认，恰科夫斯基犹如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一样具有非凡的眼力。因此，他在《复兴》中看到了凡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文学水平。恰科夫斯基说，他也不是一下子就看到这种文学水平的：“杂志上共37页的这部作品我‘一口气就读完了’。作品读后，印象犹在，我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复兴》非同寻常的感染力究竟在哪里？我未能马上作答。”……恰科夫斯基似乎过谦了。他的回答在他尚未开始读《复兴》之前就已准备好了，这个回答可用一字表达：“诗”！于是便解释这首诗的魅力之所在。“这首创造性诗篇气势磅礴，犹如奔腾的激流，自这本回忆录中直泻而下。这首诗篇引人入胜，使人爱不释手……”（《真理报》1978年5月10日）还是在昨天，恰科夫斯基们赞美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诗”，今天他们又为勃列日涅夫的“诗”所征服，而明天有了新的总书记，他们又得大显身手，要做到这点是很不简单的。诚然，党的献媚者大军是不会绝迹的。令人奇怪的是，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心里明白：“寓言作者克雷洛夫是怎样描写这种人的？……但是，总能在献媚者的心头找到一块地方。”

“您谈点正经的吧，我们不需要过分的阿谀奉承。”

这话是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30年前说的，但是，如果中央总书记今天再重复这些话，并对党内那些奴仆们进行的阿谀奉承和官方“寓言作家们”令人作呕的吹捧持反对态度，让那些“寓言作家”都去从事生产劳动的话，那么国家就会节约成千上万吨的纸张。

## 《垦荒地》

任何极端行为都是有害的

列·勃列日涅夫

早在战前，斯大林就建立了书刊检查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禁止查阅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旧报纸、旧杂志和旧书籍。这一禁令后来扩大到党代表大会的原始记录稿、列宁时代的旧出版物（借口那里面有有害的“参考资料”）和斯大林本人的旧的出版物（那里面有斯大林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茨基等人辩护的文章和讲话）。从斯大林制定并延续至今的制度的利益来看，他的做法不仅正确，而且十分合理。假如允许苏联人通行无阻地利用列宁时代的旧报旧书的话，那么，他们便可从中了解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托洛茨基建立了红军，雷科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副手，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布哈林是党的主要理论家，而斯大林在那些年代从未被看作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然而，斯大林却不顾历史事实，一口咬定他当时既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又是红军的缔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所有科学的巨擘。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只能深信不疑，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或者坐牢关押。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按照斯大林伪造史实的办法，凡是与赫鲁晓夫的名字有关的文艺作品已经全部遭禁，他的《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的8卷著作也已从图书馆撤掉了，勃列日涅夫决定在自己的第三部回忆录《垦荒地》（《新世界》杂志，1978年，第11期）一书中证明一件无法证明的事：开垦荒地——这不是赫鲁晓夫的

思想（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干扰了这一思想的实现）。只有勃列日涅夫才是垦荒的真正组织者，——勃列日涅夫几部新的回忆录就是这样的结论。且看，关于这件事他是怎样证明的。

首先，就列·勃列日涅夫的传记谈几点意见。显然，总书记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仍心有余悸，否则就没有必要一再地强调：“我的父亲是工人，祖父是农民，我自己先后在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起初当工人，在战乱年代，工厂长期停工，只好去务农，耕地、播种、收割……”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1927年21岁时毕业于技术学校，在此之前，他至少读了七年制中学，也就是说在21年中起码读了10年书，试问，除了学校的寒暑假外，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当“工人”和“农民”？其次，勃列日涅夫入党有两年候补期，这种候补期是专为非无产阶级和非农民阶级出身的人规定的。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我曾经在《新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过一篇随笔《从远处看勃列日涅夫》（1978年1月29日），我指出，正当党同“富农”进行斗争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一旁袖手旁观，正当“全盘合作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高潮期间，土地测量员勃列日涅夫从农村临阵脱逃，回家到城里去了。现在在《垦荒地》一书中，间接说明了确有其事：“他在会上斗争富农，组织第一批集体农庄……。合作化一开始就当土地管理员，在合作化基本完成的时候回到工厂。”如果勃列日涅夫或他的顾问翻阅一下《苏联大百科全书》，把全盘合作化开始的日期同勃列日涅夫离开农村的日期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勃列日涅夫离开农村是在1930年，（见《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2卷，第711页，1962年版，“列·伊·勃列日涅夫”条）全盘合作化也是在1930年开始的，1932—1937年结束，

在1930年的一年内，农业实现合作化的只有23.6%。（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卷，第616页，1953年版）我列举这些事例是为了说明，如果勃列日涅夫对于可以受到客观检验的历史事实尚且如此肆无忌惮地加以歪曲的话，那么对待其他那些无法受到检验的事实和事件所持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记得，斯大林死后，勃列日涅夫的官运猝然中断了，当时正是一帆风顺向权力顶峰挺进之时：在1952年10月第19次代表大会上他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斯大林在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十月全会上把那些年轻的党的工作者召集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假这些人之手来消灭自己的“老战友”——老政治局的人，勃列日涅夫无疑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老政治局的委员们完全明白这一点，赫鲁晓夫向20大作的报告也谈及到这一点。因此，在斯大林死后老政治局采取的第一个党的行动就是把这些年轻的党的工作者驱逐出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其中也包括列·勃列日涅夫在内。当时他被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除名，担任了陆海军政治部主任。据党的干部材料介绍，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贬谪，这位昔日的中央书记一落千丈。但是，这次降职并非由于勃列日涅夫有什么过错。这是因为斯大林指望他作为一个可靠的机关工作者能够完成他的任何命令。勃列日涅夫无论从他本人的品质来说，还是从一个受过斯大林教育的党的工作者来说，都要绝对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是多么困难和不体面。他在自己的导师斯大林那里也继承了其他的宝贵品质——钢铁般的忍耐力。当他多年的靠山尼·谢·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帮了他的忙。赫鲁晓夫上台四个月后就想起他以前在乌克兰曾经提拔过的勃列日涅夫。当然，勃列日涅夫没有在书中提起赫鲁晓夫的名字，他

是这样叙述自己东山再起的：“垦荒地已在我的生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那是从1954年1月底莫斯科的一个严寒的日子里，我被叫到苏共中央的时候开始的。这事情本身我早已知道了，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垦荒的事，但我没有想到他们打算把大规模垦荒工作交给我去办。”

就算“垦荒问题”是勃列日涅夫老早就知道的，我们同意作者鉴于大家清楚的原因，不便指出苏共中央前第一书记的名字，但是这一说法的后半部分——硬说“大规模垦荒”正是委托给了他勃列日涅夫，这种公开的谎话却引起了震惊。哈萨克的“大规模垦荒地”（1,300万公顷）不是委托给勃列日涅夫，而是委托给了哈萨克中央第一书记潘·康·波诺马连科，而列·伊·勃列日涅夫是担任他的副手，当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成为哈萨克中央第一书记是在1955年8月波诺马连科超额完成了哈萨克垦荒任务（1,800万公顷）之后。尽管如此，波诺马连科还是下台了，因为在中央主席团的内讧中，勃列日涅夫的靠山赫鲁晓夫战胜了波诺马连科的靠山马林科夫。1955年2月，马林科夫丢掉了政府首脑的职务，波诺马连科也因此降了职，派去当驻华沙大使。

关于列·勃列日涅夫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不用怀疑的，例如他谈到自己在工作中的自我牺牲精神，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不怕别人说他不谦虚，自我标榜为年轻的党的工作者仿效的榜样，作者说他当时是如何精力充沛地工作：“经过多年以后，今天再来翻阅当时的文件，我想，那么多的事情是怎样完成的呢？又是怎样到处奔忙的呢？……从清晨到深夜接待来访的人们。我自己从不吝惜时间……往往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到深夜……整天地来去奔波，抽空打个盹儿，吃饭也没有准地方。有一次在切利诺格勒，我觉得自己不行了，醒来时已经躺在担架上。过去

也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把我从塞米巴拉金斯克送到阿拉木图。我只得躺在家里，避开那些非要把我关在医院里的医生们……。不过，主要是没有时间生病。”

究竟是什么使他废寝忘食地紧张工作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思想，——这是党内糊涂人的回答；向上爬——这才是要害。勃列日涅夫心里明白，如果他不辜负赫鲁晓夫的信任，那就将第二次攀登克里姆林宫的顶峰，如果他胜任不了工作，那就只好从中央的视界中销声匿迹了。赫鲁晓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冒了风险的：他是在苏共中央当时的主席团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实施其垦荒主张的。问题不仅要在哈萨克垦荒，而且要在其他地区——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北高加索等地垦荒。为了保证这样巨大的措施（开拓荒地的总面积有4,200万公顷，其中哈萨克就开垦了1,800万公顷）取得成就，赫鲁晓夫象动员打仗那样把整个苏联的人力、机器、财力动员起来了。

这是斯大林“冰河期”之后人们所渴望的“解冻”时期。因此，苏联青年广泛响应赫鲁晓夫的垦荒号召。成百上千列载满青年人的火车开赴垦荒边区。但是，这件事也象苏联其他各种运动一样，地方上事先毫无准备。因此，人们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缺乏最起码的工作条件——没有住房，也没有组织供应。大失所望的垦荒者又大批地返回原地。勃列日涅夫指出了这个事实，但是责任不在他自己，而在这些垦荒者本身：“人们恰当地称他们为‘过路人’，1954年春，……在前往北哈萨克的第一班列车上我正好遇到这些人……，有一个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跑到我跟前，简直象放连珠炮似地提出一大堆问题：把他们弄到了什么鬼地方呀？为什么要逼他们走呀？住房在哪儿呀、在哪儿领工资呀、御寒的衣服在哪儿呀？还说，在这个草原上只有土拨鼠才

能在洞里活下去！”

如上所述，列·勃列日涅夫把垦荒思想的倡议者是谁这一问题作为《垦荒地》一书的中心议题，读者们都知道，提出这一主张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好奇地看着勃列日涅夫怎样颠倒黑白，然而勃列日涅夫巧妙地摆脱了困境：他对垦荒思想的产生采取了匿名的办法，同时又引用当时哈萨克一位国营农场场长，现在的波尔塔瓦州党委第一书记麦贡的话证明自己是“垦荒前线的总指挥”。

（《消息报》197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说道：“有时人们会问：垦荒思想是谁提出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不正确，这是企图把党和人民取得的卓越成就归功于某一个人的‘灵机一动’。垦荒，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思想……”当然，这并没有回答人们提出的合情合理的问题。党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是由活的人领导的活的机体。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党的就是通过各种决议的中央主席团。在1954年1—2月，通过垦荒决议时的中央主席团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当时由下面十人组成：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他们对垦荒计划的态度如何？列·勃列日涅夫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今天，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之后，一切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了，甚至有人会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有人反对垦荒呢？然而反对者确实有过。他们一听到垦荒二字就暴跳如雷——他们就是后来那个反党集团的参加者。实际上，当时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中赞成垦荒的只有两个人——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其余的人全部反对，这些人后来组成了所谓‘反党集团’。甚至当时投票同意垦荒计划的米高扬也不相信赫鲁晓夫许诺的在哈萨克可以收获10亿普特的粮食。”（见尼·谢·赫鲁晓夫《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的发展》第2卷，第273页，

1962年版)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不仅是垦荒计划的倡导者，而且是党的上层中唯一热心于这一计划的人。既然中央主席团中大多数人都反对，那么当时赫鲁晓夫又是怎样通过这个决议的呢？还是让历史文件本身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其中最重要的文件应当说有两个：（1）1954年1月22日尼·谢·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便函》，（2）1954年赫鲁晓夫在2月全会上作的报告。

《垦荒地》的作者闭口不谈这两个文件，尽管正是在这两个文件中对谁是垦荒倡导者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垦荒计划首次见诸于中央文件是在赫鲁晓夫给中央主席团的个人“便函”中。便函中说：“在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西西伯利亚以及伏尔加河沿岸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熟荒地和生荒地扩大谷物播种面积是增加粮食生产的重要而可行的途径。”（赫鲁晓夫，同上，第1卷，第89页）赫鲁晓夫建议在1954—55年首先在哈萨克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中央主席团认为赫鲁晓夫的计划“不切实际”，拒绝采纳。1954年2月赫鲁晓夫召开了中央全会。在会上阐述自己的想法。在这次全会上赫鲁晓夫特别谈到了哈萨克：“哈萨克提供的粮食可能不少于乌克兰。”（同上，第275页）全会支持了赫鲁晓夫的想法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赫鲁晓夫还不放心。他经常往垦荒地区跑，检查他的设想的进展情况，作指示，提要求，拒绝空洞的许诺。

对于这些情况，勃列日涅夫只字不提，在引用中央二月全会材料时也没有说明这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尽管这个报告就是中央全会唯一的一个议程。岂止如此。作者还竭力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最上层只有一个人妨碍了他的垦荒工作，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曾经出场两次，这都是为了说



明他的“专横”和“唯意志论”。但是，恰恰是在读了这些使赫鲁晓夫声誉“扫地”的场景后，读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所举的事例是他所谓“唯意志论”最有分量的证明的话，那么，赫鲁晓夫的垮台不是由于“唯意志论”，而是由于他出众的智慧、不安分的办事精神，乃至他的在勃列日涅夫听来有损他个人尊严的幽默感。

第一次出场：“一次在有尼·谢·赫鲁晓夫出席的大会上，我说，垦荒工作还有待它本身来说明其结果，他相当严厉地打断我的话说：

“用您的诺言烤不出蛋糕来！”

第二次出场：有一次尼·谢·赫鲁晓夫来到哈萨克出席库斯坦奈州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把粮食从偏僻地区运出来。有人提出修筑公路，而赫鲁晓夫却提出修建几条窄轨铁路。勃列日涅夫指出：“没有人提出引人注意的反对意见。因此，先是修成了库斯坦奈——乌里茨科耶，后来修成了叶西利——图尔盖窄轨铁路。这是一个错误，这两条铁路实际上在运粮方面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不久就被拆除了。”从这个小例子根本不能说明赫鲁晓夫不正确，作者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潜台词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才疏学浅，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苏联真正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这里，请各位听一听作者的议论：“我举这个事实不是为了证明一个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筑路专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等等。不是的，但他应掌握一般发展的规律，并应依据科学和实践的具体知识行事。”

读者现在就能猜到为什么这位既不了解社会“规律”，又没有“科学和实践知识”的赫鲁晓夫要由这位才学兼优的勃列日涅

夫来代替了。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表现出了他根本不具备谦逊品格。

在继续谈论当前苏联领袖们的力量和弱点时，列·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承认，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掌握实权的不是他，而是“集体”。作者说，“党和国家活动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在人类各个活动领域中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是如此复杂，只有强大的集体智慧才能驾驭它。”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就表现在他作为党的领袖，随心所欲地驾驭了这个“集体智慧”，今天却相反，是“集体智慧”在驾驭着表面上权力无边的勃列日涅夫。

言归正传，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垦荒的事。正如我们看到的，作者否认垦荒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他否认赫鲁晓夫曾给垦荒者以帮助。此外，赫鲁晓夫还外行地干预了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苏共中央内究竟是谁帮助过作者？勃列日涅夫的回答证明，他既没有考虑到历史事实，也没有考虑到自己作品的逻辑。作者写道：“我在党中央委员会得到了支持和帮助。我想对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说几句感谢的话，那几年，为了使垦荒工作进行得更快更顺利，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我曾多次同他们会见，商量工作，而且总是得到……党的坚决支持和善意的鼓励。”勃列日涅夫没有具体指名是谁，而且除了赫鲁晓夫，他也没有别人可举了，因为其他那些政治局委员除了米高扬以外都已成为反对垦荒的“反党集团”的成员，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回忆录一开始就写到了。但是，回忆录作者对垦荒的事情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不仅记得那些妨碍他工作的人，也记得谁是垦荒的倡议者。这一点，在1961年10月苏共22大是记录在案的，勃列日涅夫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说：“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提

出的开垦荒地的宏图，尽管有反党集团疯狂反对……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苏共22大《总结报告记录稿》第1卷，第342页，1962年版）

我们又要提问：勃列日涅夫究竟那一次讲的是真话？是22大上说赫鲁晓夫是垦荒的倡议者呢，还是今天他在《垦荒地》一书中断然加以否认的呢？其实，向斯大林训练出来的人提这种问题是毫无意义。本来，伪造历史就是党的“总路线”的本能，既然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勃列日涅夫对自己前任的声誉怀着一种病态的嫉妒心理了。但是旁观者清，赫鲁晓夫统治正是由于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垦荒这两个划时代的行动而载入苏联的史册。然而现在，经过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作者一笔抹杀自己前任在这两个行动上的声誉：在政治上恢复斯大林化，在经济上把赫鲁晓夫垦荒的功绩窃为己有。他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直言不讳地说：“直到现在我还不断关心垦荒工作……。可以说，现在我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已成为现实……”

可怜的赫鲁晓夫！他们不仅夺取了你的荣誉，而且剥夺了你的理想。愿你的继承者的继承者以同样的办法对待他来告慰于你吧。要知道，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

要知道，就在反赫鲁晓夫阴谋的四个月之前，——1964年4月17日，勃列日涅夫还在一个劲儿地要党和人民相信，赫鲁晓夫不仅提出了垦荒的倡议，而且主要的是首先揭露斯大林，给苏联各族人民生活开创了新阶段。当时在给尼·谢·赫鲁晓夫授予苏联金星英雄勋章时，勃列日涅夫说：“我无法隐藏自己高兴和激动的心情……。苏联人将永远感激您执掌党的大权，您勇敢地提出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您的名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将永远同我国生活中的新的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您的

美好的事业博得了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因为您，我们的同志，朋友和领导人而从心底感到欣慰和自豪。”党内记录在此处注明：“全场欢呼。这时，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胸前的三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勋章之上又加了一枚闪闪发光的苏联金星英雄勋章。按照俄罗斯古老习惯，列·伊·勃列日涅夫拥抱了尼·谢·赫鲁晓夫并吻了他三下。”（《真理报》1964年4月18日）可见，没有比苏联的荣誉更不光荣的事了……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没有同自己的前任进行争论，这就是哈萨克的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当时承认，不仅哈萨克人民反对垦荒计划，甚至连以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为首的哈萨克共产党中央都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实际上是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强制移民来大规模开发自己的国土。早在战争期间，就有一大批民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卡拉恰耶夫族、巴尔卡尔族、日尔曼族等被驱赶到哈萨克去。在哈萨克“共产主义伟大建设工程”的周围建起了一个个集中营。哈萨克非民族化的过程加强了。冠以“垦荒者”美名的殖民者以数十万计源源不绝地涌入荒地，哈萨克人反倒成了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现在哈萨克人只占哈萨克总人数的32%）。民间公开传说：“斯大林把乌兹别克变成了莫斯科的棉花殖民地，赫鲁晓夫则想把哈萨克变成莫斯科的粮食殖民地。”因此，哈萨克中央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拒绝赫鲁晓夫借口由“兄弟共和国”开发哈萨克的垦荒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赫鲁晓夫对“享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统治者软硬兼施。要他们接受他的计划，然而没有取得成效。在这个问题上，连哈萨克中央第二书记阿丰诺夫（俄罗斯人）都支持哈萨克人沙亚赫麦

托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只好用“唯意志论”的方式解决问题，把以沙亚赫麦托夫和阿丰诺夫为首的整个哈萨克中央局召到克里姆林宫，并通知他们，今后他们谁都不参加哈萨克的管理工作，而是由波诺马连科任哈萨克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作他的助手，任第二书记。他们带着一班人马（其中没有一个是哈萨克人）回到阿拉木图。

垦荒的开始，也是哈萨克“国际化”的开始。勃列日涅夫用大国殖民者洋洋得意的语调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垦荒把这个地方（哈萨克——作者注）变成了“百种语言汇集的星球”。作为百种语言之一的哈萨克语不再是“本国”的国语。勃列日涅夫还炫耀自己同培植“民族情绪”的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所取得的成绩。他写道：“……对于民族传统和民族特性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不可小视，不可只看作是编纂民族志和描写风俗人情，比如说，写俄罗斯就只写小木屋、轮舞和妇女头饰，写哈萨克就是帐篷和马群”（！）。他接着又说：“请注意，狭隘民族主义的卫道士们以保卫‘民族传统的纯洁性’为借口，一般是采用非公开的活动方式。相反，他们巧妙地利用对方（即公开鼓吹俄罗斯化的大国沙文主义者——作者注）的任何一个错误，同时，他们（即哈萨克的民族主义者——作者注）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比罗马教皇还要神圣。我记得，人们曾经对一位名叫凯涅萨拉的人的作用问题引起一场争论。起初人们说他是一位赞成哈萨克同俄罗斯联合的进步活动家。后来又找到证据说他是个反动分子，并不赞成联合。”作者毫不客气地贬辱为哈萨克的独立而斗争的哈萨克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凯涅萨拉·卡赛姆（1802—1847年）和他的事业。对于他，不仅过去沙皇的历史文献上有记载，甚至苏联的历史文献都承认他是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即使在四十年代沙文主义运动鼎盛

时期，斯大林也不敢宣布凯涅萨拉这位哈萨克人民的民族英雄是“反动分子”和“外国间谍”。勃列日涅夫以自己为例，向哈萨克读者证明，列宁有一句名言说得对：“有的共产党员经过洗礼就是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最后，我们谈谈苏联读者未加重视（人们已习以为常了）的两件小事，作者（勃列日涅夫）本人大概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收获粮食的时候，装满谷物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可是，粮站不收了，因为旧粮仓已经装满，新粮仓还没有建起来。司机们一连几昼夜睡在驾驶室里，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甚至连个打交道的人都找不着，把粮食卸在地上吧，要受处分，运回原地吧，处分更重，总之，是典型的“苏联秩序”。这时，勃列日涅夫带着随行人员来到了，“司机们立刻把我们包围起来，吵个没完。司机们说，他们停在这里已有几个昼夜，睡在驾驶室里，没地方吃饭，没有地方洗澡。”作者补充说：“……但是，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粮食会毁掉的”。人命关天，“这还算不了什么”，怕毁掉粮食——这才是关键所在。

另一件事是，《星期日》周刊（1978年11月6—12日，第45期）刊登了飞机驾驶员莫伊谢耶夫的一篇短文，说他同副驾驶员和随机机械员一起为勃列日涅夫驾驶专机（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已着陆480次了）。有一次莫伊谢耶夫着陆时违反了哈萨克民航管理局的指令。他的飞机不是降落在规定的区中心，而是直接降落到国营农场的宅旁园地上。莫伊谢耶夫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这次着陆使我神经很紧张。但是，没有时间了……我们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后来民航局长对我说：莫伊谢耶夫，若是换了别人，我对这次着陆是不会饶过的。如果你把飞机毁了，那就等着瞧吧……”。莫伊谢耶夫是很可能把哈萨克中央书记勃列日

涅夫连机带人一起“毁掉”的，看来，局长对人是无动于衷的，可是，如果把飞机毁了，那就倒霉了。前一个例子说明产品比人宝贵，后一个例子说明飞机比人宝贵。这是无意识的自我暴露。它说明了苏联“人道主义”的本质。

《垦荒地》象勃列日涅夫前两篇回忆录——《小地》和《复兴》一样，被说成是未来代代相传的“生活教科书”。作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在《真理报》上写道：“回忆录《垦荒地》同他的前两本书一起构成了三部曲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三幅画卷，对我们来说，珍贵而重要的不仅是使我们回忆起不久前的英雄历史，而且（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苏联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教科书。”（《真理报》1978年11月12日）如果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聪明一点，他一定既不相信阿列克谢耶夫的话，也不相信《真理报》的话，他们明天就可能会写出完全相反的话，呜呼，到那时他们才是讲了真心话。

## 结束语：革命会威胁国家吗？

宣布本国持不同政见的公民为国事犯的现代国家，其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国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命令。但是，历史的人道主义者从道德伦理考虑出发，总是反对任何战争和革命。

“任何流血都是可怕的，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流血则加倍可怕”，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道德观。甚至独裁者和暴君在他们从血泊中夺得政权以后也会站到人道主义者的观点上来。“任何革命都是可怕的，流血的革命则加倍可怕”，他们悄悄地使自己的人民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通过一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流血的国内战争和血流成河的集体农庄战争攫取了人民的政权以后，也变成了“人道主义者”。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让苏联的被压迫人民相信两个虚伪的论点：

(1) 在苏联没有对抗的阶级，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而也就没有发生新的革命的土壤和原因；

(2) 这个制度中反对革命的警察实力是如此强大和无所不在，以至于，任何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企图都注定要惨败。

苏联“人道主义者”的“反革命哲学”是走得如此之远，甚至在22大（1961年）通过的党纲对西方也鼓吹起“和平革命”。党纲中是这样说的：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力求用和平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苏共22大记录报告，第3卷，第



顺便说一下，这种“和平方法”被中国人称之为对列宁主义的最粗暴的修正，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正确的，同时，如果当真认为布尔什维克已放弃了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后方进行流血的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

“和平方法”可以为两种人所接受：一种是幻想实现“非意识形态化”和“趋同化”的西方左翼自由派人士；另一种是开始从半个世纪昏睡中醒来的苏联人民。人民行动起来了。这个行动象海上浮流的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顶部——日益增长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军。而克里姆林宫则看到了它的整体，了解得更多。在政治局委员们的办公桌上，每周都放着绝密的、世界上最有兴趣的警察报告：克格勃头子关于“苏联国内局势”的业务汇报，其中包括秘密工作人员最精采的情报，如：苏联人民在车间、田野、机关、学校、实验室、军队、公共食堂里和在排队时以及在婚礼和葬礼中对自己统治者的实际想法。克里姆林宫的头目们不是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那些令人作呕的作品中，而是从契卡工作人员的这些清醒的、枯燥无味的、但却是真实的汇报材料（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得知人民的真实愿望和想法。人们不仅从私下出版的作品中，而且还从苏联意识形态学家对这些作品的反应中看出：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苏联的暴政已经日暮途穷，需要彻底改变！他们利用人民的夙愿，炮制了一个延长制度寿命的战略。“由政权自上而下地监督社会演变，而不是由人民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来引起变革”，这便是契卡工作人员的新的秘密战略。这个战略不仅受到苏联那些自由的或不自由的祖巴托夫之流所鼓吹，而且受到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吹捧，这一事实证明了克格勃奸细的犯罪艺术的高超。当局对下层群众

中潜在的爆炸,即对发生新革命的深切恐惧,迫使它接受这种新战略,然而革命的怪影正以雄壮的、几乎可以察觉到的步履在苏联游荡。

\* \* \*

有人问:一旦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如果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更不用说在国外的政治流亡者了)不予支持,这是否等于客观上帮助了契卡工作者呢?索尔仁尼琴确认,任何暴力革命都是有害的,革命即使以胜利而告终,其好处也是值得怀疑的。为了准确起见,我引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一段话:

“……我应当承认,我已成为俄国历史上任何一种革命和军事震荡的反对派。这意味着将来也是如此,不管你们所渴望的(在国外发生革命和军事震荡),还是你们所害怕的(在国内发生革命和军事震荡),我都反对。经过研究,我确信,在人民中发生大规模流血革命总是会产生致命的后果。”(《致苏联领袖们的信》,第43页,巴黎)

接着,就在同一页,索尔仁尼琴得出十分重要的结论:

“以任何一种急剧的变革来改变现在的领导(整个金字塔型的领导结构),换上另外一些大人物,都会引起毁灭性的斗争,而且可以肯定,领导水平是否会有改进也是大可怀疑的。”

这两个论断不能不遭到历史学家的严重抗议。我个人认为,第一个论断从历史观点看是错误的,而第二个论断从政治上看是错误的,尽管这一论断是以假设方式表达的。我们从后一个论断谈起。“比现在的领导”更差的只能是另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但是,我们说的不是更换寡头政治的头目,而是更换寡头政治制度本身。

有什么制度能比这种制度更糟糕呢?历史上有许多种类的寡

头暴政，但是没有哪一种比布尔什维克暴政更糟糕的了。对于第一个论断的实质，我们得说得详尽些，因为它一向在作家和人道主义者中间有着最普遍的偏见。不管人道主义者怎样咒骂革命，也不管社会学家如何否认革命的合理性，革命和战争是新时代社会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就象自然界的地震和人的心肌梗塞一样（形象地说，革命也是年老体衰的社会机体的心肌梗塞）。区别在于，自然界的灾难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受我们的影响。而战争和革命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对潜在的侵略者无条件的投降就可以防止战争；奴隶般的俯首听命于暴君就可以防止革命。但是，历史教导我们：情况总是适得其反。

为什么说“……在人民中发生的革命对人民总是有致命后果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呢？

\* \* \*

革命作为一种急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尽管这个词早在古罗马时代就为人所知（当时这个词的含义同现在恰恰相反，是表示进化）。首先，并非所有的革命都一定是“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革命有暴力的，也有和平的；有瞬间的（葡萄牙），也有长期的（国内战争）。暴力革命是一切暴政的伴侣。暴力革命的时代始于17世纪英国的长期革命，那次革命造成了很多牺牲，英国国王被处决，最终宣告在英国成立现代化的，确实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君主制。尽管英国革命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很小，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美洲的英国殖民地的政治生活，建立了最初由13个州组成的新国家和新民族，即现在的美国（1776年）。美国的奠基人把他们的独立战争也称为革命，而不是称为反对宗主国的殖民地解放战争。经过13年（1789年）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代价惨重并杀掉了国王和王后的强制性的

流血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建立了民主法国，而且在欧洲的其余部分开创了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新时代。1848—1849年在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进行的一系列暴力革命彻底埋葬了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并在这些国家奠定了法制国家的基础。命运放过了俄国，使它避免革命浩劫长达百年之久，然而，迟发的爆炸显示了更大的威力。

诚然，在1905年流血革命以后，随之而来的是1917年和平的二月革命，几乎没有牺牲，也没有杀掉沙皇就更迭了政权。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谈到俄国新的二月革命时写道：“俄国是现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列宁及其政党发动了新的革命反对这个“最自由的国家”，于是便开始了一场流血最多的国内战争，最终建立了永恒的宗教裁判制度。这里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发生的历次革命，包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在内，都是死伤不多的人民自发革命，然而，从十月革命展开序幕的各次共产主义革命都是伤亡极大的有组织的一党革命。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西方人民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所建立的制度是一种保障所有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都享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制度；而（苏联的）共产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制度却是暴虐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阿斗，党是统治者。因此，必须把以暴力消灭暴政而建立法制的革命，同消灭法制，建立新的、极权主义暴政的革命区别开来。

\*            \*            \*

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一个国家里，是否仅仅是为了避免流血就值得长期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残暴统治呢？表达得形象一点：一个健康的机体上长了癌瘤，是否会由于切除手

术（革命！）时怕流血，就不进行这种手术呢？如果我们把任何反共主义革命可能造成的牺牲同斯大林“和平”制度下千百万人的牺牲加以比较，人道主义者因为怕牺牲而反对革命的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索尔仁尼琴援引库尔加诺夫教授的材料举出了斯大林时期死亡的人数是6,600万人……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有一些是由于国内纷争和混乱，有一些是内部从“阶级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加以消灭，总共是6,600万人！！

前面已提到，革命不仅有流血的、暴力的、也有不流血的、和平的。如果造成广泛的人民压力，已经腐朽了的反人民制度便不敢贸然动用武器，以免枪口调转过来对准自己，那么苏联未来的革命也可能是不流血的（象不久前西班牙的和平革命），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在几乎半个世纪专制统治的葡萄牙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人们立刻会反问我：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了统治阶级毫无反抗地把自己的政权让给了人民？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并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例子，我们在俄国就看到过两次：1917年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愿（当然是受到压力的！）放弃自己的和儿子——年幼的继承者阿列克谢的政权（王位），而让给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到了3月3日，米哈伊尔又自愿放弃了（当然是受到压力的！）王位而把政权交给人民。

我们断定：在人民普遍的压力下，政权和平转到人民手中是可能的！

但是，也往往会发生上层政变（一部分统治阶级反对另一部分统治阶级），其结果，这种政变可能成为相当于革命的政变。在这个意义上讲，具有反共意识形态的“宫廷政变”或者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军事政变”将会是在苏联发生革命的最理想

的和平方式。

\* \* \*

列宁断言任何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这一点他是正确的。任何革命都是为了夺取政权，以便借助于政权来消除阻碍民族进步、国家繁荣的各种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来仔细研究一下当前苏联的局势。在谈到这种形势时，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是否正在发生象官方思想家要我们相信的那种前进运动？或者，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制度还在“原地踏步”？如果是“原地踏步”，那么，哪些因素成了前进运动的阻力呢？

根据这个题目可以从苏联现实中取出最致命的材料写出一大批论文，但是，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想勾划出一幅只有死硬的教条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蠢汉才会矢口否认的略图。

工业。战前，苏联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粗放的、数量上的工业革命，这一革命的成果是拚体力生产出以吨数和个数来衡量的产品。因此，当斯大林和“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并存的时候，这种革命的成就是明显的。第二次，即战后工业革命是集约化的、质量上的工业革命，这一革命的成果是用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深广程度，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的工艺发展来衡量的。因此，新的斯大林和新的“古拉格”已经无济于事了。为了开凿伏尔加—顿河运河、建设沃尔库塔、科雷马和其他“共产主义的伟大建筑工程”，靠笨重的体力劳动强迫人们做机械运动就够了，但是，为了使这些人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和进行精神方面的创作，需要的是不受任何党的黑暗势力限制的创作自由。这里，正象萨哈罗夫院士在自己著名的《备忘录》中向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声明的

那样，是这些统治者把国家引入了工艺技术的死胡同。

农业。布尔什维克把全部土地交农民的土地革命（《土地法令》，1926年10月17日）是进步之举，但是，斯大林把全部土地，以及全体农民交归于党的集体农庄革命（1927年12月29日），在苏联建立了一种新的最坏的农奴制，即党与国家的农奴制。结果，农产品生产不足的危险连续不断，产品成本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据官方承认，比美国低 $2/3$ ），农庄庄员生活贫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断进行机械化、化学化和国家对农业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块最肥沃的和最广阔无垠的土地在革命前不仅养活着本国人民，而且养活着欧洲。解放前，就出口粮食而言，俄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而现在却要从法国进口马铃薯，从“共同市场”进口黄油，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可见，在农业上，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已把国家引向了死胡同，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在给“领袖们”的信中写道：

“难道说还不觉得羞耻吗？该猛醒了！俄罗斯世世代代所依靠的农村成了国家主要的薄弱环节！……要使我国人民能够吃饱肚子，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取消强制性的集体农庄……”

文化。当牛津大学、索尔蓬纳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校园内殖民地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剧增的时候，就标志着西方几个殖民大国灭亡的时候到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帝国的命运也是如此，不仅其殖民地是如此，而且宗主国本身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文盲置身于政治之外。因为他（列宁）曾用德国人的钱大张旗鼓地进行蛊惑性的社会宣传，轻而易举地分化了整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军，并掌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的文化革命把苏联变成一个普及文化和拥有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国家，第一次使苏联人变成（按亚里斯多德的说法）“政治动物”。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成绩是

巨大的，同时，就在这些成绩中，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今天，每年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比旧俄时智力劳动者的总数多好几倍。苏联的学者比旧俄时大学生总数多三倍。但是，迄今为止，这场革命仍然是粗放的、普及性的文化革命（“扫除文盲”和“培养干部”），不过，当现在，正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中清除狭隘的“党性”的一切教条主义障碍而具备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时，集约的、质量上的精神革命开始向纵深发展。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发动了文化革命。这一革命首先消灭了愚昧无知，而最后则将消灭布尔什维克自己。

\* \* \*

这就是今天矛盾重重的苏联社会的总的情景。那么，不进行革命，而是通过改良的途径是否能摆脱这些矛盾呢？按苏联寡头们的教父马克思的说法，在苏联这样的新型阶级社会里，只有一种内在的“革命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规律”很适于将来作为苏联暴政的悼词：

“我所得到的，并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卡尔·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2—83页）

究竟什么时候，在哪个社会里象今天的苏联社会那样，“物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过如此引人注目的矛盾呢？那种曾经给农民以土地，给国家以工业化，给人民以文化革命（虽然付出了高昂无比的代价）的进步的生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退化为经济上的停滞、文化上的黑暗、政治上的暴虐。苏联的生产关系已由昔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真正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羁绊。那么，出路何在？

\*                     \*                     \*

政治局里的贤哲们又想到了列宁，并开始向……世界资本主义求救！列宁赞成：

“仅仅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我们什么时候就能够管理这种经济。”（《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38—639页）

“用别人的手”（工艺技术）和别人的援助（贷款），即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技术和贷款，也就是求助于“反动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决定要超过马克思，并及时防止社会革命。

然而，如果进一步研究列宁关于革命的观点，就会发现，列宁是共产主义统治制度的组织者，但同时也预见到，如果他的学生们对由于苏联“上层”同“下层”的对抗所引起的群众觉醒的危机放任不管的话，这种统治制度是必然会灭亡的。列宁也正是从这种危机中总结出自己特有的“革命基本规律”。下面是列宁



极大的不敬。

首先我们要弄清“阶级”这一术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的意义。列宁的众所周知的定义简述如下：所谓阶级，就是对生产资料具有同等关系的人们组成的一定集团（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仅仅占有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占有土地的地主，依附于地主的农民阶级）。十月革命和共产党专政消灭了所有的占有者阶级，与此同时甚至老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也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剩下的是两个劳动阶级——无产阶级（斯大林把“苏联的无产阶级”改名为苏联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但是，老占有者阶级被消灭以后，出现了新的占有者阶级，他们巧妙地掩饰自己占有的本质，使人当真以为是一些廉洁奉公的人在领导着苏维埃国家。在苏联，所有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因此，党的诡辩家对我们说，全体苏联人，从总书记到农庄庄员“对生产资料具有同等的关系”。党的诡辩家故布疑阵。苏联的社会形态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形态。我们在研究苏维埃建立以前的社会时所运用的定义和范畴，不仅无助于分析问题，反而会把人搞糊涂。列宁认为，每一个厨娘都能管理苏联国家，而一位苏联部长的薪俸将不得高于这个厨娘。可是，列宁的这些教义（见《四月提纲》）也无济于事了。因此，在确定共产主义国家的阶级时，必须遵循另一些原则。这里有两标准是确定苏联阶级的基础：

（1）人们对政权机关的态度，也就是人们对国内社会产品分配机关的态度；

（2）人们在苏联这个社会金字塔中的地位。

为了明白地表达列宁关于阶级的论述，可以这样来表述：苏联社会的阶级，这是对政权机关和分配机关具有同等态度并在社会金字塔中居同样“等级”地位的人们组成的一定集团。从这个

定义出发，就能很容易地剖析苏联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就象在旧社会一样，有“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里也有“崭新的阶级”——主要的领导阶级，即党的官僚集团，统治阶级，将军团、契卡集团、经济集团、苏维埃行政集团、工会官僚、意识形态官僚、共青团官僚。正是这些阶级成为苏联条件下的占有者阶级。占有财富的先决条件是政权。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前，财富是权力的源泉，在苏维埃社会却倒了个儿，权力是财富的源泉。诚然，这种财富没有继承性，也不可以“变卖”，而且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只要是勃列日涅夫当总书记，他就比洛克菲勒还富。的确，“新阶级”的权力同财富一样，没有继承性，但却完全可以传宗接代，苏联领导人的子女生长在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上，并在他们父辈离世以后仍留在上层，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同样可以承受这些位置。

对于苏联95%的居民来说，进入“新阶级”（在别的地方我把这个阶级称为“社会实力集团”）的大门是紧闭的，因为只有通过苏联共产党才有可能加入新阶级，而全体苏联公民中只有5%的人加入苏联共产党。即便是党员也不一定就是“新阶级”的成员。党内有1,600万党员，由于工作上和数量上的原因，只有半数以下的人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其原因是：第一、要加入“新阶级”，必须有毕业文凭，并对党的机关俯首听命；第二、“新阶级”中的肥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在国家的社会权力金字塔中的常设席位（政治官僚和行政官僚）的限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新生的资本家阶级采用的不道德手法，同那些想钻进“新阶级”的候补成员和想在这一阶级中站住脚的代表人物所干的那种骇人听闻的、肆无忌惮的不道德行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

历史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性欲”——权力，现已转化为“资本”，成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一个苏联公民的物质享受水平根据他对政权的态度而有所不同，换言之，一个苏联公民的生活标准同他在社会权力金字塔阶梯上所居的地位成正比。因此，“新阶级”中的地位之争，不单纯是权力之争，同时也是个人物质享受之争。正因为如此，苏联新兴资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也象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豺狼”一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两者的差别是有的，我们对西方资本家的收入来源和水平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这些材料都公诸于报刊，我们也知道西方政府领导人的薪俸的来源和数额，这些材料也公诸于报刊。但是，苏联人对中央委员、部长、州委书记、主席、厂长和经理等人的收入情况却一无所知。苏联最高官僚的收入是保密的，保守这种机密比保守苏联武装力量的机密更加严格。这就是说有些事情是要向人民隐瞒的（例如，仅总书记收藏的外国小汽车这一项价值多少，人们就不得而知）。但是，人所共知的是：苏联高级官僚除去比苏联一个中等工程师大约多10至20倍的高薪外，还享有数不清的特权，如免费别墅，独门独院的私邸，私人 and 公家的小汽车，公务员，内部供应商店，全家享有免费去疗养区疗养的权利，国内和国外公费旅游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苏联统治阶级人物犹如生活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

“新阶级”的代表人物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维护自己小团体利益的精神，凌驾于庶民百姓之上的高傲的优越感，还有新的阶级特有的、就其实质而言纯属庸俗的生活道德。“新阶级”的未成文的生物繁殖法律，是在这个阶级内部缔结姻缘。如果出了例外，譬如说，一个将军的女儿嫁给一个理发员，或者一个

部长的儿子娶一个女挤奶员，那就是名门望族家庭中的一出悲剧，成了苏联文艺作品勾画矛盾和冲突的题材。由此可见，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社会”的理论只不过是讲给学龄前儿童听的政治童话而已。要是对抗阶级的存在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并且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这一斗争必将导致革命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正在走向革命。

\*                     \*                     \*

发现“内在革命”规律的马克思说过，当旧社会孕育着革命而且必然要分娩的时候，暴力在革命中起着“助产婆”的作用。革命者只是帮助无痛分娩和接生婴儿。因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按马克思的说法，革命也就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这个问题。如果说马克思是革命的宿命论者（“内在的革命论”）的话，那么列宁则是革命的唯一意志论者（“有组织的革命”）。列宁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系列政治上的研究。列宁认为，如果革命没有发生，或者革命形势并不具备，那么就应该加以组织。那么怎样组织呢？“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37页）列宁这样说了，并把俄国翻转过来了。也会有仿效列宁的人，并再次把俄国翻转过来，对这点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呢？

在这方面，展望未来和力求把握住自由思想在苏联发展的趋势是颇有意义的。凡是认为命中注定要长期生活在暴政下的人，始终是斯大林的忠实盟友。斯大林之死，以及后来他本人遭到斯大林分子的揭露这一事实表明：打倒昔日偶像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打倒偶像”的主犯赫鲁晓夫本人也成了他自己的

弟子搞阴谋的牺牲品时，人民就彻底相信了一点：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只有权力才是神圣的。这就出现了一桩老一代苏联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奇迹”：在苏联出现了民主运动，犹太人争取自由移居国外的运动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争取重返克里米亚的运动是苏联知识分子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出现了私下出版物；涌现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马克西莫夫、格里戈连科、布科夫斯基、加兰斯科夫、李维诺夫、阿马利里克、契尔诺沃尔、杰米列夫等这样一批奋起斗争的具有自由精神的旗手。这个运动始于60年代末（1968年4月《时事纪事》创刊），遭到了并正在遭到契卡分子的无情打击。许多人被投进监狱，送进精神病院，“撵出”国境，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马克西莫夫提醒人们说：“圣地不空”。业已开始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由于克格勃分子执意要把不可逆转的过程逆转过去，就走上了暴力升级的道路，从而，伴随着自由主义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运动而产生革命者的崭新的解放运动。到那时，在苏联地下活动的舞台上必将出现一些新的名字，他们会提出新的政治纲领、新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并采用新的斗争方法。他们不是为了“修正”暴虐制度，而是要推翻这种制度。在这种运动的武库里可能有老式的传统的斗争武器，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实验室本身制造的武器，还有目前在西方的布尔什维克“激进派”的孪生兄弟研制出来的武器。

\* \* \*

如果克格勃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施用日益加强的恐怖手段，而引起类似从前的热利亚博夫、格里涅维茨基、佩罗夫斯卡娅和卡利亚耶夫（这些人是俄国采取恐怖手段反对暴政的先驱者——译者

注)等人的做法,并使国内到处燃起空前的反恐怖情绪的话,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希望大家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不是鼓吹恐怖,而只是诊断疾病,并预告可能会害什么病。责怪一个医生根据病情诊断患者已病人膏肓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病情不是医生引起的,医生只是确诊病情。医生已预测到疾病会导致可怕的后果,然而病人却不采取妥善的措施去治疗,并因而怪罪医生,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可供契卡分子和党的官僚们选择的措施不多:抑或自上层实行彻底改革(如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和尼古拉二世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这一类改革),抑或采取斯大林式的新型宗教裁判制度。可叹的是,不管是哪种形式对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都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既不具备俄国沙皇的智慧,也不具备昔日苏联暴君的意志。由此可见,将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党的反革命势力今后继续肆虐,革命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极其痛苦的过程;如果他们屈从于人民的意志,革命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流血的行动。

(写于1974年)

\* \* \*

对奥尔洛夫、金兹伯格、夏兰斯基、加姆萨胡耶基娅、科斯塔娃和皮亚特库斯的审讯表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内部条件的有机产物)不仅已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必然伴侣,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政治因素。不管克格勃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多么猖獗,也不管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巫师如何声嘶力竭地为斯大林招魂,要使运动后退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了。当然,从理论上讲这种局面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也看到历史上有许多专制制度甚



至暴政制度复辟的事例。从理论上讲，斯大林式的统治在苏联复辟是可能的，但是这就必须做到：（1）重新恢复不断肃清潜伏的“人民敌人”的制度，并在国内、党内、军内和警内进行全面大清洗，使集中营每年关押的人数达到斯大林时期的标准——1,000万至1,500万人；（2）恢复战前的斯大林劳动法，实行苏联公民生产负责制和对破坏劳动法行为实行刑事追究；（3）恢复政治警察对党和国家的权力；（4）恢复斯大林的“铁幕”，停止同外国人进行技术、科学、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联系；（5）最主要的是，为了实施这些措施，就要在克里姆林宫或在其周围找到一个新的斯大林，但在新的条件下，这个人物至少应有超过斯大林一倍的能量。我不认为克里姆林宫现有的风烛残年的政治老人们会走这条路，尤其是不可能找出一个新的斯大林来。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把持不同政见运动打入地下，使持不同政见活动让位给俄国历史上常见的，今天在西方很现实的一种凶险可怕的现象——革命恐怖主义。

下一次使国家制度覆灭的历史性惨祸是由这种制度本身挑起的。由于其暴政本身无法贯彻到底而使种种暴虐制度灭亡。斯大林的暴政内部是完备的，所以才能长期维持下来，它不仅是一种极权统治，而且是全面统治。斯大林之后的制度产生了在政治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斯大林的门徒既维护斯大林的统治制度，又决定不用斯大林的方法管理这个制度，而是用新的方法，将暴政与小自由相结合，将小恐怖与大预防相结合，将适度的黑暗统治与有控制的“思想自由”相结合。但是，这样一来，统治制度开始空转，而苏联社会则拒绝俯首听命。于是，必须作出明确的抉择，要末是始终不渝地实行斯大林式的制度，那就是退到斯大林时期，要末是始终不渝地使制度民主化，那就要“下坡刹车”。

毫无疑问，第一种路线的维护者（新斯大林分子）现在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取得胜利是一码事，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一胜利则是另一码事，因为这个国家毕竟在没有斯大林的情况下度过了25年，年轻一代不仅从老一辈人的讲述中，而且从这个党的20大和22大决议中了解到了斯大林的暴行。新斯大林分子正在竭力把国家拉回到斯大林秩序时期，扩大和加深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恐怖行动，他们象历史上反对本国制度的“奸细”一样活动着。我羡慕未来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可以阅读政治局的记录和克格勃的档案材料，把这些使苏维埃制度灭亡的奸细们的糊涂愚顽公诸于众。

这种奸细行为表现在哪里？最简单和最明显的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的恐怖手段激怒了知识分子，对合法地维护人权运动的人物施加的肉体恐怖手段迫使人们采取极端的行动。谁要是保卫苏联法律和苏联权利的活动采取恐怖手段，谁就是制造反对法律和反对整个制度的非法运动的罪魁祸首。克里姆林宫中那些不走运的统治者们希望这样做吗？他们接到的警告已经够多了。

伊林枪击政治局委员、波罗的海上军舰起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格鲁吉亚发生的一系列破坏行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爆炸、莫斯科旅馆被焚、劫持或企图劫持飞机外逃、阿塞拜疆内务部长及其两名助手的被杀等等，这只不过是莫斯科对外界无法隐瞒的恐怖活动而已。

、持不同政见者不是苏维埃制度的敌人。它的敌人不在华盛顿，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克格勃和苏共中央。应该说，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政权的腐朽破旧的大厦底下挖洞，他们象田鼠一样，听觉灵敏，但他们陶醉于自己臆造

的关于“党和人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团结一致”的声音。同时，他们的视觉很差，以致于看不见可怕的现实——表现在社会两极分化、政权违法乱纪、官员营私舞弊、伤风败俗等方面的“成熟社会主义”的腐败不堪的情景。他们吹嘘高速度发展的假社会主义经济，然而劳动是强制性的，工业化是数量上的、粗放的（即生产多少），这种经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当劳动是相对自由的时候，工业化才能是质量上的、集约化的（即生产得如何）。西方已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那里，工人的体力已让位给学者的智慧和发明家的天才，这个事实说明“成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同“腐朽的资本主义”进行声名狼藉的“竞赛”中遭到了破产。

衡量一种经济体系效率的高低只有一个标准，即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经过60年难以置信的牺牲和苦难之后，苏联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在世界上居于第24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战后几乎从零（全部工业被破坏，幸存的机器全部被战胜者拆走）开始“建设资本主义”。现在人民的生活比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苏联人强2—3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效率低。教条主义的政治牵制了经济发展的合理规律。教条主义的机关在干扰自发性的经济动力。“上层建筑”正在消灭“基础”。但是，我看到，正是马克思预言，当“上层建筑”成为“基础”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成熟社会主义”对这种革命来说已经过于成熟了，而克里姆林宫的党和警察的上层人物则成了这一革命的盟友，虽然他们是不由自主的，但却是最忠实的盟友。